

中国革命的道路

论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

金宝瑜着



批判与再造社

2020 年 6 月出版

目录

出版序 （杜继平） / 1

作者序 （金宝瑜） / 4

前言 / 9

第一部份：农业发展的两条路线斗争 / 17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土地改革 / 17

（二）中国共产党在农业现代化上的分歧 / 18

（三）集体化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 20

（四）工农联盟的新物质基础：农村集体化与农业现代化 / 21

（五）集体化下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 / 23

1. 农田基本建设奠定了农村现代化的基础 / 23

2. 生产技术改进和生产力提高 / 25

3. 农村工业化的发展——社队办工厂 / 26

4. 集体所有制下的生产和消费 / 28

5. 初步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要，农村医疗保健与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 / 28

（六）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化建设 / 30

（七）农业发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 / 31

第二部份：全民所有制下的两条路线斗争 / 34

（一）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过渡 / 35

（二）全民所有制在废除雇佣劳动上的努力 / 38

（三）全民所有制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 43

（四）全民所有制与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发展 / 45

第三部份：解放后两条路线斗争总结 / 46

（一）文化大革命与两条路线斗争 / 46

（二）资产阶级为何能夺取无产阶级政权 / 48

（三）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使我们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 52

（四）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得出的结论和我们今后选择 / 52

附录一：《鞍钢宪法》划时代的意义 / 55

附录二：晚期帝国主义 / 68

附录三：沃勒斯坦与《世界社会论坛》 / 87

作者简历 / 94

出版序（杜继平）

2008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爆发危机以后，十二年来，非但没有脱出经济持续衰退的困境，反而愈陷愈深，举世政治经济的动荡不安有增无已，气候变化的劫难日益严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造成土地、空气、水的大范围污染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更为巨大，与此相联系的是新型病毒层出不穷，不仅肆虐荼毒人类、牲畜，还使本已衰弱不振的经济雪上加霜，更为危殆，凡此种都彰明显著地摆在当今世人面前。可以毫不过甚其辞地说，人类再不摆脱资本主义改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二十世纪追求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革命未竟全功，留下不少疑难问题有待解决：苏联先是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变质为修正主义，至 1991 年，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全面垮台崩溃；中共则自邓小平上台后，背弃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也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成果，在中共走资派当权下，被摧毁殆尽，亿万工农劳动人民“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饱受官僚、资本的残酷压迫、剥削。面对这样的大变局，右派额手称庆，雀跃欢呼，幼稚地误以为资本主义已大获全胜，人类别无选择，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是唯一的出路；全世界许多左派或灰心丧志，流于虚无；或倒退右转，充当资产阶级的奴仆，成了反共份子；或沦为无政府主义者，从事无望的抗争。因此，要重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正视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认真、彻底地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得与失，实事求是地鉴别出成功与失败之处，有理有据地反驳各式各样关于社会主义的奇谈怪论；而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中，也必须展开开诚布公的深入讨论，力求厘清问题，化解分歧，或最少将不必要的误解降到最低，从而在实际的斗争中，逐步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与更加紧密的团结。

社会主义革命要面对的既有数千年私有制所积淀的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旧文化的顽固传统，又有五百年来资本主义发展所形成的资产阶级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力量，本非易举；在人类历史中，一个新时代、新制度的开创、变革，绝非一蹴可及，一帆风顺的，总会遭到旧势力的抵抗与反复的反扑，力图复辟，法国大革命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革命要求解放全人类的目标要比资产阶级革命宏大得多，遭遇的困难当然也艰巨得多。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定律说：“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1960 年代，中苏论战时，中共中央于 1963 年 6 月 14 日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答复苏共中央的来信，其中有段话说：“历史证明，革命没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

路，也没有不遭受某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如果谁认为只有革命一帆风顺，事先得到不会遭受牺牲和失败的保票，才可以进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

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既不会为一时的胜利冲昏了脑袋，也不会被一次，甚至多次的失败所吓倒；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失败与错误都不足惧，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要获取明确的（革命）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明代大儒王阳明也说：“今日之失，未必不为后日之得。”关键在于要能够善于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屡仆屡起，终底于成。但要作好总结经验的工作，首先必须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而不是用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方法，不顾客观发展、变化的现实，直接套用既有的马列理论；也不能仅依自以为道德、正义的立场，诅咒资本主义，主观巴望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是必须深入研究客观现实，掌握资本运动规律的必然性，再加以自觉地运用，充份、有效地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

恩格斯晚年针对马克思主义盛行后，大量误解、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象，再三提醒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公式，他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也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指出，想取得引导革命行动的正确理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关于当前的世界形势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可能性，2019年5月25日，我接受香港《怀火》网站访问，谈大陆佳士工人运动的斗争，在题为〈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访问稿中，曾有些简要的分析，现转录部份内容如下：

“从客观现实来看，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形势是有利于左翼革命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无法脱出泥淖，从欧洲到亚、非、拉丁美洲的政治动荡层出不穷，此起彼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基础都在晃动不已。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如同组成它的每个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平等的层级结构，由少数几个依据实力争逐霸主地位的强权支配；在经历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现正处在一个剧烈的重构过程之中，最显著的变化是：美国霸权的衰落与中国大陆的崛起。这个变化有很可笑、深具讽刺意味的一面：资本主义的霸主美国现在违背自由贸易这条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教义，大搞贸易保护主义；而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中共走资派则成了自由贸易论最忠实的信徒，习近平近几年在重要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频频大声疾呼资本全球化，取代美国成了鼓吹贸易自由化的旗手。

这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重构的特点是：美国总统川普为挽回日趋衰颓的美国霸权，采取极度自利的经贸、军事政策，不再打肿脸充胖子，提供欧、日廉价的军事保护，同时也对欧、日施压，要求减少贸易逆差，导致世界体系中原本以美国为首、紧密结合的美欧日统治集团出现裂痕；于是，欧、日与中国大陆一起反对川普的贸易保护政策；但美欧日也共同与新崛起的中

国大陆有矛盾，都想削弱大陆资本对外扩张的力道，也都想打破仍被大陆国家垄断资本封锁的基本工业、金融、通讯、传媒等重要的经济部门，而联手对中共走资派施压。大陆走资后，也就不能不依循资本必须不断扩张的逻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对外扩张（现在主要是通过“一带一路”的方式），这就会损及美欧日的资本主义大国的利益。于是几股支配世界体系的势力，为了重新分割世界市场，各凭经济、政治、军事的综合实力，激烈争夺，构成多重的矛盾斗争关系，因而世界出现了高度不稳定的混乱状态。”；“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美国要极力打击对它最具威胁的中国大陆，以维护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于是从经济、军事上围堵大陆（包括挑动台湾与大陆对抗），阻挡大陆争逐霸权。……随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不断加深，国际经济、政治的矛盾、冲突日益扩大，世局的动荡有增无已，这些变化远非中共走资派所能掌控；大陆的经济恶化、资本外移、失业率上升是必然的趋势。”

金宝瑜这本书的主旨在总结 1949 年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再革命。中国大陆是当今世界最具社会主义革命潜能的地区，也是重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关键所在。中国大陆的革命潜能在于它有举世所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丰富遗产，更重要的是，由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深植大陆人心，毛泽东的形象与思想已在大多数人民中树立了无可动摇的崇高地位；中共党内外的右派曾联手合作，想效前苏联的赫鲁晓夫鞭尸斯大林、走向修正主义之所为，处心积虑，极尽所能地造谣诬蔑毛泽东，妄图彻底摧毁毛泽东形象及其思想，为快速、全面地大搞资本主义开辟康庄大道，但终未能得逞。2011 年 6 月，我在答复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战士易衍文先生的来稿时，曾说：“也不用怕会天下大乱，中国与苏联东欧的情况有根本的不同，那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主心骨依然坚不可摧，而且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威望越来越高，凝聚人心的作用越来越大，只要善加清理历史问题，因应新的客观形势与条件，重树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便不致出现溃散局面。”这个看法，随着这些年大陆许多民众主动把毛泽东的生日定为“人民节”，年年举办集会庆祝纪念而更加确信，尤其最近经新冠病毒的肆虐荼毒，大陆青年认同社会主义者大量增加，益发令人欣喜。以中国的人口之众、幅员之广及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的重要地位，如果重建了社会主义，无疑会像 1949 年那样再度震撼世界，鼓舞全世界的左派力量，唤起各国久受压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热烈响应，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最强大的推动力。毛泽东在生时常说，中国身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对世界人类应尽更大的责任，作更大的贡献。中国果能重建社会主义，带动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挽人类于危亡之际，既能自救，也为人类作出最大的贡献，比起中共走资派出于狭隘民族主义，高唱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才是中国人最责无旁贷、也最光荣的伟业。

金宝瑜这本书总结了她数十年来积极参与左翼运动的经验与深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心得，广泛运用了客观证据，对中国与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深重危机，提出了材料丰富、见解深刻的分析；她对中共走资派何以能夺权成功与两条路线斗争的解释或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如她在本书自序中所言：“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将我所了解的中国解放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写出来，以便供大家批评、讨论和补充。”她并没有视自己的观点为定论，而是本诸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提出认识、反思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有用材料与见解，供各方人士参考，为重建社会主义贡献一己之力。我们期望本书的出版能引发严肃、认真的批评，乃至论辩，从而有益于寻求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好方案，那么金宝瑜以年逾八旬的高龄，仍费数月之久，勉力完成这本着作的苦心，就没有白费了。

2020 年 6 月 16 日
于新北市新店

作者序：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金宝瑜

到了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今天，我们都看到美国这个大帝国内外都面临着各种严重的危机，因此，在客观情势上，现在应该是美国左派挑战资本主义体制和改变这个社会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美国左派能够起来反对美国政府在与垄断资本结合下对人民的各种欺压和剥削，将会对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产生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很不幸，虽然美国左派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他们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与资本顽强地斗争，对改变劳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作出很大的贡献，包括废除童工、降低每日工时、改善工厂里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和福利等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左派更成功地在许多关键产业部门中组织了工会。美国劳工史里，有数不清的英雄，在与资本不断的抗争中，牺牲了生命。

但是自从二战之后，美国的左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的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是左派之前成功地组织工人应该归功于劳动阶级有它自己的政党。美国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是由一些仰慕苏联共产主义革命的人组成的，美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人上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它缺少自主性，一切都是跟着苏共走，因此很难团结到更广泛的有左翼倾向的组织和群众。到了苏联共产党走向修正主义时，它就完全迷失了方向。之后，五十年代在美国疯狂反共下，右派进一步夺取了工会的领导权。美国的工会转变了方向，成为只为工人争取经济利益的组织，在政治上则完全依赖资产阶级的政党。工会用工人的选票换取民主党对工会的支持。

在新自由主义之下，随着美国的工业一步步的外移，居住在美国老工业城市的人民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样的困境下，左派反对的力量变得非常被动，并且十分的无力。这里我举出一些具体的事件来，从左派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和所采取的行动，我们可以对美国左派的实际力量作一个评估。虽然这样的叙述将会把问题扯远了，但是我认为会有助于认识美国的真实，然后再回去看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在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城住了30多年，我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城的一所大学教书。底特律里所有的事都离不开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二十世纪初，底特律城的居民大部份是来自欧洲各国移民，上世纪二十年代有大批南部的黑人北上，加入工人的队伍。二次大战时，底特律的汽车厂积极地投入了军事用品的生产，它们从制造汽车转为生产坦克、军用卡车、飞机等。大战时生产大量增加，雇用的工人也大量增加，因为很多男性被征去打仗，所以女性开始在生产线上投入生产。二次大战结束了19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战后的1950年代是美国经济最繁荣的日子，底特律汽车生产达到顶峰，人口达到一百八十五万（今天人口下降了一半，只剩下九十万）。这时新的高速公路建设便利了新的工厂和住家从底特律城里搬去郊区，郊区的兴建也是战后美国经济进入极盛的原因之一。大量的投资投向郊区新建的工厂、住家、学校、商场、大型购物中心等等，从投资和消费两头的增加提高了郊区的GDP和就业。二战后，汽车的生产 and 底特律的居民逐渐移向底特律的郊区，移居到郊区的人大部份是白人。这些白人的工作集中在工程师、医生、教师、律师和大公司的管理阶层，他们多半属于小资产阶级。留在市区的多半是劳工阶级，因为种族歧视，很多黑人都无法搬去郊区。底特律城和郊区的居民之间黑白分明，不同的阶级阶级分明。底特律市和郊区在行政上属于不同的城市，各有自己财政税收和开支，

各自有自己的学校。学校的开支来自房地产税的收入，郊区的学校有各种课外活动（球队、音乐、美术等等），底特律市的学校却穷到连教科书都买不起。

郊区的繁荣的另一面就是底特律城的萧条和人口逐渐下降。之后，汽车厂更进一步从底特律的郊区搬到美国南部、工会力量比较弱的一些州去生产。七十年代后半我搬去时，底特律的城里已经很萧条，市政府的财政困难，入不敷出，因此，必须大幅削减各种开支，其中包括公共教育的开支。在贫穷住宅区为了节省开支，连公共图书馆都被关闭；另一方面，市政府将一些公共设施，像水、交通和收垃圾费等加价。除此之外，底特律市政府更增征城里居民的房屋税。到了八十年代时，更多的汽车生产从美国南部移到墨西哥，底特律失业的居民再度增加，城市的情况更进一步衰退。

1980 年左右，正是汽车工厂搬离美国时，通用汽车（GM）突然宣布要在底特律城里建一个新的汽车工厂。消息传来。底特律市政府和居民都非常惊喜。通用汽车要底特律市给它一块建厂的土地。底特律城里有许多的空地，但是通用汽车则坚持要一块住满居民的土地。这块地是早年波兰移民的住宅区，也有不少后来从南部移民过来的黑人，这个叫波兰城（Pole Town）的社区有 1500 住家，144 家小生意，和市政府还是把它让给 GM。市政府借用一条法律——《强制征收法》（Eminent Domain），这条法律规定如果因为需要，政府有权强迫居民迁移。但是这里的“需要”是指用地建学校或是道路等公共设施，而不应该是为私人营利公司所要的用地——赶走了这里的居民和小生意，拆毁了教堂，然后把厂地清扫干净，交给 GM 去建厂。而且所有的花费都由底特律市政府负担。在与 GM 的协议里，市政府还在 GM 开始生产后减免它应付的所得税。在达成协议的过程中，底特律和美国其它地方的左派认为这样专横无理的做法对居民太不公平，于是联合起来反对，在整个拆迁的过程中进行干扰，当推土机已经开到教堂门口时，天主教神父还带领着信徒们在教堂里祈祷。这是我搬到底特律后（我住在郊区）看到左派起来反抗的第一次。

GM 获胜后，在波兰城盖了一个新汽车工厂。三十几年后，2018 年底，GM 宣布它将关闭美国的三家工厂，其中一个就是底特律波兰城工厂。GM 同时宣布要关闭加拿大的一家工厂，GM 一步步将汽车生产撤出美国和加拿大。1980 年 GM 毁掉了一个熙熙攘攘很有人气的社区，今天工厂关闭后留下一大片死寂的空间，底特律又多了一个被遗弃的工厂。回头来看，1980 年反对 GM 在波兰城建厂是对的，但是也是完全没有用的。你要反对，让你去反，我要建厂，照样建。按照资本的规律，建建关关是合理的，不用的工厂留在那边不去处理也是合理的。三十年后我们看到：这一次左派的抗争虽然是正义的、但最后结果是完全失败。

底特律已经有太多被遗弃的工厂，不用调查，也不用统计，我保证底特律被遗弃的工厂，以平方公里来算，一定是世界第一。所有的汽车公司每次建新厂就把旧厂废了，但是因为拆毁工厂太花钱，所以就留在那边不去作任何处理。我还住在底特律时，每次有朋友来看我，我都带他们在城里走一圈来参观这些被遗弃的工厂。我教书的时候，跟两个同事，每隔一个学期合教一门底特律的课，我教经济，另外一位老师教劳工史，第三位老师教底特律的诗词，诗词中很多都是工人自己写的形容做工时的情形。每次这门课结束前我们都带学生去底特律城参观，很多参观点都是工厂的“遗址”。底特律被遗弃的工厂已经相当的有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网上看看这些被遗弃的工厂。（<https://jalopnik.com/the-ruins-of-detroit-industry-five-former-factories-5110995>）

底特律有一个很有名的棒球队叫老虎棒球队（Detroit Tiger）。这个球队的棒球场（老虎棒球场）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很为一般市民喜爱。它有很多便宜的硬板凳的座位，一般人可以负担得起，过去看棒球是一个夏天的大众娱乐休闲活动。1992 年老虎棒球队被一个卖披萨发了财的生意人麦克·伊利区（Mike Ilitch）买去。老虎队的新老板认为原来的棒球场已经老旧，要求市政府补助来建造一个新的棒球场。在美国很多城市的球队（棒球队、足球队、篮球队）对它们所在的城市都有同样的要求，因为新的球场会吸引更多的顾客，而且新的球场可以只留少数硬板凳的便宜座位，设立更多舒服的高票价座位，赚更多的钱。如果市政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这些球队的老板就用要将球队搬走作为要挟。有名球队多半是在比较老的城市里成名的，这些老城市一般都是因为工厂搬走，税收不够而财政拮据，像底特律还有一些其它的老工业城，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工业迁移，人口减少，一些商业也跟着离开，如果连球队都留不住，那就真正到了末路，所以最终市政府总是答应球队的要求，就算是用发债券来借钱，也得为球队建新的球场。底特律的新棒球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成的。底特律的一些市民反对将旧老虎棒球场拆毁，他们组织起来反对，这是我看到在底特律城左派联合起来发起抗争的第二件。他们的反对也是正义的、合理的，底特律市的财政已经如此拮据，市民连最基本的需要都无法满足，这时政府却要拿钱给棒球老板建新球场，实在说不过去。反对建新球场的抗争运动坚持了整整十年（1987-1997）而告失败。新的棒球场1999年建成，位于底特律的城中心，在棒球场的附近又盖了一个新的足球场，围着这两个新球场，有饭馆、酒吧、戏院和音乐厅，把所有的活动都集中在这几里路方圆的城区内，来供郊区收入较高的居民来这边消费。之后，左派在市民支持下，反对在底特律盖赌场，仍然是反对归反对，市政府最后还是批准于1999年在底特律建了三个赌场。美国本来只有两个州允许设立赌场，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增加到23个州。虽然大家都知道用设赌场来“发展”经济绝对不是好办法，但是每个州都在就业减少，税收下降的情况下，试图藉由建赌场来增加就业和税收。

2001年911 之后，美国进军阿富汗，2002年美国进一步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我也跟着参与反侵略战争的活动，在学校里宣传反战。我请了一位天主教神父到学校演讲，也在街上参加示威游行。到今天，这场战争已经进行近20年，阿富汗和伊拉克被破坏得满目疮痍，人民受到极端的苦难，当年的反战却半点用都没有。

到了2008年的房贷危机，底特律的市民遭遇到最严重的浩劫。2008年的房贷危机是因为美国的几个大银行和一些房贷公司的投机引起的。这些金融机构，在房价一起一落间赚了大钱，但是在这房价一涨一落间，底特律的居民失去了他们最值钱的财产，更失去了他们住了几十年有感情的家，失去了这个他们在这城市里唯一可以落脚的地方。上世纪末，房价上涨时，银行和房贷公司把握住赚钱的机会，放宽了房贷的标准，根据房屋估价公司高估的房价贷款给屋主。譬如说一所原来值六万元的房子涨价到十万元，按照十万元，银行贷款八万元给屋主。等到房价跌回六万元或者更低时，屋主支付贷款有困难时，银行就将住屋收回，把原屋主赶出家门。银行将收回了的房子拍卖，当房子在市场上拍卖多了，房价就更往下跌。到2009年和2010年时，原来价值几万元的房子跌到几千元。这些房子原来的屋主都是多年之前买下来为自己退休时居住的，在房贷危机中，他们失去一切。

金融风暴发生得如此之快，左派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这下可好，风暴过了，左派只能留下来收拾残局。我认识的一个研究底特律劳工的学者，他实在看不下去这些屋主受到的苦难，

把拯救他们看为自己的责任。他组织了居民，在银行收回房屋，警察来要把屋主的家俱、用具、衣服丢到街上时，这些居民就把车道挡住，使得车子开不出去；他更带着一些房子被没收的屋主去法庭向银行起诉，因为许多被没收的房子是违法没收的。但是抗争了多年，能够把房子讨回来的只是极少数。金融危机后底特律一眼望过去，就像经历了一场战争。

房贷危机将底特律城进一步推向崩溃的边缘。底特律城多年来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到了2013年7月终于支持不下去而宣布破产。破产数额达180亿到200亿美元之大，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市破产事件。破产的细节这里无法多说，底特律市政府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还债。那一次金融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救银行、救汽车公司，就是不救底特律的贫困的黑人居民。要救谁？不是个种族问题，是个阶级问题。

我写出这些我亲身见证到的历史，就是想说明：我所看到的近四十年来美国左派的具体抗争中，显示出他们的力量相较于资产阶级是多么薄弱。尽管他们在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上，凭着正义感坚决反对美国资产阶级的荒唐作为，但是整体来说，他们并无法对美国的资本主义提出有效的挑战。美国的左派败退到今天的样子，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左派除了20世纪初期到中期短暂兴起的工人运动之外，他们并没有一套相对完整、得到多数工人支持的政治信念，更没有真正能够代表绝大多数工人阶级根本利益、世界观与政治主张的政党。虽然早就一蹶不振的美国共产党和从它分裂出来的许多纷杂的小宗派依然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工人革命先锋党，真实政治中，美国工人数十年来只能完全依靠民主党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却又一次次被民主党政治人物背叛。就这样，他们失去了一切。其实，说他们失去了一切并不正确，因为他们甚至无法梳理清楚自己的斗争历史，乃至到今天连反省具体的历史经验来重新想象未来如何开展革命的道路，都很困难。

反过来看，中国左派有自己的革命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是无数前辈革命家与革命群众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写下来的，是我们极为珍贵的遗产。中国革命丰富的历史经验提供了世界各国左翼运动思考未来发展的依据。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将我所了解的中国解放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写出来，好供大家思考未来道路时做为参考。其实，我自己并不适合来作这项工作，因为我并没有直接参与解放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我认识许多亲身投入中国革命建设、亲身经历过那段艰辛又充满希望的历史的人们，他们的观察、总结与批判都极其宝贵。但是我的有利条件是因为我在美国帝国主义下生活多年，对资本主义有相当的了解，可以借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来了解社会主义。毕竟，社会主义运动从来就是人类试图推翻资本主义、迈向新社会的努力。因此，或许我努力写出来的一些看法，可以供大家批评、讨论和补充，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感谢词：

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接受了各方面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我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借着这个机会我在此表示感谢。

《批判与再造》杂志的创始人和这十多年一直负责总编辑的杜继平给了我各方面的协助，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仔细看完我的书稿，并且认真地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最后还为了出出版序

整夜未眠，他的认真和敬业精神让我佩服，我在此向继平提出衷心的感谢。我也要感谢比我年轻 30 岁结交了 30 年的老朋友林正慧。她对文章结构提出了珍贵的修改意见，并在出版过程中做了不少周详的考虑和处理。我也感谢年轻朋友曾福全，他和正慧一起完成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我的新朋友詹尤克深熟多种语言，曾把我的一本英文书翻译成土耳其文，除了土耳其是他的母语外，尤克的中文和英文都比我好很多。詹尤克是最早看到这篇书稿的人，我感谢他的宝贵修改意见，和他对文章中所提到的资料和数据一再加以确认，以及文字上的修改。我也非常感谢范振国和刘欣恒不胜其烦的修改和校对工作。非常感谢周宸廷负责书稿电子版的编辑和排版，并帮忙纸本的付印。

最后，我要谢谢我的两个女儿——周道良和周道远，给我在生活上的照顾和精神上的鼓励。

前言

二十一世纪二十年的今天，无论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人，还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的人，大部份对未来都感到一片茫然。概括地说，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从大的方面来看，很多人都了解世界有限的自然环境和资源，再也承受不了资本主义无止境的扩张，特别是在近三、四十年里，资本主义因谋取利润所造成的疯狂浪费已经无法继续；而由于气候变暖，越来越多的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水灾和旱灾，失去了生命和财产，海水的升温和污染使得许多鱼类无法生存，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渔民已经无法继续靠捕鱼为生。许多城市里的居民每日呼吸受污染的空气，导致他们患上呼吸器官的各种疾病。在“全球化”下，帝国主义更加猛力的进攻，落后国家多数的农民，就算是拥有一小块土地，他们也没有现金来购买种子和化肥，因此，只能放弃耕种流浪到城市。记得有一次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开会时，遇到一位为都市贫民工作的年轻人，她对我说，“农村破产和都市贫民本是一回事。”事实上，今天全世界的移民潮，归根到底都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球各地制造的战争和帝国主义生产浪费引起的各种自然灾害；在帝国主义的袭击下，造成落后国家的农业破产和经济危机，它们的劳动人民失去了活路，只好寄望于逃走来谋求一条生路。

即便在全世界最富有的美国，在过去 40 年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即使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背上了一大笔几十年都还不完的债之外，也很难找到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他们面对的未来和他们父母辈比较，只能说是每况越下。在 60 年代的美国，即使是一般产业工人也都可以过着所谓“中产阶级”（就是中收入）的生活。底特律城的汽车工人，经斗争而获取到的合同保证了他们的收入和各种福利，工作 30 年退休后，每月可以有一笔优厚的退休金，免费的医疗保险，付清了贷款的住房和车库里的一部新车。因此，说他们是工人贵族应该是没错。但是在今天的美国和许多欧洲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众多的年轻人对他们未来越来越不抱有希望，更不用说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那么在资本主义发展最快、最成功的中国呢？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的希望又在哪里？

我认为今天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如果要继续革命，就必须要将 1949 年以后，中国走过的道路加以整理，只有这样才能从革命的立场对社会主义革命作出总结。在作总结的过程中，马列毛主义者可以本着同一个目标和方向，经过认真的辩论，和彼此之间的善意的互相批评，来达到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是我们整顿队伍重新出发的起点。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发展建设所作的总结必须要从过去具体实践出发，我们不但要了解从 1949 年到 1976 年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策略和具体政策，以及在这近三十年中的成就，也要了解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走资派如何反击和阻碍社会主义的策略和政策，我们更需要了解在这三十年中，毛主席如何领导无产阶级和与无产阶级结成同盟的农民向走资派所作顽强斗争，在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中，把革命一步步向前推进。

中国共产党在 1921 年成立，成立之后的 28 年中，它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1949 年解放全中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成立的目的是在中国解放之后，先过渡到社会主义，再达成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与目标。在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党对如何取得胜

利，有过几次策略上的争执，最后毛主席的由工人阶级领导与广大的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并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略得到全党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土地改革完成之后，中国如何向前走，来实现共产党革命的目标，在党内产生了分歧。事实上，在事情过去之后，我们了解到，虽然表面上在共产党似乎同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个目标，但是在具体政策的执行上，无论是在经济基础领域，或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党内都有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这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线，还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路线。这两条完全相反的路线之间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毛主席过世。之后，走资派夺取政权成为新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胜利了，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前中国共产党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党，之后，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但继续，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也就越来越激烈。

俄国革命之前，革命者对社会主义只存在着一些抽象的概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精辟的研究分析出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两个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并且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领导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到了二十世纪，列宁在他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中，得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垄断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在帝国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像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同样可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全世界受帝国主义剥削与欺凌及受本国统治阶级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就是其中的一个。毛主席对中国社会分析得出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国家的结论。毛主席这样的分析给其它半封建、半殖民国家很大的启发。毛主席更进一步阐述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的革命基础，从理论和实践中发展出中国革命的策略。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顽强和持久的武力斗争，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给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带来了新希望。

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世界的革命者才逐渐掌握了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的内容。但是苏联40年实行社会主义具体的内容，还是非常有限，特别是这样的具体内容，在1956年苏联走上修正主义后就中断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却没有中断，而是由中国继承了下来，1956年之后，中国的革命者扛起了反修正主义的大旗，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斗争理论和具体实践内容。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有极为丰富和珍贵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这近三十年的斗争经验是中国革命者最珍贵的宝藏，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最珍贵的宝藏。我们必须好好地认识在革命武装斗争胜利后，这一段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历史，从中吸取精华和教训。

前面提到在苏维埃建立政权之前，一个国家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只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我们从马克思的理论学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一步步取消商品生产，包括必须取消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来买卖的雇佣劳动。在苏联革命成功，取得政权后，所实行的具体政策给向社会主义过渡填入了实际内容。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它所做的任何尝试都是没有前例的，也因此犯了很多错误，像集体农场执行上的错误，和在投资上过于偏重重工业而忽略了轻工业和农业的错误。这些错误毛主席都指出了，也进行了讨论，并且成为中国的借镜，苏联的经验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非常珍贵的。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没有预料，可能也是无法预料到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问题，也就是出现了修正主义的问题。苏联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是到了 1953 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才揭露出来，才明朗化起来。在 1956 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大会上，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作出全面否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 1963 年 9 月至 1964 年 7 月发出九封批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简称九评）。九评清楚地确认了那时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方向，也确定了从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中国所执行的一切反修和防修的政策，其中当然包括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1998 年，在庆祝《共产党宣言》150 周年纪念时，艾兰·美克新·武德（Ellen Meiksins Wood）¹为了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失败了，这样说：失败的原因是苏联企图实行社会主义，但是却不具备马克思所说的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她的意思是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才具有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的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生产力发展已经很前进，无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很多，而且有组织、有纪律。他们可以起来进行革命，推翻生产工具私有制，建立生产工具公有制，改变按资分配的资本主义为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进一步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武德认为苏联没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所以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在这篇文章中，她只字不提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因此，我的推测是，她认为在讨论社会主义时，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价值。

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仍然落后的俄国和中国。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要从历史事实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到目前为止，无产阶级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历史事实，再者，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俄国和中国，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胜利，实行了社会主义，这也是历史事实。我们不能不顾历史事实，硬说社会主义不应该发生在资本主义仍然落后的国家，难道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即使是革命条件已经成熟，却不准革命？一定得等待着资本主义发展？103 年前，列宁分析了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垄断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时在帝国主义薄弱环节的俄国，有进行革命的机会，俄国革命成功证明了列宁的分析是正确的。

中国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武力和经济侵略，在长久的封建制度下，中国的生产力不能发展，清朝无法抵抗外来的侵略。清末时，多少有志青年都把希望和努力放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毛主席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 1911 年由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却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和资产阶级软弱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中国资产阶级对外无法抵抗外资，对内统治需要依靠地主，因此，资产阶级无法领导结束封建的民主革命。毛主席看到了资产阶级无能无力领导民主革命，因此得出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这就是毛主席所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一点在毛主席所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得极为清楚。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目的当然不会是要发展资本主义，目的当然是发展社会主义。

我们既要反对只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看法，也反对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看法，因为两者都不合历史事实。我们也不赞成把

¹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fter 150 Years, *Monthly Review*, May 1998

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生产力不够发达，作为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我不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我们用心分析和认识中国解放后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的结论会是：30年社会主义发展是非常成功的，完全不是像资产阶级所宣传的，说社会主义是失败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三十年（其实只有20年，因为前10年还是从战争恢复时期）不论从提高生产力（农业、工业、交通、通讯和生产技术）来说，或者是从普遍地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和品质来说，包括对人民基本生活的保障和对健康、教育、文化各方面的提高，都是极为成功的。同样重要的是，在这30年里，中国坚持反抗帝国主义，争取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在二十世纪，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解放，只有在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干涉才能完成，毛主席所说的，同样适用于21世纪的今天。另外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实践证实了，只有无产阶级有坚决反抗帝国主义的决心，而资产阶级总是贪图要从帝国主义那边拿到些什么，拿到资金？还是拿到技术？在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斗争中，中国对世界上弱小国家做了各种协助和支持，包括对它们国家建设的支持和对他们不结盟运动的支持。中国的领导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把解放全世界视为自己的责任，在1956年苏联走上修正主义之后，中国更领导了全世界反对修正主义的抗争。在那个让人兴奋和骄傲的年代，中国反帝的成绩，给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未来带来极大的希望，看到了终有一日，帝国主义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陈述了这些之后，我们也必须承认另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苏联和中国在实行了一段社会主义后，就走不下去了。苏联在1956年变修了，中国在1976年走资派夺取了政权，变成新的资产阶级，把中国带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并不能说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失败了，我认为原因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被走资派夺走了。我得到这样的结论，是从分析解放以后两条路线斗争得来的。但是得到这个结论后，又必须让我们进一步问：社会主义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因，以及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走资派如何在七十年代底取得胜利。我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说明了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些资本主义的因素，又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有关系。马克思说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要一步步地消灭，因为有商品生产就有资本主义因素。1956到1976的20年中，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商品生产不断地增加，商品生产在总量上和在生产的比例上都在增加，因此，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地增长。虽然我们不能说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说如果在生产力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失败，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生产力发展的落后，会导致社会主义发展上的困难，给社会主义发展造成许多限制和很大的挑战。这篇文章中，我将尽我所能将这些加以分析和说明。但是我所能了解的有限，而且缺乏调查，所以我非常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讨论。我不认为将当初革命者道德的堕落说成社会主义走不下去的唯一原因。

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不能期待圣人不断地出现，早一辈革命者的牺牲和忘我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是应该永远受我们尊敬和感谢的，但是他们不是圣人。他们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牺牲自己，原因是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的国土长期受到外来的残酷的践踏，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机，而中国的统治者从满清到民国只顾贪图自身的利益腐败，更根本的是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毛主席的领导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中国人民是可以推翻这个吃人的制度，靠人民自力更生的力量来打到一切外来的侵略和欺辱，再次建立中华民族的信心。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先辈革命者肯定了他们对自己生命所作的选择。的确他们中间有些人从清廉为公转变成腐败贪污，但是基本上这个转变发生在资本主义改革之后。在社会主义时期很多官员有很大的权，也掌握着庞大的资源，但是官员们没有将权变成钱的管道，改革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不但权可以变成钱，而且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将权变成钱合法化，合法和非法之间的界线也就模糊了，何况很多非法贪污是由上面的人带头在作。

我这里指的走资派并不只是他们道德败坏了，而是共产党中有一部份人在他们入党时就不认同社会主义这条路，他们加入共产党是因为看到唯有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到了解放后，他们也赞同新民主主义，和在新民主主义下执行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就不赞同了。因此，他们是非常反对文化大革命，到这时他们感到革命革到自己身上来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民主，领导要接受群众监督，以及阶级斗争必须要继续，所有这些都不能接受，而且极力反对。他们依然相信中国自古传下来的“打天下、坐天下”的想法是完全赞同的。这就是两条路斗争在意识形态上不可能有共同点的原因。

早在 1976 年之前，中国的走资派就已经对社会主义的成绩进行了各种攻击和毁谤，资本主义改革之后，他们就更进一步对社会主义进攻，不但宣传中国社会主义失败了，并且把对社会主义发展贡献最大的工人和农民用“大锅饭养懒汉”和“打破铁饭碗才肯工作”来污蔑。四十年来，中国新资产阶级对内和对外宣传社会主义失败所造成的影响是极大的。不仅是世界上的右派，连大多数的左派也相信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失败的，帝国主义更是极力宣传中国的社会主义失败了。因此，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帝国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全面胜利的结论，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也就是说，除了资本主义已经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即所谓的 TINA (There is no other alternative.)。这时在跨国资本的支持下，帝国主义以新自由主义做招牌，启动了跨国垄断资本在全世界大幅度的扩张。与此同时，落后国家的统治阶级也被迫承认他们的是无路可走。二次大战后，许多国家曾经想要独立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在帝国主义围堵下，和它们本国的资产阶级过于软弱，无法靠他们来实现二次大战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来实现民族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到了八十年代，这些国家必须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接受留给它们唯一的一条活路，那就是必须接受在新自由主义下，跨国资本对世界生产分工的新安排。这些国家的政权在它们的国家里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几乎所有对跨国资本的限制，包括对外来投资和外来贷款的限制，并且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劳动市场的管制、取消用关税来保护本国的工业、取消对保护自然环境和工作的立法和政策等等。由此可见，跨国资本和代表它的帝国主义如何利用“中国社会主义失败”的谎言，趁机扩张它在世界上的影响。但是 40 年之后的今天，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确已经走到尽头。

在苏联走向修正主义时，中国的革命者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指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国反修和防修斗争的策略，和中国具体加强无产阶级力量和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政策，这一切给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带了希望。但是当中国走向了资本主义之后，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再度失去了方向。大多数发展落后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但是这些国家里，仍然有革命者，追随着毛泽东主义，英勇地坚持着武装革命斗争，但是在这革命的低潮时期，他们的力量终究是薄弱的，他们急需支援，特别是进一步提出今后全世界革命的方向，以及鉴定马、列、毛的革命理论和发展当今的革命策略。

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为什么明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却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作幌子？欺骗人民？原因就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拥护和支持，如果走资派确认社会主义真的是失败了，资产阶级完全可以说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失败了，现在该由我们领导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为什么他们不敢这样做？另

外，由毛主席创立和领导的共产党如果真的不得人心，资产阶级完全可以将共产党解散，另建一个新的政党，好几个东欧国家就有这样的例子，但是资产阶级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的作法是利用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拥护，把他们推行的资本主义说成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利用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借着这个党来彻底推翻社会主义，建立起资本主义。

40 年之后，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已经认清了今天的共产党的真相，他们看清了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再依靠人民，已经不再为人民服务，他们亲身体验到劳动人民在改革开放后的处境，原来在社会上被尊敬的工人阶级，如今成为弱势群体，工人亲身体验到当他们的劳动力被当作商品买卖时，工人失去了生活的保障，也失去了劳动者的尊严。农民在人民公社被迫解散后，无法抵抗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对他们的欺压。几亿农民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丢下了自己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亲人，出去打工以便寄钱来养活家人。这些离家到外谋生的新工人，和被解雇的前国有工厂的老工人承受着各种艰难，工资低、没有福利、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新工人更承受了没有工作地方的居留证，因此子女不能上学，他们被强迫承受与自己的子女和父母分离痛苦。在今天中国的社会里，以前已经被铲除了的人剥削人、人欺压人的事件，每天每时都不断地重复着。钱财不断地往上流，往有政治权力、有资本的方向流，让极少数人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这些人把他们的子女送去国外，在美、欧、加拿大等国的大城市，他们大量买房置产、开豪华车、戴高价的珠宝，成为当地极为引人瞩目的富有华人。这些富豪子女带走的财富都是中国劳动人民辛苦工作，却满足不了生活上基本需要的积累（每年在数字庞大的 GDP 里，中国人自己的消费只从 30% 多一点增加到 39%）。在这样的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两极分化的社会里，当政者却不断地提倡所谓和谐社会，难道他们真的认为有人会相信？

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除了最富有的贪官污吏和私有公司的老板外，还有不少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过着相当好的日子，这些人生活的富裕，每年有余钱可以去各处旅游，他们对目前的生活是满意的。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中多数是已经工作了多年，年纪比较大的，甚至已经退休的知识份子。年轻人为了能够达到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而拼了命地努力，但是他们发现要实现这个梦想，越来越困难，他们几乎要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比起一般劳动者他们的生活的确好多了，但是他们长期不顾自己健康的过份劳动能够持久吗？几乎耗尽了生命换来的比较舒适的生活，值得吗？

许多曾经在社会主义生活过的人对过去是怀念的，那时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有保障。社会是公平的，而且生活的有尊严、有希望。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合理的，政府官员是清廉的，没有人可以靠政治权力而致富。这些人仍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他们中间包括忠诚的共产党员，其中有些人基于过去对共产党的信任，以及他们自己到目前没有遭受生活上的各种困难，而且还能够过着小资产阶级相当富裕的生活，因此对当今的共产党虽然不满，但是仍然寄予希望，他们认为共产党过去也曾经犯过错误，但是经过整党，共产党把错误纠正过来，仍然可以回到正确的路上去。40 年过去了，在这 40 年里，共产党每一个新的领导出来，这些人都会对这位新领导寄予无限的期望，他们会细心地观察他的言行，耐心地聆听他的讲话，一厢情愿地去解读新领导每句话的意思，他们是真心的不想要放弃对共产党的希望，这也难怪他们，在他们的一生中，中国受尽了外国的侵略和欺辱，人民受尽了极端的苦难，是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给中国带来新希望、新生活、和做人的尊严。尽管他们对现今社会怀着各种不满，但是他们不认为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当今的共产党。因此总的说来，资产阶级一切欺骗的伎俩，到目前为止，对这些人来说，是相当成功的。对这个骗局我们一定得揭穿，而且一定可以揭穿。如

果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经历过的两条路线斗争，将会有助于认识今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继续斗争的事实。社会主义时期，走资派所要执行的各种政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人和农民坚持抵制，堵住了他们的路，这些政策今天在资产阶级专政下可以敞开地、无遮掩地实行。只要把他们所有要执行的都归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口袋里就行了，他们这样没有任何真实性的谎言还能维持多久？

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路线的斗争，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要增强劳动人民（工人与农民）的力量来和资本作斗争，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的一切具体政策都是根据这个目的来制定的，这就是社会主义路线。资本主义路线则是用一切力量来打击劳动人民，以便增强资本的力量来建立和培养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为了加强劳动人民的力量，社会主义路线建立工人与农民之间紧密的联盟，并且尽所有力量来加强和巩固工农联盟。资本主义路线则是尽一切力量打击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团结，并且竭力破坏工人与农民之间的联盟。

上面说过了，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都是成功的，但是资产阶级夺去了无产阶级的政权。这篇文章将分析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是成功的？并且尝试分析为什么资产阶级可以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实践期间，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力量在支持资本主义路线？以致这股力量可以强大到夺取无产阶级的政权？与资产阶级相比较，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以致失去了政权？在被夺取政权 40 年之后，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资料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我在这里作一些初步的尝试，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将这些问题想清楚了，因此可以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而只是根据我自己的分析和思考得到一些初步的答案，写出来供中国马列毛主义者做参考，更重要的是要请他们纠正错误，并且补充内容，以便能够正确地 and 完整地对待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

解放后的两条路线斗争

这一篇文章将用具体的发展策略和政策来说明在 1949 年到 1976 年中，两条路线的根本差别，并说明两条路线的斗争如何贯穿了整个社会主义的二十年，直到走资派夺取政权，成为新的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仍然继续到今天，并且因为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两条路线斗争也就随着资本主义改革越来越明朗化。两条路线斗争从解放开始，持续到今天，更会持续到未来。这篇文章将用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解放后在各个领域里，主要是集中在生产领域里，社会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从 1956 年到 1976 年，中国社会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向前迈进，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的各种建设，阻挡了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地对中国的各种干扰，独立自主地完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建设。

在前言中，我表明我不赞成学院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失败的分析。我当然也不赞成资产阶级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失败了，是因为社会主义违背人性的自私和贪婪。我从根本上就反对社会主义失败的这种说法，只要实事求是地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果进行分析，就会得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是成功的结论，无论从生产力在 20 年内快速的发展来看，还是从在这 20 年里人民生活基本需要和教育、健康、文化各方面普遍提高来看，都是非常成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普遍的提高，而且改造了

旧社会，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和新社会生活的人。虽然有如此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得承认，在197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就不能继续走下去了，不能继续走下去的原因，不是社会主义失败了，不能继续走下去的原因，是走资派夺取了无产阶级的政权，成为新的资产阶级。

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不顾历史的发展，教条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即使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他们也肯定它们没有发展社会主义的条件。我反对他们看不到历史现实的固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生产力发展不足对发展社会主义所产生的限制和挑战。

生产力发展不足使得在中国革命成功后，没有办法成立一个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中国在工业上成立了全民所有制，但是在农业上只能成立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也属公有制）。如果是一个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生产已经非常集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后，这个国家就可以把大型农场接收过来，或者赎买过来，把农业生产的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在像中国这样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就不可能这样做。因此，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就只能有两种（或者多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并存。在中国两种所有制并存，造成了许多限制和挑战。直到七十年代初，这些困难和挑战在毛主席领导的工农联盟的政策下被克服了，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两种所有制并存的矛盾却越来越严重。这个矛盾，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为走资派制造了夺权的好机会。这一点在这里先作简短的说明，之后，在文章中，将作较详细的说明和分析。

土地改革后，全国各地农业的发展差距非常大，即使在一个地区，譬如说在长江流域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也还有较富有的省和较贫穷的省；即使在江苏省内，也有发展程度较高的苏南和发展程度较低的苏北，而中国沿海地区跟内陆地区的差别就更大了。在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时，曾经有过以生产大队（一个村的大小）作为核算单位的尝试，但是即使以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都有问题。因为在一个村规模大小的大队，有几十家农户，这几十家农户的生产力在生产工具所有上，和在每家有多少劳动力上都不均等。如果把他们归在一个生产单位（核算单位），就会把他们的收入平均化，把有些家庭的收入拉高，把另外一些家庭的收入压低，这就是当时反对“一平二调”的批评。“一平”就是把收入平均化了，“二调”就是把一些家庭的资源给调走了。因此，最后只好改为以十几家大小的生产（小）队作为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

走资派对集体所有制的批评是，农民在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下没有生产的积极性，因此他们鼓吹“三自一包”的政策。“三自一包”是扩大自留地和自由市场，和农民向国家订包产到户的合同。他们认为用这些所谓“多产多得”的伎俩可以鼓励农民多生产。其实，集体所有制的问题不出在生产力不能发展，而是来自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怎么说呢？一方面，集体所有制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普遍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生活（这一点会在文章中作详细的说明）。但是集体所有制有它的限制，这个限制使得在集体所有制下，虽然在一个生产队内，每个农家的收入得到平均，在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之内，农民的收入有所平均，但是集体所有制不能拉平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产水平和收入，更不能拉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收入。因此，在人民公社之下，虽然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普遍的提高，但是公社与公社之间的差别却是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富社更富，穷社却越跟不上。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富的公社和穷的公社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说明了在集体所有制下，产生了两极分化。而农村的连极分化，非常不利于工农联盟。

一个较为富有的公社，每年生产多，除了社员收入多，每年的公积金也多，也就是可以用来投资的积累多，这个公社肯定比一个较贫穷的公社要发展得快。因为收入低的公社，在扣除了社员生活所需之后，所剩下的能够放入公积金的部分不多，不能和富有的社相比。这就是为什么富社更富，穷社与富社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这样的两极分化到了七十年代初更加严重。因为一些富的公社和大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工业利润，也就是收入扣除成本比农业要高，回收也比农业要快。农村工业的发展是件大好事，但是农村工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导致农村经济的两极分化。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本来就是农业发展最高的地区，在人民公社进行工业化时，也是工业发展最快的地区。随着工业的发展，这些公社有很多资金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这些公社社员除了收入高以外，能享受到的各种福利也是非常高的。相比之下，发展较落后地区的贫穷公社，无论在生产建设上，还是在社员生活上，都与这些富有的公社相去甚远，根据一些资料说明富社与贫社之间的收入的差别，可能达到十比一之大。

对这种农村两极分化的情形，国家能够做的有限，因为是集体所有制，所以国家不能调动集体所有的资源，把富社的资源分配给穷社。国家规定，工业发展较快的公社应把工业所得利润的40%用来支持农业的发展和用作公社的公益金。许多有工业的公社对这样的规定并不满意，因此，造成了国家与集体之间的矛盾，这样的矛盾也就是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因此削弱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盟的基础。在劳动人民中的工人和农民不能结成紧密联盟时，就给了走资派非常有利的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机会。

另外，在生产力不足时，农村两极分化不能很好地体现集体所有制内的按劳分配。因为贫穷的大队和公社的生产不足，每年的收入除了付税和扣留公积金和公益金之外，再扣除队员的口粮外，剩余不多。按照工分来作分配时，每个工分所值非常有限，所以虽然有的社员努力工作拿到的工分不少，但是换成收入却是非常有限。这就无法实现集体所有的按劳报酬的原则，对贫穷社队的农民会有发挥劳动的积极性问题。

这篇文章将解放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分作三部份，在每一部份中再分成几个小节来作陈述，每一部份的最后有一个总结，全文最后有一个根据三部份作出的总的结论。另外，这篇文章有三篇附录，每一篇都对重要议题的进一步讨论，希望读者能够阅读。我将这些讨论放在附录里并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不想把主文的论述过于分散。

第一部份：农业发展的两条路线斗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土地改革

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在最初发展时经历了一场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是新生资产阶级取代了地主成为统治者，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主义。在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包括1949年革命之前的中国，多少年来都无法完成土地改革，以便结束封建制度，因此无法完成民主革命，进行资本主义发展。为什么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法领导和完成民主革命？毛主席在他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给我们作了解答。毛主席的分析不仅根据中国长久的封建历史，

而且根据总的世界情势。毛主席这样写到，在 1914 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前，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然后，毛主席接着说，在 1917 年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改变为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来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毛主席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整个世界的发展连在一起作了分析，说明了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之后，整个世界革命性质的改变，因此，也就决定了革命策略的改变。

毛主席接着分析了在俄国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将更加依赖苏联之外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才能生存，在这个新时代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反帝国主义，及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属于旧式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了。这个新的范畴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因此，这种殖民与半殖民国家的革命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主席再接着说，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绝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而是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完成革命的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主席更进一步说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他说的完全适用于 80 年后的今天。他这样说，“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革命力量的一部份。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我们了解了毛主席对世界革命的分析就了解了，1949 年后中国的土地改革是无产阶级革命后取得的成绩，它是为社会主义铺路，它不是为资本主义铺路。我们也同样可以了解在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80 年之后，落后国家的“英雄好汉”们即使是打着民族解放的旗号，自称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还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成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因此，他们无法完成土地改革。今天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仍然是由地主和资本家结成的，与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合作的反人民、反世界革命的力量。

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与农民紧密的联盟下完成了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统治，土地改革将几亿的农民从暴力的、残酷的、极端剥削的封建体制下解放出来，中国的土地改革无论从土地和人数的规模上，还是从速度上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所领导的土地改革并不是一般从上到下的将土地分发给农民，中国的土地改革是经过一场发动群众运动来完成的。在广大的农民（尤其是占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积极参与的运动中，他们深深地认识到他们世代所承受的痛苦根源来自地主对他们的剥削与压迫，在土地改革的运动中，农民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跳耀性的变化，这场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为未来农业集体化奠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在农业现代化上的分歧

从革命开始，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由工人阶级领导，工人与农民建立紧密的联盟。毛主席深深了解在发展落后的中国，工业化尚未真正开始，取得革命的胜利，少数的产业工人必须要和中国广大的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中国的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首先完成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结束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取消地主世代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在革命战争中，农民贡献出他们的一切，包括用他们的生命来支持革命。没有主要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的英勇战斗，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参加了武装斗争后，普通农民变成了革命战士，在反帝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对日本侵略者和反动的国民党作出英勇奋战，取得胜利。在后来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些革命战士成了共产党的中坚干部，他们领导了土地改革，和土改之后农业集体化，以及集体化后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内对土地改革没有争论，因为不管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必须结束封建制度。但是差别在中国的民主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革命之后，只能走社会主义的路。

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内最大的争论就是中国未来的农业政策。长久以来，耕地不足一直是中国发展农业难以克服的问题。土地改革后，每户农民平均只拥有 0.2 公亩的土地，贫农、下中农和雇农所分到的土地更小。除了耕地面积小之外，土地非常贫瘠，其中一个原因是长久以来地主只顾用收租来剥削农民，但是却不肯花钱来保养土地，这说明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发展生产力。再加上长达一百多年的战争导致大部份农田灌溉设施（包括解放前修建的水利设施）都已荒废。1949 到 1952 年，除了土地贫瘠和荒废了的农业基础设施外，农民更缺少农具，很多贫农、下中农和以前的雇农连最简单的农具都缺无。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第一次拥有一小块土地，他们尽了最大努力，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粮食和棉花的产量。但是基于所有的这些客观上不利的因素，即使他们有更大的积极性也无法继续增加生产。到了 1953 年，粮食不再增产，棉花产量反而下降。不仅如此，一些农村在 1953 和 1954 年间还经历了旱灾和水灾，个体小农户无法抵抗这些天灾。另外，五十年代初期，农民因为长期营养不足和农村根本没有医疗卫生设施，一个家庭里有人生病，甚至早逝都是经常发生的，但是这些天灾和人祸都是个体农户无法应付的，他们常常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不得已欠下了债，当债堆积起来之后，农民开始出卖刚才分到的土地来还债，自己再去给别人耕田。在集体化开始前，卖地的农户和受雇的农民都在增加。² 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在土地贫瘠的中国小农耕种经济是不能长久持续的。经过一段日子，在两极分化下，土地必然会再度集中起来。而且落后的小农经济无法满足人民食物的需要和工业发展原材料的需要，只有将农业现代化才能解决中国面对的生产力不足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内对于中国农业必须要现代化是没有争议的，共产党内的分歧在于如何将中国农业现代化。由刘少奇所代表的共产党员主张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要有了工业基础之后，他们认为只有到中国能够生产足够的钢材，和掌握了制造农用机械的技术后，中国农业才具有现代化的条件。虽然唯物主义认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关系是矛盾中的非主要方面，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可以转变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毛主席把生产力永远地、固定看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主张批评为机械唯物论，也就是说机械

²见苏星：“土地改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经济研究 1965 年第七期，24 页。

唯物论者认为提高生产力当作作为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必要因素，他把这样的看法批评为“唯生产力论者”。毛主席的看法和他们不同，他认为当落后的生产关系妨碍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像中国的封建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时只有改变生产关系（消灭封建制度），生产力才能得到发展。土地改革之后，毛主席认为农业的发展可以进可以通过将农民组织起来，改变私有的生产关系为集体所有，把生产规模扩大，来为现代化创造条件。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可以转变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论。

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很多，他最伟大的地方之一，就是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的力量，试想看如果毛主席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他如何敢在中国发动革命？中国人民面对着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由美帝支持的国民党，如果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只看军事力量的对比，谁能相信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可以战胜他们？毛主席看到在农民参加了革命后，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经过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已经成为革命战士。在革命战争上，毛主席不但相信中国人民可以战胜帝国主义，而且认为中国人民一定会战胜帝国主义。在农业发展上，毛主席同样地看重人民的力量，他对农民的认识是从他的革命实践中得到的，从毛主席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农民组织的能力和他们的战斗决心非常佩服。农民有能力有决心组织起来与地主对抗，当然他们也会有能力和决心组织起来改造他们的生产条件，全心全力地，为改进他们和他们后代的生活而努力。毛主席看到经过集体化，农民完全可以克服作为小生产者对他们的局限。

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成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不管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但是在土地改革完成后，虽然农民拥有一小块土地，极少的生产工具，因此，在缺乏农具和农村基础设施荡然无存的情况下，只靠农民个体的力量生产是无法提高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正是因为毛主席对人民力量的信任，他认为当农民组织起来，通过集体所发挥的力量将是其大无比的。无论是中国的解放战争的胜利，还是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成绩都证实了毛主席是对的。解放之前，大部份中国人都是农民，在封建制度下，他们从早到晚辛苦耕耘养活着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但是却被“知识人”看成是最无知、最愚蠢的人。旧社会的“知识人”不会去想，农民之所以无知是因为他们生产的剩余都被抽走去养活统治他们的官吏和士大夫了，农民不但没有任何剩余可以用来提高他们的知识和文化，更是连饭都吃不饱。但是毛主席却从来不从“知识人”的视野来看农民，他相信农民，他相信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农业集体化的成绩再一次证明毛主席是对的。而走资派则是跟毛主席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从来不相信人民，他们把中国最勤劳的农民污蔑为“懒汉”，他们认为只有用“三自一包”把农民的利益分割成一家一户，农民才会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努力工作。

（三）集体化中的两条路线斗争

在整个农村集体化的过程中，都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农民中，贫农和下中农是最支持集体化，上中农和富农是反对集体化的。贫农和下中农占农民大多数（60%到70%），他们只拥有一小块贫瘠的土地，生产工具缺无，在这样的条件下要他们独自发展来增加生产是极为困难的。上中农，特别是富农拥有较多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他们若是单干，可以雇用农工来增加生产，增加积累，以便购买更多的农具，也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来扩大再生产，他们是通过单干来发展生产的，因此，他们反对农业集体化。在农民里，中农则是持观望态度，他们要看集体生产是否能增产再决定是不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了

重要的政策决定。首先，农业集体化一定要在农民自愿选择下进行，只有这样才会有稳定的基础，其次，在进行集体化时，政策要坚持依靠贫农和中下农，争取大多数的中农。因此，集体化一步步进行中，增加生产变得极为重要，不但要增加生产，而且要在很短时间内（一年或两年内）能够增产。当大多数中农看到集体可以增产的优越性而决定加入时，集体化就基本成功了，因为在大家都入社后，富农就是有田、有农具也雇不到农工了，因此，他们即使不情愿，也只好参加了。

农村集体化从合作组开始，经过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 1958 年成立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一个三级所有的农村集体组织，生产队由约 15 到 30 家农户（1962 年平均 24.9 户）组成，是三级所有制中最基层的一个核算单位。生产队拥有土地和简单的生产工具，每个生产队由组成的农户选出他们的生产队长，生产队长不脱产，他（她）负责筹划每年农作物的生产，劳动力的安排，和产品的分配。文化大革命之后，每个生产队还有一个不脱产的赤脚医生。生产队要从每年的收成中，拿出一部份缴付国家税，再拿出一部份作为公积金（交给公社用来添加农具和其它的投资），另一部份做公益金（交给公社用来支付保健和其他福利），然后再从收成中给每个人留出口粮（按年龄和工作强度来决定），最后剩下的部份根据每个社员的工分（出工的日数乘以每日所得工分）分给参加生产的人。在生产队之上是生产大队，大队相当于一个村的大小。1962 年每个大队平均有 7.9 个生产队。再上层就是人民公社，约一个乡的大小。1962 年平均每个公社有 9.4 个生产大队。

生产大队有比较大型的农机，供给大队的队员使用，大队还有用来为谷类加工的机器（像脱谷机和磨粉机）和一些便利队员的设施（像缝衣机等），大队还设置了猪和各种禽类的畜养场，到了六十年代中，不少大队办了自己的工厂。人民公社则是农村主要的行政单位，它负责管理农、工、商和所有社员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以及为贫困和没有子女的家庭提供五保的福利。人民公社还有自己的民兵，负责自卫。人民公社负责向生产队和大队收税，缴税给国家，负责用公积金购买较大型的农机和修建各种农田基本建设。一般较大型的灌溉建设，人民公社无法负担，因此，由国家与人民公社合作，国家负责资金，人民公社提供劳动力。

（四）工农联盟的新物质基础：农村集体化与农业现代化

中国解放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的，解放战争时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是农民参与武装战争。战争胜利完成解放后，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结束了几千年来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土地改革奠定了革命时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毛主席说土地改革后，中国的农民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拥有一小块土地，工农联盟必须要建立在一个新的物质基础上，这个新的物质基础就是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时期，通过农业集体化，建立了人民公社和国家的关系，在发展农业和农村下，建立了新的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从而巩固了工农联盟，在劳动人民紧密联盟下，支持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

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完成后，工人和农民在这个新的基础上进一步结成联盟。集体化防止了农村的两极分化，增加了农业生产。如果没有集体化，中国的农村一定会再次经历两极分化，再度出现富农、中农和贫农，那么工人要跟谁去联盟呢？除此之外，在集体化之前，只有富农家里有多余的粮食，他们将粮食卖给城市里的粮商，因此，造成富农和粮商之间联盟的机会和条件。为了防止农村富农和城市粮商之间的联盟，中国政府在 1953 年时，成立了粮食和棉

花的统购统销制度。在统购统销的制度下，政府直接向农民收购粮食和棉花，再将它们供给工业和消费者，这样就堵死了富农和城市商人之间的联盟。中国土地改革和农业集体化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社会主义路线取得胜利。难怪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为地主和富农叫冤。

中国农民在长久历史上并没有集体合作耕种的经验，集体化能够成功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领导，包括共产党坚持依靠贫农和下中农的政策；另外就是中国农民对共产党的信任，还有一个成功的原因是农村的干部所作出的贡献，这些不久之前才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农村干部，从来没有过带领农民进行集体化的经验，但是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贫穷农民的家庭，他们对贫穷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关怀，他们凭着自己的阶级立场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尽他们所有的力量来组织农民，完成党交给他们的任务，土地改革之后，他们再一次完成历史给予他们农业集体化的使命，在集体化完成后，这些基层农村干部，继续带领农民与自然搏斗来发展农业。

农业集体化后，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建立起关系，即农业发展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农民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工农联盟是最重要的策略。在工业化程度尚低的中国，虽然在解放后，产业工人的人数增加得很快，但是产业工人在整个劳动人口中还是占少数，而农民则是劳动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只有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劳动人民才能取得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可能和胜利。代表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在工农联盟的策略下，不能只照顾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照顾到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

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工业化起步时，发展的资源必须来自农业。差别在工业有了发展之后，发展的剩余是否回馈给农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下，因为工业的投资利润高，回收快，所以社会的剩余会投向报酬高和回收快的工业，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的发展因为投入少，要比工业发展慢得多。那么在今天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农业发展缺少资源就更明显了。在落后国家的发展（其实是不发展）过程中，社会的剩余一部份被帝国主义国家抽走，而农村农业的剩余更进一步被城市的工业抽走，所以农业无法发展，农业的停滞与凋谢，造成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在六十年代时，美国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研究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他们想说明和解释这些国家不发展的原因，他们其中一些人指出，落后国家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国家将所有的剩余都投向工业，而它们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缺少有机的联系，因此，即使工业有些发展也带动不了农业的发展，造成城市与农村之间各自孤立存在着，他们把这样的结果称为“二元化”的经济，其实“二元化”的经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这些经济学家也提不出解决的办法，到了七十年代之后，经济发展这样的课程也就在经济系里消失了。

只有在社会主义下，社会的剩余要投在哪里不再靠市场来决定，而是靠国家的计划，国家通过计划来调配社会的剩余资金。在第一次五年计画（1953-1957）中，可用的剩余资金稍向工业倾斜，就造成农业对工业原料供给和对都市消费供给的紧张。毛主席在《十大关系》中指出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以及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指出中国虽然要将发展的重点放在重工业上，因为重工业是生产生产工具的基础，但是不能忽略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发展了轻工业和农业才能保证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资料的供给和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的供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确定了工人和农民之间互利的经济关系，这就是工农联盟的物质基础。在毛主席写了《十大关系》的论文后，具体的经济政策就是虽然重工业的发展重要，但是不能过

分注重重工业而忽略了轻工业和农业。《十大关系》说明了农业发展的重要，也就是虽然最初的工业发展要向农业吸取资源，但在取得一定的发展后，资源必须要投向农业，在计划经济下，国家可以特别注重对农业所需的工业品的投资。

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维持着彼此支持的密切关系，农业的生产为工业提供原料和工业品的市场，为都市人提供生活资料。工业为农业生产提供农需的工业产品，主要的有化肥、杀虫剂、除莠剂、各种农机和发电，以及灌溉的各种机械。国家计划逐步提高对这些农用工业产品的投资，并且逐步降低这些农用工业品的价格，以便人民公社和大队可以有能力的购买。到后来农村工业发展时，城市全民所有制的工业将比较过时的机器转给农村的工厂使用。在此之外，国家更逐步提高在农业基础建设上的投资，因为建设大型水利系统，像大型的灌溉渠、蓄水池和水坝等，费用庞大，集体无法承担，都是由国家投资。国家掌握着工业生产剩余的全部，这些剩余就用来投资在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和农业及的发展与农村的建设。从表一中的数字可以看出国家如何用实际的资源分配来巩固工农联盟。

表一 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几个经济指数

	1957	1978
农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百分比	7.8 (a)	12.5 (b)
农用机械的投资占重工业投资的百分比	3.0	11.1
农业税收占国家总收入的百分比	9.6	2.5
国家对农业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7.4	12.6 ©
农业 / 工业产品交换价格指数	130.4	188.8

(a) 1953—1957; (b) 1976—1978; (c) 1976—1977

资料来源: Nicholas R. Lardy,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30-131;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3, 445-447; 许毅, 陈宝森, 梁无瑕着,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2, 76

从表一中的数字可以看出，从 1957 年到 1978 年，当在经济有了初步发展之后，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比率增加（也是实际数量的增加），国家在重工业的总投资中农业机械的投资比例的增加（实际投资数额也增加），在国家的总收入中农业税所占的比例下降，在国家的总支出中农业的支出比例升高（实际支出数额也增加）。另外，在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交换价格指数上提高，也就是减少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在交换价格上的剪刀差。这些数字都表现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在经济发展有了初步的进展后，国家把在经济发展初期从农业所抽取的剩余，以各种方式回馈给农业。

另外必须要提的是，工农联盟并不止于经济上的范畴，更包括了农村的教育、保健、和文化。取消都市和农村的差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取消三大差别的目标之一。这一点将在另一节中作解说。

（五）集体化下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

农业集体化的成绩可以归纳成下面几点：

1. 农田基本建设奠定了农村现代化的基础

因为中国的可耕地少，人口多，土地改革后，每家农户平均土地仅0.2亩。在约占全世界9%的耕地上，要生产供世界22%人口所需要的农产品。唯一能够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尽一切人力来增强土地的生产力，提高每亩土地的产量。不仅如此，中国的农业生产常常遭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这就使修建各种农业基础设施成为发展农业必要而且急迫完成的艰巨工作。

人民公社成立后，农民用极大的劳动量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包括平整土地，就是将不平的土地（像小山丘）铲平，把小的河沟填平，把小块土地连成一大片，为将来用农机耕种做准备。农田基本建设还包括修建农田的灌溉系统，建筑水坝以便灌溉防旱、蓄水池则为排水防洪。为了增加亩产，农民将人和畜类的粪便加以处理后作为有机肥料，并且在气候允许的情况下，把一年收成一次增加到两次，两次增加到三次，因此，常常会在庄稼的收成的时刻几乎要同时进行播种。另外，农民还用间种（两种不同的谷物隔排种植）来增加产量。所有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大幅增加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因为在还没有农机之前，所有这些工作都得靠农民肩挑手扛，步行好几里路来完成。像平整土地和修建灌溉系统都是农民在冬天播种和收成工作比较闲的时间进行，这样就增加了一年中农民的劳动日。在还没有铲土机的时代，所有的农田基本建设都是农民，一铲子一铲子把土铲起，再一担担用双肩挑着把土移走的。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使农民工作的强度和农民每年工作的日数都大幅增加了。从1958人民公社成立到1978年的仅仅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农民将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土地。根据一个估计，七十年代时，农民每年投入了80亿的人工日（一人投入一个工作日为一人工日）。³ 这样庞大的劳动力投入，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目，为农业机械化准备好了条件。大规模提高了使用农机耕种和用电力灌溉，为农业现代化取得辉煌的成绩。这样的成绩如果没有集体化，如果没有农民不惜辛苦的投入，是不可能完成的。

据一位中国经济专家托马斯·若斯基（Thomas G. Rawski）的调查，中国农民的工作日从五十年代的每年平均工作119天，增加到了七十年代中的每人每年平均工作250天，增加了一倍以上。若斯基是受世界银行在1977年聘请到中国作调查的，因为世界银行想了解当时中国政府的宣传是否属实，政府宣传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若斯基是研究中国专家，他把在中国的调查写了报告，后来出版成书。⁴ 这本书揭穿了资产阶级的谎言，书中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取得极大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的发展。农村的建设解决了集体化之前农村隐藏失业的问题。一般落后国家都有隐藏失业问题，（其实不是什么隐藏失业，

³ 见 Shi Bing, "More inputs to Promo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1 (1987) 8., 同时参考: Alexander Eckstein,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Model," i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A Compendium of Paper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88

⁴ 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A World Bank Research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79, 有关农民每年工作日的资料在第7页和第8页。

而是因官方无法统计这样的失业)也就是可以参与生产工作的人数,远远落在总劳动力之下。这样的失业问题,在落后国家无法解决,使得没有工作的农村人口不得不流往城市谋生,在这些发展落后的国家,农业不发展和都市挤满了贫民,本是一件事情反映出来的结果。农业不发展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农业生产利润低、回收慢,所以不能吸引投资,投资不足,就缺少就业机会,才有农村失业的问题。

中国的农业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农民大量投入的农田基本建设,和之后人民公社和大队办起来的五小工业,解决了农村失业的问题。事实上,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前,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已经充分就业。不但充分就业,而且在农忙时,有些公社和大队的工厂得暂时停工,以便工人可以协助农民播种或是收成。

新中国成立70年了,近些年来,许多知识分子也开始谈到资本主义四十年的发展是建立在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上。最近,我看到孙晓军发表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07期)》上的文章《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绩研究的三个维度》,文中指出了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集体农业下的许多成就。⁵在有关农田基本建设方面的成就,他这样说,1949年时中国大型水库只有6座、中型水库只有17座,社会主义30年的水利建设有非常大大成绩,一共完成了8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几百万个塘坝、大量的梯田和排灌渠道。

2. 生产技术改进与生产量提高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的二十年里,中国的农业生产持续增加。粮食生产从1952年的一亿八千一百万吨,增加到1977年的二亿八千五百万吨。除了1959—1961年之外,粮食生产以平均超过3%的幅度增加,高于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此一时期的增长率打破了中国过去粮食增产的纪录,也打破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纪录。⁶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在食品方面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中国在粮食的国际贸易只是用来平衡国内市场。例如,在1975—1977年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约四百万吨的粮食,仅占总生产的一小部份,而它出口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也是如此。⁷

人民公社与国家合作设立了四万多个农业技术推广与改良站,在县、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四级合作的网路下遍及整个农村。这些农业技术推广与改良站从事各方面农业生产研究,包括新种子的培植、土壤的改造、和嫁接等技术的改良和推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大学的研究农业的专家们,下乡来帮助这些技术推广站发展。这一切努力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准。在新品种培养上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经验,来自美国一个农业专家汤玛斯·威恩斯(Thomas B. Wiens)提供的资料。汤玛斯·威恩斯(Thomas B. Wiens)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地进行新品种的培育,靠的就是这些位于不同气候区域的技术推广与改良站之间的合作。他说:“杂交稻米异常快速地由育种进入大规模生产,这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它表明中国能够将作物培育成果以极快的速度推广到大规模生产,速度要比它国家快上好几

⁵ 孙晓军所指的三个维度是:(一)前30年农村集体经济对工业化资金积累的贡献,(二)前30年农田农村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三)前30年农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成就。

⁶ Henry J. Groen and James A. Kilpatrick,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ese Economy Post Mao, a Compendium of Papers*, submitted to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619.

⁷ 同上, 640。

年。在热带以外的大多数培育计划从开始杂交到大规模生产需要 8 到 10 年的时间，因为传统育种通常需要经过六到七代的杂交与选择过程，才能使杂交种籽的特性稳定下来，然后在试种中进行评估，最后才是大量繁殖、宣传与说服农民采用。中国已经组成了一个选种体系，每年可以生殖三代，这个体系通常包括三个改良站，一个在原产地省份，另一个在亚热带的南昌（江西省），第三个在热带的海南岛。……再者，透过“四级研究网站”（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建立，中国已逐步发展出一个体系，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达成同步完成稳定、选择适应当地条件的种籽、鉴定以及大量繁殖。”⁸ 这说明了如果没有通过集体下的培养品种的系统，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完成各种新品种的培育的。

3. 农村工业化的发展—社队办工厂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不仅是要在农业生产上跃进，而且要在农村工业化上跃进。具体来说，就是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工业产品，不只依靠城市里的工厂来供应，而是在农村发展自己的工业。最初发展的就是五小工业，包括钢铁、化肥、水泥、机械（特别是农机的保养和修理）和能源（包括煤矿）。“大跃进”中，农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像水灾和旱灾的自然灾难，也有一些在执行政策时所犯的错误，包括操之过急和因谎报收成而造成的过高的税收。另外，中国和苏联发生了政治上的争执，苏联要求中国马上还清在抗美援朝战争时中国欠苏联的债。在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工业无法发展，许多设起来的工厂也只好“下马”，到了1963—1964年时农业生产恢复稳定，农村公社和大队办的企业快速地发展起来，在仅仅十年的时间里，农村的工业蓬勃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1975年，一支由十二位美国学术界专家组成的访问队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是了解中国农村办的中小型工厂。访问队由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杜威·波克恩斯（Dwight Perkins）带领，十二位专家中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农业工程学家、化肥学专家和农业机械工程学专家等。十二个人中有七人会讲、会写中文，五人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中国方面由外交部的科学技术部门接待，由当时统计局副局长李成瑞带领到农村各地参观访问。他们一共参观了十个人民公社，五十个工厂⁹。这个访问团的报告由波克恩斯负责编辑，并于当年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小型工业》¹⁰一书。在书的导言中，波克恩斯对他们参观的工厂作了这样的介绍：这些工厂的工人至少50个人，多至600人，它们用的技术多半是本国的技术（不是最新的或是进口的技术），这些工厂都是人民公社或大队集体所有，它们的产品基本上是为农业服务的。根据这个访问队的观察，这些工厂不断地更新技术、不断地发展新产品和扩大生产的规模。另外，参观队还注意到，这些工厂的重要事情，根据是否适合地方上的需要，都是由地方决定，不必通过中央审核，免去了来回几上、几下地浪费时间。在导言中，波克恩斯强调他们这些参观的人了解到他们看到的不是一般

⁸ 汤玛斯·威恩斯（Thomas B. Wiens）：中国农业技术政策上和能力上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Policy and Capabilities in China's Agricultural Technology）美国国会有关毛后中国经济作证上发表的论文。US 95th Congress, 2nd Session, *Chinese Economy Post-Mao*, Vol. 1. Policy and Performance, November 9, 1978, 680.

⁹ 这个参观队从北京出发经陕西、河南、到东部无锡和上海一代到广州。（见 xi 页地图）

¹⁰ The 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7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的工厂，而是特别选定的发展特别好的工厂，但是这些优良的工厂给全国农村起了模范的作用。

访问虽然只花了28天，相当匆忙地走了一圈，但是他们提出的报告却不是限于表面的，而是把他们观察和收集到的资料很详尽地报导出来，包括将非常技术性的材料用图表和照片加以说明，另外，在第九章“小型工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这份报告作了非常有深度的全面分析，报告中说明五小工业增加了农村就业的机会，因为这些基层的工业为农业生产所提供的农用机械，减少了劳动强度。以水稻生产为例，农民省去了四种必须弯腰的工作，即播种、插秧、除草和收成。他们见证了，到了七十年代时，每年大量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农村工业的生产，中国的农村已经达到充分就业。这可以从在农忙的时候工厂需要停工，以便工人可以帮忙播种或收割的现象看出来。这份报告中还说到因为工业可以在农村发展，纾解了对城市所造成的各种压力。报告的第十章“对知识的普及和对思想的改造”中，观察团总结了农村发展工业对知识普及和对思想（意识形态）改造所起的积极作用。报告指出，第一个思想的改变是铲除了农民宿命论的想法，受他们采访的人这样说：“以前我们是地主和机器的奴隶，今天我们是驾驭它们的主人。”第二个思想的改变是铲除了农民对技术的迷信，农民能够对他们曾经认为高深不可及的书本知识提出挑战。报告说他们在各地参观时常常听到农民用“从小到大”、“从点到面”、“从土到洋”来形容他们对农村工业发展的积极和乐观的态度。

李成瑞过世一年多之前，我有幸见到他，他问我是否知道哈佛教授波克恩斯这个人，我说当然知道，我读过他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小型工业》这本书。他接着说，这个访问队是由他带领到各地参观的。我当时觉得很抱歉，因为我那时并没有仔细阅读导言。我对他说，这本书太重要了。后来我很快买了一本送给他，并说，这本书有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应该把它翻译成中文。后来看到在李成瑞过世前不久的一篇报导，附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他手里拿着这本书，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把书翻译成中文的事。当然，翻译这本书不容易，因为它有大量的技术性的材料，但是翻译的工作总是比当初这个由李成瑞带领的访问队，到那么多农村工厂参观收集资料，并且经过细心的编辑出版报告要容易得多。这些材料说明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具体的成绩，我们只是口头说社会主义有优越性是不够的。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里进行了这么大的、这么深的一场生产革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内容，我们必须特别珍惜这样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内容的纪录。其实这个报告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还有极多的实际材料有待收集，像农村几亿的农民和几千万当年农村的领导人民公社发展的干部，都还有记忆，但是我们必须抓紧剩下不多时间和机会，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就像很多人一直努力地在收集全民所有制下的老工人的资料一样。

再有，很多人都熟悉毛主席所讲的，在发展经济上要两条腿走路。毛主席说中国的发展不要只靠一条腿，而是要靠两条腿，毛主席还说，中国的发展要大、中、小并举和土洋并举。看起来如此简单的两句话，但是毛主席却说出了非常深奥的道理，毛主席用“两条腿走路”说明了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要利用所有能利用的资源，中国的发展不能只依靠大的企业，不能只靠最新的（进口）技术，在资源短缺的中国必须要利用大型的企业，也要利用中型的企业，也要利用小型的企业。在技术上

不但要利用新的进口技术，也要利用旧的传统的技术。农村的社队办的工业就是“两条腿走路”最好的成功的例子。

4. 集体所有制下的生产和消费

生产队负责计画和执行每年的生产和分配，生产队长不脱产，他（她）筹划和安排所有关于生产的事宜。在每年的收成中，为了保证所有队员的食物需要给每个社员留下口粮，不管队员是否劳动，也就是不管是老的不能继续劳动的，还是小的还没达到劳动年龄的，都可以分得口粮。扣除了口粮后，生产队需要扣除交给国家的税，之后留下为未来生产所需要的投资的公积金和为队员福利所需要的公益金。在这些都扣除之后，剩下的一年收入，再根据社员一年出工的日数和每次出工所得到的工分来进行分配。

因为中国农业生产仍然很低，即使在不断地增加，还是不能一下提高很多，在生产量低的限制下，生产队在扣除了各种项目之后，常常剩余不多。特别是在比较贫穷的地区和比较贫穷的公社，在扣除所有必须支付的项目后，可以根据工分来分配的部份剩的不多，因此每个工分所能换到的收入也就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体现多劳多得的结果。譬如，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每年出工300天，每天可得10工分，共得3千工分，另外一个年纪较大，体力较差的人，每年出工150天，每天得7工分，共得1千零50工分。但是因为每个工分所值很低，这两个付出的劳动量差别相当大的队员，他们的收入差别却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在生产力仍然很低的情况下，如果分配照顾到社员的需要，就不能很好地实行按劳报酬。这的确是在生产力低落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困难，因为多劳不能多得，会挫伤人的积极性。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困难使得一些人动脑筋，想要在别的方面多赚点钱，比如把生产的东西拿到自由市场去卖。这说明了走资派所提倡的“三自一包”，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前面提过的在生产力发展落后的国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发展的困难。

5. 初步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要，农村医疗保健与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

在工农联盟的政策下，国有企业和人民公社之间在一些发展上，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或是教育和医疗卫生都取得紧密的、互为支持的发展。因为人民公社保障了农民在基本食物上的需要，同时从公益金里和在国家的援助下，农民的医疗保健和教育也得到了保障和提高。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都市与农村在医疗保健的资源上得到了重新分配。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医疗保健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1949年时中国全国只有二千六百所医院，到1978年时，中国医院增加到六万四千四百二十一所。但是医疗资源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分配很不平均，以广东一省为例，三分之二的医院病床、70-80%的政府医疗经费和60%的医疗人员，都集中在居民占20%的城市。医生与人口的比例在广州是1:600，在广东的农村是1:10,000。文革时，大批医疗人员下乡，他们在农村训练了大批赤脚医生，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不脱产的赤脚医生，他（她）们了解一起生产的队员的

状况，队员生病时，他（她）们可以识辨病情，如果自己不能医治，可以送到生产大队的医疗站，更严重的病就送公社或县级医院。

江宇写的《强国先强身：新中国的健康奇迹》¹¹是一篇好文章，它给我们提供了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在国民健康上像奇迹一般发展的重要资料，很值得我们参考。江宇在文中如是写道：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用了 30 年时间，就完成欧洲用 100 年的时间完成的人口转型。所谓人口转型，即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变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1949 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为 20%，出生率 35%，还是典型的传统社会。而到 1957 年，人口死亡率就下降到 10%，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有反弹，也显著低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平。到了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人口死亡率已经下降到 5% 左右，这主要是由于营养的改善、基本医疗卫生的普及等原因。

基本医疗的普及和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 30 年的又一个突出成就。基于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新中国建立了一套崭新的和独特的医疗卫生制度。在保障模式上，主要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迅速实现保障全面覆盖；在资源配置上，面向工农兵，以农村为重点，优先保障基本服务的提供；在服务内容上，重视面向群体的公共卫生服务，而不是像西方强调面向个人的医疗服务；在技术路线上，以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采取低成本适宜技术，而不是以治疗为主的高成本资本密集型技术；在提供服务上，即依靠专业人员，又依靠经过简单培训的初级医疗卫生人员，使医疗卫生和群众工作相结合。这条道路，超越了当时西方社会医疗卫生商品化、专业化、以治疗为中心的路线，实现了面向全民、预防为主，以较低的成本维护了人民健康。

江宇的这两段话，充份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如何普及全民的医疗和卫生，因此，指出了与资本主义把医疗当作赚钱的商品的基本差异，更有甚者，这篇文章也说明了在农业集体化下，农民营养得到普遍的提高，以及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面向工农兵广大群众，并且把重点放在农村。而且正是在工农联盟的基本政策下，依托了国有和集体所有，中国建立起来这套崭新的保障全面覆盖的医疗卫生制度，创造了新中国健康的奇迹。江宇文章中也提到在 1965 年前中国的医疗保健工作集中在城市，1965 年之后重点才移向农村。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体弱多病，早亡，医疗健康体系缺无，被别的国家耻笑为“东亚病夫”，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国人的健康得到难以想象的进步，我们看到那时中国年轻人，身体是那么的健康，精神是那么的饱满。

在集体时代农村的教育的提高和改进是另一个奇迹。韩东屏对社会主义下中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有这样的叙述。他说，“1949 年，中国人民的文盲率，占百分之九十，……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中国农村开始大办教育。由于自然灾害和管理不善，大跃进期间办起来的许多民办学校被迫下马。后来到了六七十年代，农村教育有了第二次发展高潮。”他以自己的家乡山东为例，结合河南、河北、安徽、贵州等地的农村考察的结果写道，几乎每个村子都办起了自己的小学，农民的孩子可以不出村，免费上小学，建国之初，他的家乡即墨县有一千零五十个村子，七十五万人口，但只有一所高中和七所初中，后来初中扩大到二百四十九所，平均四个村子一所。

¹¹ 江宇《强国先强身：新中国的健康奇迹》<http://www.wyxxwk.com/Article/lishi/2019/10/409178.html>

文革中他的县的高中从一所发展到八十九所，平均每个公社有三所。韩东屏更说，他的村到了 1973 年之后，农村的高中已经免费了。¹²

（六）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化建设

在农业集体化后的20年中，农民辛苦地将大量劳动力投入土地，他们收集人和畜类的粪便以及一些没有利用价值的植物，加以处理用来做有机肥。这是一项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但可以改善土地的肥力以便增加亩产。中国农民还将大量的劳动力用来平整土地和治理中国的灌溉系统。平整土地是为了给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治理灌溉系统则是为了减少自然灾害对生产的影响。中国农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中国极有限的可耕地变成高产田和稳产田，为农业的未来开辟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宽广大道。农民的努力在短短的20年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却被资产阶级污蔑为“大锅饭，养懒汉”。

农田基本建设的成绩提高了农业耕种机械化程度，大幅减轻了农民最辛苦的挖土、播种和收成的工作。人民公社的20年里，土壤的改善、新品种的培植和其他农业技术的改进，使中国农业的亩产量翻了一倍，实现了中国多少年都无法达成的粮食自给自足，大体上不再依靠粮食进口。中国的集体农业建设虽然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却没有来得及完成当初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周恩来总理鼓励农民学习大寨的精神，把中国所有的农田都建设成高产稳产田，也就是说不但亩产要提高，而且在大力修建灌溉系统后，农民可以抵抗自然灾害，稳定农业生产，中国人民便再也不用靠天吃饭。但是到资本主义改革时，高产稳产田还只占农田的一半。其实完成另一半农田的高产稳产，应该只需十年到十几年，因为到了七十年代末，农村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机械，可以帮助挖土和整地。但是人民公社解体后，中国的农村建设不仅不再向前进，反而急速地向后倒退。

中国农业如此辉煌的成绩只有在农业集体化下才有可能完成，集体化是在中国共产党巩固工农联盟的经济政策下完成的，这就是农业在短时期内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前面说过，所有国家开始发展经济时，因为工业化尚未开始，所以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只能从农业中抽取，这一点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都是一样的（除非放弃自力更生，鼓励外来投资或是向国外贷款）。不同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工农联盟经济政策下，当工业有了发展后，用资源来支持农业发展。中国在工业生产的计划中，对与农业相关的工业（各种农机、化学肥料等）在投资上受到特别的重视，不但要保证农用工业产品产量逐渐增加，而且要用低价卖给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使它们可以买得起，只有这样农业所用的工业产品才会逐年增加。除了保证农业生产所需的工业品的供给外，中央政府更用增加农产品收购价格和降低工业品出售给农业的价格，来减少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另外，中央政府更用降低农业税的办法来减轻农民的负担，并且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像红旗渠一类的大型水利建设，都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完成的。

下面这个表可以显示出集体化所带来的农业现代化的成绩：

¹² 韩东屏，《中国的农村道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关于未来的思考》，来自莹烛察今公众号：2019-7-17，人民食物主权转载。

表二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的现代化

	1952	1957	1965	1979
拖拉机犁耕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比	0.1	2.4	15.0	42.2
灌溉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百分比	18.5	24.4	31.8	45.2
电力灌溉面积占全部灌溉面积的百分比	1.6	4.4	24.5	56.3
每公顷所使用的化肥公斤数	0.7	3.3	18.7	109.2
乡村地区的小型水力发电站数量	98	544	无数据	83224
发电厂的发电能量（1000 千瓦）	8	20	无数据	276.3
全部农机的总马力（10000 匹马力）	25	165	1494	18191
大型与中型拖拉机数量（千辆）	1.3	14.7	72.6	666.8
小型与轻便型（walking）拖拉机*数量（千辆）	无数据	无数据	4	1671
农业灌溉与排水的引擎总马力（10000 匹马力）	12.8	56.4	907.4	7122.1
复合式收割机数量	284	1789	6704	23026
机动渔船	无数据	1486	7789	52225

*虽然这些原是为了农业用途，但许多被用于运输货物。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Year Book of China, 1983, p.186、p.197；1981 年中国经济年鉴，第六卷，13 页。

表三 人民公社时期农业机械年增长度

农用工业品与能源消耗

年成长率（百分比）

农村能源消耗量，1975-78	21
小型水泥厂产量，1962-77	23
小型化肥厂产量，1957-78	22
灌溉与排水设备存量，1957-78	25
拖拉机存量（马力），1957-78	30
电动翻土机（马力），1970-78	50
以上三种机械总合（马力），1957-78	24

资料来源：托马斯·若思基（见注解 2）82 页。

在下一页，托马斯接着说，前三种机械的总合，以土地平均马力来说，已经超过日本 1955 年每公亩 0.69 马力的机械化程度。

（七）农业发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结

中国的走资派有他们一套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计划，人民公社成立后，走资派就不停地用

各种伎俩来破坏集体农业。他们提倡在农村实行“三自一包”，“三自”就是扩大自留地、扩大自由市场和实行自负盈亏。“一包”是指由个体农户直接与国家订合同来包产到户，也就是个体农户在与国家所订的合同中，向国家承诺缴纳一定的农产量，如果生产超过这个定额，多余部份归农户，即所谓多产多得。走资派认为这样可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如果产量不能达到这个定额，农民得自己补上。

在集体化下，为什么农民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原因是农民可以利用自留地来种植一些蔬菜、养几只鸡、养一头猪，这些产品可以卖掉或者留着过年过节时自己吃。在生产力发展尚不足时，自留地是有必要的。因为对农民来说，如果他们花在自留地上的工换来的产品，多过于在集体劳动所得到的工分，他们会很情愿地利用自留地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自留地的废除要等到集体劳动所得的工分超过农民在自留地劳动所获得产品，到那时农民就会愿意放弃他们的一小块自留地。但是如果将自留地扩大，再配合自由市场的扩大，那就只会鼓励农民将更多的劳动力用在他们的自留地上，生产更多的产品作为商品到自由市场去卖。如果自留地和自由市场继续不断地扩张，最后就会导致集体生产的解散。

资产阶级当政以后，终于在1984年如愿地解散了人民公社。今天农民过的是什么日子呢？我们不得不记起来毛主席说过的一段话，毛主席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再实验吗？”

13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在5月25日送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下山时后，毛主席大声问：“你是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说：“主席，我懂了。”

我们对毛主席的远见不得不佩服，在他过世后，他所有的预料一件件地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毛主席这段话不但说明了，在中国小农生产无法发展农业，无法完成农业的现代化，而且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下，如果在农业上不能自力更生，帝国主义就会乘机而入，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工业的发展就无法得到保障。这个事实不但适用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也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同样也适用于第三世界，说明了落后国家的小农经济无法现代化和不能持续发展的道理。

从1958到1978的仅仅20年中，中国农业生产力在集体所有制下，得到快速全面地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工农联盟下的伟大成绩。这样大的成绩是中国农民支持国家的政策，无保留地付出了他们大量的劳动力来实现的。农民在冬季生产不是最忙的时间里放弃了本来可以稍微休息的日子，付出大量劳动来平整土地。此外，还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将人和畜类的粪便处理成有机肥，用来提高土地的肥力。平整土地为机械化做好了准备，在社会主义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工业的生产给农业提供了各种农用机械，拖拉机、收割机、推土机和播种机等等，到了六十年代后，公社和大队更发展自己的农机制造和维修，逐步地取代了农民最辛苦的耕田的劳动。农

¹³ 民族复兴网, MZFXW.com, 2019-06-3

民投入大量劳动力修建了灌溉系统，到了七十年代有了灌溉的机器，以及农村电力的发展，逐步取代了农民用人力挑水进行灌溉的辛苦劳动。到了七十年代末，可以说农民所有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正是在农民开始减少他们的劳动量和劳动强度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发动了资本主义改革，将人民公社解散了。怪不得在人民公社解散不久后，一位农民告诉我一个他们的顺口溜，“辛辛苦苦30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资本主义改革开放40年后，所有人都认识到今天中国的农民、农业和农村，正在面临极为严重而且无法解决的问题，农业生产停滞、农田基本建设荒废、种田无法维持生活、年轻劳动力不得不离开亲人到都市去工作，才能寄钱回来养活家里的老小。六千万中国农村的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离，他们和祖父母留守农村，在他们成长的年月里，通常只有在每年春节时才能与父母见上一面。六千万是个多么庞大、多么惊人的数字啊！这个数字的背后，更是数不清的悲惨故事，以及这些儿童未来如何面对他们身体和心理所受到的创伤。农村的资源被不断地抽走，其中最宝贵的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年轻人被迫出去工作，年纪大的人的生活人不但没有子女在旁协助，还得照顾他们的孙儿孙女，他们家庭分散了。过去在战火燃烧的中国大地上，有多少分散的家庭？那个年代，是战争将家庭分散的苦难强加在中国老百姓身上，中国今天并不处于战争中，从1949年到今天，中国经历了70年的和平，凭什么中国人还是要遭受家人分离的痛苦？这难道不是残酷的经济压迫所造成的吗？这么多少年儿童所受到的创伤不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奇迹”的另一面吗？

我们来看看，今天中国农业经济研究专家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严重的问题，即所谓“三农”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牛若峰写了一篇有关“三农”问题的文章：《中国“三农”问题：回顾与反思》¹⁴。牛若峰首先对中国的“三农”问题这样形容，他认为“三农”问题集中表现在农村、农业和农民欠发达，现代化程度低，发展比城市严重滞后，城乡差别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大等等。然后牛若峰对他所指出的这些问题，解释了它们产生的原因，他说：

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需要，国家采取了“城乡分割，一国两策”体制，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三位一体”的严密统治系统以及其他一系列配套政策，人为地割裂了农业与非农业的经济联系和农村与城市的联系，确立了城市偏向政策，形成城市对乡村的优势地位，且城市与乡村极不对称的称状况日趋加剧。

牛若峰这位农业专家把中国今天农民、农村和农业的问题归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上去，他把工农联盟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紧密的联系和合作说成“城乡分割，一国两策”，把农业集体化时代如此辉煌的成绩说成是今天农业生产停滞、农村凋敝、农民生活艰苦的原因。今天的农业专家把今天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归罪与社会主义下农村集体的发展，用意在哪里？这位农业专家的说法，正好跟30年社会主义时期，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建设和农民生活的提高相反。在工农联盟的政策下，中国不但没有“人为地割裂了农业与非农业的经济联系和农村与城市的联系”，恰好相反，工农联盟的政策实现了工业与农业在经济发展上相互支持、促进了都市与乡村生活水平上的均衡，使生活在都市和农村的人在教育文化上和医疗卫生各方面趋向平等、大幅度地缩减解放初期城乡在各方面的差距。社会主义时代在集体所有之下，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村的建设、农民生活各方面的改进，是几亿人民所经历过的，这样的成绩

¹⁴ 牛若峰：《中国的“三农”问题回顾与反思》，《古今农业》2003年第4期

没有任何专家学者可以把那它从历史上抹去，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历史，屈辱中国劳动人民和否定劳动人民辛苦获得的成绩。今天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严重的问题，完全是农村集体化被彻底摧毁，工农联盟政策被彻底打破而造成的，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切断了中国城市和农村的经济联系，是资本主义改革把农村的剩余抽走，造成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村的凋敝，造成农村的年轻人必须离家工作才能勉强维持生活，造成子女和父母家庭分离的悲剧。

第二部份 全民所有制下的两条路线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首先就没收了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买办资本，和国民党的官僚资本，这些资本量的总合占全国总资本的 80%。土地改革完成后，下一步就是赎买民族资本家的私有资本，一步步把工商业的私有财产国有化，来完成公有制。1956 年时，新中国成立了工业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在公有化过程中，虽然中国共产党内对将工商业企业收归国有没有不同的意见，但也不能说他们之间是没有矛盾的，特别是对全民所有制的意义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另外，就是共产党里有人认为工商业公有化应该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在过渡期中，资本家私有和国家的国有可以并存一段日子，因此，他们认为全民所有制的改造进行得过快。这种意见就表现在 1976 年之后，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出现了所谓“补课论”的说法。“补课论”批评之前公有化进行得过快，过早结束了他们认为本来应该经过的一个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

在全民所有制成立之后，由刘少奇所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这之后，中国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指全民所有制）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毛主席则完全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毛主席认为全民所有制的成立并不能代表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因为全民所有制所代表的一切，包括工人终身制以及各种的工人福利等，还只是由共产党规定下来的，毛主席认为，这样的生产所有制的建立，还只是建立了法定的所有制，在这之后，只有经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才能将刚建立起来的全民所有制巩固下来。如果不能做到无产阶级真正掌握了政权，而只是在法律上建立起来公有制，那么工人阶级所享有的一切就会全部丧失。他认为只能在生产关系进一步向前推进，使得无产阶级在实质上掌握了生产工具，那时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不会在得到他们所享有的一切之后，又再度失去。

只有这样地去理解毛主席对改变所有制的看法，我们才能进一步认识毛主席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将阶级斗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也只有这样地理解才可以看清楚在全民所有制内一直不断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如对工人终身制的保护或是取消，如毛主席对工人治厂的重视，更牵涉到经济基础之外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斗争。另外，当我们能够理解毛主席对所有制的看法，也就可以判断今天中国不同的派别对国有企业的看法是否正确。

在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上对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个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在“国有化”或“私有化”之间产生的争论中，反对私有化的人认为“国有企业”应该在整个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率，50%还是 80%？他们反对将“国有企业”继续私有化。这些维护“国有企业”的人认为只要国有企业还占多数，那么中国就还是社会主义，或者还保有社会主义因素。我认为

我们虽然可以同意“国有”和“私有”之间是有差别的，国有企业不同于私有企业，像在国有企业中，国家有能力设置一些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会对企业的某些行为有些限制。

但是国有企业的存在并不代表一个制度的社会主义成份比较高，认为国有企业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许多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里，按照当时的一定需要，它们还是会将企业收归国有。一般是私有企业经营发生问题，企业亏损了，甚至要破产了，因此，由国家接管下来，特别是一些对整体经济影响较大的企业，如交通、电力、银行一类企业，在一定的情况下，政府会收管过来。往往在国家的经营下，企业转亏为盈，又再将这企业卖给私人，这种情形时常会发生，但是这样的国有化与社会主义无关。另外，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时，许多落后国家希望能脱离帝国主义来独立地发展它们的经济，但是它们的资产阶级不够强大，因此，它们也会将一些重要企业国有化，以便使这些企业增加对外国资本抵抗的能力。同样的，这样的国有化也和社会主义扯不上关系。如果无法将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区分开来，那么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在 1956 年工商企业国有化之后，还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就是认为 1956 年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已经建立完成了，中国的生产关系已经是先进的了，所以中国主要的矛盾就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主席就完全反对这样的看法，他看到生产关系的改造不是只要经过一个立法的程序就能完成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这个改变要经历从一个阶级专政，过渡到由另一个阶级专政。所以 1956 年绝大部份工商业公有后，到底由哪个阶级专政还是个未知数。

今天，在全民所有制成立了 60 多年和全民所有制被迫解体的 40 年之后，我们应该怎样看待 1956 年全民所有制的建立？这是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

（一） 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过渡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用赎买政策赎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企业，取消了私有制。1956 年，国家将工商企业收归为中国人民所有，建立了全民所有制。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决定和执行新中国的一切政策，它对全民所有制有几项原则性的规定：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不以牟利为目的，企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不由企业自己决定，而由国家制定的经济计划来决定。国家根据全体人民现在的和未来的需要，每隔五年制定一个经济计划，这样的五年计划按照预期的国家的生产能力，在考虑了人民目前的需要和将来的需要后，来决定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根据这个比例来决定国家的投资。除了消费与投资外，每个五年计划必须要包括国家的国防开支以及与国防建设相关的费用。

1956 年毛主席写了一篇《十大关系》的论文，他从整体的发展着眼来考虑如何对待当时十个最重要关系，在十大关系的第一大关系中，毛主席讨论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他指出，重工业是中国建设的重点，因为重工业是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他也提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经济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其中一个错误就是在它们的经济计划中，过份偏重重工业的发展，因而忽略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导致市场上的货物不足和货币的不稳定。鉴于苏联的错误，毛主席说，虽然重工业仍然是中国建设的重点，但是毛主席提出不能过份偏重重工业，而忽略了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粮食和轻工业产品。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7）时期，偏重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中工人的工资有了比较大的调整，结果是农业的生产跟不上，导致供应紧张。1956 年毛主席的《十大关系》论文发表后，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

才调整过来。在这第一大关系中，毛主席确定了其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方向。从此看来，经济计划下的公有企业的发展必须要从全局考虑，而且必须考虑到长远的发展，以通过促进经济全面和长期的发展来改善人民当前跟未来的生活水平为目的，以后每五年根据发展的结果来作必要的调整。

因为全民所有制的工商企业属于全民，所以所有的企业合起来一起算账。七十年代末资本主义改革时，资产阶级把原来的社会主义企业改变成盈利的资本主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每个企业单独设立一个自己的账簿，企业有了自己的账簿，才能根据市场价格和成本来决定生产什么才最有利润，企业有了自己的账簿后，就开始把企业的生产目的，从为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的生产，改变成为自己企业盈利的生产，这一点后面还会谈到。

在社会主义时期，当所有的全民企业都是一笔帐时，并且在产品的价格和原料的价格都是由国家决定时，每个企业的经营好坏不由这个企业的收入高过支出（也就是盈余）来决定，而是根据这个企业是否能够达到“多、快、好、省”的标准。像 50 年代时，手表价格定得很高，生产手表的企业收入远大于支出，如果按照资本主义来给这个企业算账，它的“利润”很高，但是在全民所有制下，这个“利润”并不代表这个企业经营得好，而是因为它的产品价格高。经济计划中把手表价格定得高，是因为手表不被看为是必需品，所以手表生产量小，价格定得高，只有少数人可以买得起手表。生产手表的企业将收入大于支出的部份上缴国家。再举一个例子，如生产农机的企业，国家将农机的价格定得低，以便公社和大队可以有能力和购买，因此，生产农机的企业会入不敷出，但是这样的“亏损”是因为农机出售的价格定得低，而不是因为企业经营不善。因此，支出大于收入部份由国家补贴。除了“利润”上缴国家和“亏损”由国家补贴外，企业的投资多少也完全根据国家从整体发展策略作为考量来决定，而不是“利润”高的企业可以多投资来扩充生产规模，“利润”低的企业则得不到投资。只有这样，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可以逐渐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所依靠的价值规律，可以按照计划来为满足人民的和国家的需要而生产。

在资本主义下，社会的资源只会投向盈利的企业，而且优先投到利润率最高的企业，而不会投向最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企业。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许多欠了外债的发展落后国家，往往因为缺少资金，无法投资在一个人民极需要的清洁饮水的自来水厂，在此同时，它们却允许外来投资建设最赚钱的汽水厂。美国的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之类的有名的汽水厂，只要花很少的投资建个水瓶厂，用它们的秘密配方，加上大量的广告，利润就会滚滚而来。在落后国家的许多大城市里，人们没有清洁的水可喝，年幼的小孩们却在街上吆喝着卖可乐。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资源才会投向社会上人民最需要的生产上。社会当前最需要的无外是人民生活上的消费品，如供给人们足够营养的食物、清洁的饮水、住房、医疗、教育等等。人民的这些基本需要，只有在不按价值规律办事的计划经济下才能得到满足。因为在社会主义下，国家可以根据计划把资源最优先放在人民最基本的需要上，不仅如此，负责计划的人要精打细算地为保证人民未来的需要来筹画投资。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下，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富有，总还是有人吃不饱饭，总还是有人无家可归睡在路旁。因为资本主义为盈利生产，贫穷的人没有购买力，他们无法将自己的需要变成市场上的需求（需要+购买力），因此，市场不会去理会他们的需要。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时，粮食生产过剩，拿去烧掉，猪肉生产过剩，把猪仔杀掉埋起来，（这里所说的生产过剩是生产多过于市场需求，不是生产多过于人民的需要）。人民虽然忍受着饥饿但是没钱去买粮食和猪肉，城市里失业的工人只能排着长队，去讨一碗施舍

的稀汤。今天的三藩市美国是最富有的大城市之一，最大的高科技公司（苹果、谷歌、微软）都在它附近。在这些公司工作的人薪资很高，也就因此增加了三藩市住房的需求。原来住在三藩市的人，付不起提高了近一倍的房租，被赶了出来，导致三藩市虽然是美国的一个富有的城市，但是它的街上却睡着许多无家可归的人。这样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为牟利而生产的资本主义却永远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上的需要，所以当生产逐渐提高时，人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普遍的改善。虽然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不可能考虑到所有未预料到的因素，所以在一些情况下，必须做一些调整，如自然灾害等不可预料的情况，但是基本上根据人口的增长，每五年需要多少增加多少工作机会，人民需要增加多少食物，需要多少住房，健康卫生和教育需要多少经费，除了保证过去的标准外，有多少将标准提高的余地，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绝对不会像当今的中国一方面大量的资本无处可投，另一方面，太多的人民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在资本主义下没有可能不两极分化，没有可能奢谈什么和谐社会。在人剥削人、人欺压人的社会，在没有公平、没有正义的社会，人如何可以和谐相处？在这样的社会里，不可能和谐，也不会有安宁。今天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发展发达的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都处在非常不安宁的状况中，这种现象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社会主义仅仅二十年的时光，中国人民的生活品质在各种可测量的指数上都大幅提高，大多数的人在吃饭、住房、医疗和教育几项中的需要得到满足，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也是在历史上除了中国之外，没有任何贫穷的国家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达到这样的成果。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半个多世纪前，它的总统詹森就开始了消灭贫穷的计划，到今天美国的贫穷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在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贫穷、饥饿、无家可归的人有增无减。2008 年之前，无家可归的人多数是单身男性，其中很多是因为吸毒和酗酒而堕落的人，但是今天已经扩延到带着小孩的母亲、上了年纪的老人和有工作但付不起房租的年轻人与中年人。在美国这种食物生产极为丰富的国家，却有许多人饿肚子，当前有四千万美国人要依靠政府的食物补贴，他们得靠联邦政府发的食物券才能吃饱肚子，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明年要削减食物券的经费。

记得在中国资本主义改革不久，改革政策是企业要有盈利，即使不能盈利，也得自负盈亏。许多医院和诊所，首先就提高了以前在中西医结合时发展出来的低价的、便民的成药价格。之后，在医疗制度一步步商品化下，本来是必须品药物，却变成了要有购买能力才能享受到的商品，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医疗卫生的商品化、教育的商品化和住房的商品化，把本来人民普遍可以享受到的权利，变成了一般人民购买不起的商品。

社会主义时代，全民所有制内设立了八级工资、工人的终身制，以及各种福利，包括基本上免费的住房（每月只需付极少的房租和水电费），工人享有免费医疗（工人家属付少许的费用），工人子女的免费教育，食物上的补贴，以及工人退休后生活上的保障等等。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在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作的工人，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所有制是指产权而言，全民所有制的产权代理者即国家政权）但农民并不享有工人在生活上的各种保障，城市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在生活上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一个差距要再经过一段日子才能拉平，在七十年代底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时，这个差别仍然很大。在全民所有制下，国家控制了工业生产的所有剩

余，但是这些剩余并不是只用来保证和提高工人的生活，而是根据整个国家的总需要来作全盘的考虑，其中包括国家如何利用剩余来提高农业的生产，以此来提高农民的生活。在一个限度内，国家也经由调整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价格（减少交换的剪刀差）来提高农民的收入，以及通过调整税收来降低农民的负担，这一点在前面讨论工农联盟时已经做过说明。

（二）全民所有制在废除雇佣劳动上的努力（全民所有制内工人治厂与工人和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

每个全民所有制的工厂的工人工资和福利都是由国家直接拨发，因此，工人的工资和福利与工厂的收入和“利润”脱钩，厂长不能像在资本主义企业里，用企业亏损为理由来解雇工人，或降低工人的工资与福利，只有在社会主义下，国家才能保证工人的终身制和工人的工资和福利。社会主义对工人工资的看待和资本主义对工人工资的看待是完全不同的，不仅不同而且是完全相反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提高工资是件好事，因为工人拿到多一点工资就可以购买多一点消费品。但是在资本主义下，对企业来说提高工资是件坏事，因为一个公司提高了工资，就造成生产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甚至亏损，这又将导致公司股票下跌。因此，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工人通常得通过组织罢工或怠工的手段来争取工资的上涨。同样的，资本主义企业不会自动地改善工人在工厂的工作环境。1911年美国纽约市三角缝衣工厂发生大火，烧死了145个年轻的女工，主要是因工厂没有通风设备，聚集起来的棉絮无处可去引起的。这次的火灾悲剧引起社会的公愤，经过法律程序才逐步迫使工厂改善工作环境。在资本主义下，工人的健康甚至工人的生命不被计算在生产的成本之内，能省则省。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1993年深圳玩具工厂的一场大火，烧死了84个年轻工人，和资本主义改革后，中国连续发生的许多起矿难事故让多少矿工失去了生命！在疯狂争取GDP高速成长的背景下，中国的煤矿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煤矿。

在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工人的工资是低的。因为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的总消费加上总投资，再加上政府总支出（在贸易平衡下）必须要等于一个国家的总生产。除了美国这个超级帝国之外，所有的国家都得遵守这个规则，只有美国用它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霸权来耍无赖，从80年代起，美国每年都用进口大于出口的方式（也就是欠债的方式）把别的国家的生产拿来给美国用。即美国的总支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大过于它的总生产，不足部份靠贸易的逆差（进口大于出口）来补足。世界上，除了美国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这样做。从80年代到今天四十年的时光，美国可以这样做是因为，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整个世界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实行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全球的剩余产品需要有地方来堆积，于是美国这个狮子大张口，把所有的剩余都吞了下去，只是不付钱罢了（美国用美元记账来付钱，出超国家就拿着美元纸钞当作钱收下，虽然知道这些纸钞是不可能兑现的）。多年来世界贸易不平衡的结果，使得美国这个最富有的国家在消费上要靠发展落后国家的储蓄（生产的剩余）。美国是靠着长久借债来维持它的支出超过生产的部份，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这样作。¹⁵这些债权国（美国欠中国的债最多）不要期望有一天美国会还债，美国欠它们的债最后一一定是赖掉，如果这些债权国要真的联合起来向美国讨债的话，那么借着靠美国欠债来维持

¹⁵一些发展落后国家短期内如果总开支大于总生产，可以暂时靠借外债来补足生产的不足的部份。在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危机时，许多发展落后国家被迫借了许多外债，但是除了美国例外，借外债是要还的，而且除了要还债的本金部份，还有加上利息，甚至利息上的利息，最后偿还的总额往往超过当初借债数额的一倍、两倍或更多。

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就会停止运转，今天这样的帝国主义体系，就是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因为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食物营养上和卫生保健上都提高了很多，婴儿死亡率下降和人口预期寿命提高都使得人口增加得很快。在国家的保证充分就业政策下，城市工人人数增加的很快，在生产力仍然低落的情况下，增加就业的同时，就不能提高工资。如果在就业人数增加时再提高工资，工人消费的总额的增加过快，就会像第一个五年计划一样，造成工人的消费超出了农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供应能力，导致物资供给紧张。基于这样的考虑，当时的政策主要以增加总就业人数来保障总消费。一家人常常不只靠一个人的工资收入，因此，一家人的工资总和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主要是每家人的基本支出（像住房和吃饭）都非常低，住房由工作单位分配，粮食和棉布都实行配给制，价格维持稳定，甚至有下降。人们保持着中国人省吃俭用的美德，工资虽然低，但是多数人每月还是能存下一些钱，集起来买一些像脚踏车、缝衣机、照相机、手表、一类的大件消费品。不错，在社会主义时期，因为生产力很低，为了要顾到投资和消费的总需要，中国工人的生活仍然相当清苦，但是与解放前相比，则是改善得太多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为生活忧虑，他们不必担心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也不必忧虑物价上涨、自己失业，或是年纪大了没钱养老。另外，因为新社会在意识形态上的改变，曾经被人看不起的做工的人，解放后，他们骄傲地接纳了社会上创造价值者的荣誉，工人得到社会上普遍的尊重。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历史上，工人阶级从来没有享有过像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那么高的荣誉。

在社会主义下，工厂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有所改变，必须要区别于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管理者（干部）和被管理者（工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和资本主义的工厂里有质的改变。在资本主义工厂里管理者代表资本，被管理者只是雇佣工人，在生产程序中的重要事项，都由管理者决定，工人无权过问。在社会主义下，既然工厂的所有权不是哪个老板的，而是由全民所有，那么工人就应该可以过问生产程序上的决定，不但可以过问，而且应该要积极地参与。

解放后工厂里的管理干部当然是跟解放前资本主义工厂里的工头完全不同。一般的干部对工人都是非常关心，对工人的生活都是非常照顾。但是中国是一个有长久封建历史的国家，在封建制度下，“官”和“民”有一定的对立关系。解放后，很难避免的，工厂里的干部还会被看成“官”而工人还是会被看成“民”，这种关系不容易在很短的时间内自动地改变过来。全民工厂里的工人在很短时期里获得工作和工资的保障，以及享受到上面提到的各种福利。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经过工人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不断地斗争才争取到的。因此，解放后中国的工人对共产党和国家会怀着无限的感恩，他们不认为他们得到的一切是他们应得的，而是来自共产党对他们的恩赐，因此，他们认为只有用努力工作建设国家来作为对国家的报答。虽然经过了几次群众运动，但是在五十年代，群众运动的对象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坏份子，或是少数共产党内不守法的坏人，当时所指的右派也还不是后来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到了1956年，苏联走向修正主义的趋势明朗化后，中国共产党对党内修正主义提高了警觉，在这时共产党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已经相当明显。上面谈到农业时提过，土地改革后，面对农业如何实现现代化，共产党内就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毛主席主张农业发展可以经由集体化来完成，但是刘少奇则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要靠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只有在中国有足够的钢铁和有生产农机的技术时，才有可能现代化。这样的两条路线上的分歧到了“大跃进”时公开化了。

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的工人和绝大多数群众对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清楚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如果有一日走资派当权，他们将会失去所有的一切，也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工人和中国大多数人民对走资派的实质和策略没有清楚的认识，应该说不可能有清楚的认识。在全民所有制之内，社会主义的路线就是如何能使工厂里的工人团结一致来争取工人在工厂中的地位，改变工厂里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一步步完成工人治理工厂，因为工人治理工厂是走向工人治理国家的第一步。总的来说，社会主义路线就是要工人不再是为了生活而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的雇佣工人。而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一派则是抱有完全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增加工厂的积累是第一要务，因此，他们只关注如何降低工人的工资，和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来加快积累，以便提高生产力的发展。走资派在工业上想推行的政策和他们在农业想要推行的政策一样，同样依照唯生产力论的观点。在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内，走资派想要用破坏工人的团结来削减工人的力量，用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增强工人的劳动强度来提高生产效率。走资派完全不相信在全民所有制下，工人会意识到他们的工作不再是为哪个老板谋取利润，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总体利益，因此，他们会自动自觉地为增加生产而努力。相反的，走资派认为工人只有在会被解雇的压力下，或者在物质刺激下（像奖金和计件工资）才有可能努力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在具体的政策上，就集中表现在是保护工人的终身制，还是用临时合同工来取代工人的终身制；在工资上，两条路线的争论是到底工资是为保证满足工人生活上的需要，还是要利用不同的工资形式来作为刺激工人积极性的工具。

走资派几度企图要用合同工制来替代全民所有制工人的终身制，他们看到中国农村蕴藏着庞大劳动力，如果能释放出来，就可以与工人竞争，降低工人的工资，打击工人的力量，最终取消工人的终身制。因此，将农村集体所有制解体是他们能够走向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走资派就是要用“三自一包”的推广来一步步解散人民公社。毛主席跟走资派的斗争中用“大跃进”来促进人民公社的成立，用“农业学大寨”来稳定人民公社。在工厂里，毛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则是以工人阶级长远的利益为最优先考虑，一步步争取工人对工厂的治理权，要工人阶级拥护“政治挂帅”，反对走资派分化他们的“物质刺激”。

1960年时，鞍山钢铁公司的工人提出了对工厂管理上的改革，有下面几条：（1）政治挂帅，（2）加强党的领导，（3）发动群众运动，（4）自觉地推动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5）修改不合理规章制度，促进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合作来完成技术创新。毛主席非常赞同鞍钢对工厂管理的创新，号召全国工人向鞍山钢铁公司学习，并且将鞍山钢铁公司的这几项工厂管理创新的改革定名为《鞍钢宪法》来表示它的重要。但是《鞍钢宪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在工厂里得到响应，我一直以为，原因是当时大多数工人阶级对改革工厂的劳动程序不够关心，所以毛主席的号召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响应，直到看到老田写的《“鞍钢宪法”幕后的故事：为什么〈人民日报〉八年不宣传鞍钢宪法》，我这才了解真正的原因。文革时期，当时负责《人民日报》的吴冷西在他的检讨书中说，是邓小平要他不要宣传《鞍钢宪法》的，连已经写好的评论文都不予发表。¹⁶我这才了解为什么《鞍钢宪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得到重视。在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认识到，如果他们真的要当家作主，他们必须要改变工厂里干部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工人一定得要参与工厂的治理，如果工人不能治理工厂，如何能谈到治理国家？如果工人不能治理国家，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不就成了没有真实内容的空话？

¹⁶ 老田《鞍钢宪法幕后的故事：为什么〈人民日报〉八年不宣传鞍钢宪法》
<http://www.haizi.name/index.php/reading/129777-2018-11-14-03-49-44>

但是走资派对工人治厂则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们指望着农村集体所有制解体，农民变成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求职者；那么如果工厂能够解除工人的终身制，工厂就可以雇用到城市求职的农民，压低工人的工资。走资派永远都是从如何增加资本积累为考虑，他们认为只有能够增加资本积累才能发展生产力。在他们看来，工资是生产成本，工资高，生产成本就高，积累就会下降。资本主义认为加快资本积累是发展经济的唯一道路。释放农村的劳动力不但会对工人的工资造成压力，而且可以从基本上来打击全民所有制里对工人的终身制的保障，也就是削减工人力量的第一步。

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的走资派要在工厂里实行的和在农村实行的是互相配合的。他们看到在农村里可以用推广“三自一包”，使农民变成自负盈亏的农户，哪年农作物歉收时，农民为了谋生就必须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其中一个出路就是到城市里去打工。但是也不一定要等到很多农民破产，劳动力才能从农村释放出来，只要城市工人的工资收入高过农村农民的收入，农村的人口就会不断地到城市来谋职，因此，来城市谋求工作的农民就会与工人竞争，藉此来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减少工人的福利。

从五十年代末起，走资派就屡次企图用临时的合同工，来取代全民所有制里工人的终身制，也就是要打破工人的“铁饭碗”。他们在一些企业中，雇用合同工作为试点，在另外一些企业中，实行终身制和临时工并存的试点。1962年1月国务院制定《关于国营企业使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以便用刘少奇所致力提倡的“合同工”来取代工厂里工人的终身制。1964年8月22日，刘少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干部会议上讲话，讲话的题目是“实行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劳动制度”，在这篇讲话中，他大力推崇这种固定工和合同工并存的好处。但是，在1965年3月制定的《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的通知》，把大部分临时工、合同工都改为固定工（“我国劳动合同实践的历史回顾与启示”看准网上一篇很短的报导。）报导中提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几年，走资派为将在全民所有制下工人的终身制改变为合同工（临时工）作了很大的努力。

走资派除了企图改变全民所有制下工人的终身制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想出办法，用物质刺激来提高工人的生产。物资刺激的具体作法之一，是用奖金作为报偿，要工人为了争取奖金而彼此竞争。物质刺激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实行计件工资，做过工的人都知道计件工资对工人最不利，因为管理者用生产最快的工人每小时能够完成的数量来制定生产每件产品的工资，也就是把每一件工资压到最低，用这样的方法来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和拉长工人工作的时间，以便增加积累。虽然人的劳动速度是有弹性的，可以加快，也可以减慢，但是不可否认，工作速度变快，工作时间拉长，人都会疲倦的，长久的疲倦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资本主义为了提高生产就把人能承受的工作压力提高到极限，这就是为什么福特用流水线来增加工人工作的速度，把工人能够承受的劳动速度和强度推到极限。当工头把流水线的速度不断加快时，有的工人体力不支晕倒在地，工头就把他拖走，丢到工厂门外。这就是为什么当工会成立后，工人要求中的一条就是流水线的速度不能由工头随意更改。

全民所有制下废除雇佣工人的努力，改变了工厂内工人与生产工具（机器）之间的关系。从上面所举的汽车厂内流水线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和机器之间的对立关系。从人开始使用工具到资本主义之前，工具都是为了协助工人生产的，一个鞋匠用刀来切皮革作鞋底，用针来缝鞋面。刀和针对这个鞋匠来说是他手的功能的延长，做人的手不能做的事，来帮助鞋匠完成制鞋的工作，刀和针也是被这个鞋匠控制的生产工具。换句话说，鞋匠这个活劳

动控制着他所用的工具中的死劳动。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工具私有之后，人和生产工具的关系，倒了过来。生产工具中的死劳动（资本）反过来控制工人这个活劳动。在汽车的生产中，这个改变有一个过程，福特最早期的工厂里并没有流水线的装备，那时汽车的制造是在一大间屋子里，屋子的中间有一块地方空出来，作为工人把汽车零件装备起来的地方。而汽车每一个部份的零件则由工人在这间屋子的四周进行制造，那时汽车的零件没有很精密测量，当各个零件凑在一起装备时，常会有不能吻合的地方，这就要靠工人敲敲打打才能将汽车装备起来。

在流水线生产之前，汽车工人是技术工人，汽车的零件是靠他们制作的，这些工人在工作中，有时候会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或是跟其他工人聊上几句，他们总是有一些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工头看了这种“推延时间”的事会不高兴，会心里着急，但是却没有办法可以对付工人。那时的技术工人有他们自己的工会，可以提出要求增加工资或其他的要求，谈不拢时也可以罢工（技术工人的工会和后来产业工人的工会不同）。福特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想出了流水线的这个妙招。

对资本来说，汽车工厂使用流水线生产有两项好处：一是代表资本的工厂管理者可以通过流水线来控制生产的速度；二是流水线的设计把本来复杂的需要工人技术的部份，变成不需要技术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工作。换句话说，流水线把生产程序仔细分工后，变成最简单的不需要技术的操作，由此把原来工人的技术从中抽走。流水线的生产不再依赖技术工人。因此，福特的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哈瑞·布维尔曼（Harry Braverman）是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写的《劳工和垄断资本，二十世纪对工作品质的贬低》（*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¹⁷这本书中，他对资本主义的生产程序做了极为明确的分析。在书中，作者用实际的例子说明资本家在生产技术革新时，必然会考虑到这个新的技术是否会有利于他们对工人的控制，也就是说任何新技术的采用都和资本与工人之间的斗争有着密切关系。70年代初，美国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都达到战后的最高点，但是工人却非常不满工厂对他们的各种管、卡、压。他们用旷工、迟到和辞职等各种方法来抵抗。工人的各种反抗降低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生产成本，这就是为什么资方不得不改变福特制的流水线的生产方式。

到八十年代，日本的汽车生产超过美国，日本丰田的生产方式开始享有提高生产效率的声誉，于是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公司开始向日本学习“丰田制生产方式”，各大汽车公司用丰田制取代了福特制，所以丰田制也被称为后福特主义。丰田制最著名的一点是它的瘦身管理。瘦身管理就是尽一切可能来降低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即劳动力、原料的库存、机器和能源的使用等等。

本文的附录一对丰田制的瘦身管理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不管是福特制还是丰田制都是资本主义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减低生产成本的工厂管理策略，也就是资方用来对付工人的伎俩。很不幸的是，中国的管理学家崔之元竟然把丰田制等同与中国社会主义在工厂管理改革中提出来的《鞍钢宪法》。崔先生写了一篇《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在这篇文章中，崔之元是为鞍钢宪法辩护的。他反驳汪丁丁的看法，汪丁丁认为中国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再搞

¹⁷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后福特主义”生产。崔之元在文章中说明，福特式的生产太过于僵化，他认为福特这种以垂直命令来实现厂内分工的办法已经过时了，已经被“后福特主义”的“丰田生产方式”取代了，他还说，“丰田生产方式”不再是用从上到下的垂直命令，而是注重“团队合作”。他认为“团队合作”里有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因此就是“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于是，经过这位教授几次等同之后，“鞍钢宪法”就变成了“后福特主义”中的丰田制的生产方式，这是极为荒谬的事。

崔之元的错误就在于他认为，《鞍钢宪法》仅仅是一种工厂管理制度，而这种工厂管理制度既可以适合于社会主义，也可以适合于资本主义，他不去分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的企业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要获得更高利润就只有增加企业的收入和减少企业的成本这两条路。而社会主义的《鞍钢宪法》是要工人在参加工厂管理中，走向工人治理工厂的目的。因此，后福特主义下的丰田制和《鞍钢宪法》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鞍钢宪法》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对《鞍钢宪法》划时代的意义有所理解，就必须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差异，公有制和私有制生产目的的不同，工人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工厂中地位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是雇佣工人，雇佣工人对资本来说，是供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要废除雇佣工人，是朝着工人治理工厂，成为工厂的主人的方向在努力的。（请参考本文附录一：《鞍钢宪法的划时代意义》）

（三）全民所有制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企业与企业之间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在 40 年资本主义意识的宣传下，不少人开始相信，只有竞争技术才能有进步的这个谎言，这种宣传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的。正好相反，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实践证明，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才最能发挥生产效率，最能节省资源、促进技术进步，以便加速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全民所有制下，一个先进的企业可以帮助一个落后企业发展。中国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比较先进的炼钢厂，包括从日本接收过来的和后来在苏联协助下建起来的，这些工厂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和比较有经验的工程师与工人。在这之后，新的炼钢厂陆续建起来的时候，这些老的工厂对新建的工厂给予各种援助，包括工厂的设计和建筑，工程师和工人的训练和其它技术上的许多问题，新厂的工程师和工人可以去老厂去实习，老厂的工程师和工人也可以去新厂指导。人们用一句俗语来形容这种合作的关系：“老母鸡到处下蛋。”在全民所有制下，新老企业都在一笔帐下，老企业用来支援新企业所用的资源，并不增加它的生产成本，新企业不必发愁没有这笔钱来支付它所得到的支援。在这种合作的关系下，新中国的炼钢事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当然，除了钢铁业外，其它很多工业都是在各个工厂的合作下快速地发展起来。

再有，很多人都熟悉毛主席所讲的“在发展经济上要用两条腿走路”。毛主席说，中国发展不要只靠一条腿，而是要靠两条腿，毛主席还说，中国的发展要大、中、小并举和土洋并举。看起来如此简单的两句话，却说出了非常深奥的道理。毛主席用“两条腿走路”说明了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要利用所有能利用的资源，中国的发展不能只依靠大的企业，不能只靠最新的、以及进口的技术，在资源短缺的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发展落后国家）即要利用大型企业，也要

利用中型企业，还要利用小型企业；在技术上，不但要利用新的和进口的技术，也要利用旧的传统的技术。

毛主席所指出的两条腿走路只有在社会主义下可以实现，在资本主义下，大企业占有各种优势，比如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用高薪聘请经理等。小型企业甚至中型企业都没有办法和这些大企业竞争，于是总是破产，或者在破产前被大企业收购，这就是资本主义垄断企业形成的历史。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竞争下，总是大的吃掉小的，大、中、小并存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只就零售业来说，即使在三、四十年前，美国的每一个小城镇都会有当地人开的药房、饭馆、菜场、杂货店等，这些小生意往往都是从上面几代传下来的。今天几乎所有的小生意都很难维持，一般都被大型企业在全国各个城市的连锁店给取代了，这样的发展对小城镇的居民的生活影响很大，因为这些大型连锁店在开张后，往往因为销售量过小，没钱可赚，就又把店关掉，使得这些城镇或是大城市里的一些较穷困的地区，就连一家菜场都没有，只有几家卖零食的便利商店。这些买不到新鲜蔬菜和水果的地方被称为“食物的沙漠”。零售业如此，中小型的制造业更是无法生存，因此，在资本主义下，要大、中、小并举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也有很好的例子，在资本主义改革后，人民公社被解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一些人靠着关系承包了之前的社队企业，变成了私人经营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曾经有它们发展的空间，繁荣了一阵，农村的万元户基本上都是这样发了小财，但是等都市里的较大的企业发展起来之后，这些小企业就无法生存了。

在今日帝国主义全球化下，落后国家要实行土洋并举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先进的洋技术总是会击败土的传统的老技术，即使传统的老技术有很多优越性，但还是会不可避免地会被取代。当然，旧的技术（包括旧的机器设备）总是要被新的取代，从一方面来看，这本来应该是进步的标志。不仅如此，在一些制造业上，大型的生产总是比较有效率，因为大型的新设备，减少浪费、节省能源、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用新的来取代旧的，大的取代小的，应该从一个国家的资源来作全盘的考虑。在每一个国家开始发展时，能够用来投资的资金总是非常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尽量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旧的机器和旧的设备来生产。中国的发展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例子，例如在解放不久的中国，所有的生产设备都非常落后，要供给几亿人穿衣，从纺纱、织布，到制成成衣，最初都靠从民族资产阶级那里接收过来的纺织厂，中国的纺织业是在小的和旧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到了七十年代，大型的纺织厂已经遍布全国。

今天，一个落后国家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下，不可能大、中、小并举，也不可能土洋并举，因为洋的总是取代土的。许多落后国家用它们极为有限的外汇来购买洋技术，也就是说，旧的传统技术在竞争之下无法生存。虽然旧的传统的技术和小规模生产虽然比不上大规模生产的洋的新技术，但还是能生产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因此，在许多落后国家，土的这条腿就被废掉了，两条腿就只剩下一条。人少了一条腿，怎么走路呢？我们今天才更深刻地理解毛主席所提的两条腿走路的意义，也更理解为什么只有在社会主义下才有可能大、中、小并举和土洋并举。在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资产阶级选择了用加工出口，增加就业来发展经济的道路，中国加入了国际垄断资本安排的新的世界分工。中国的纺织业的生产目标不再是满足中国人民的穿衣需要，而是要为满足世界市场对衣服这样商品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为了纺织品的出口，必须要将纺织业的设备更新。因为在世界市场上，中国出口的纺织品必须要满足西方国家消费者的喜好，其中还要分成高档、中档和低档各个档次。这样的生产就得用新的机器设备和新的

技术，使得很多原来的纺织厂不是关闭，就是大规模翻新，大批地废除了还可以用来生产的机器设备。

（四）全民所有制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

今天，一些左派强调中国在政治上是独立自主的，这样说应该是没错，因为中国有独立的军事武力和独立的政治路线，因此，和其它发展落后国家不同，中国并不依附在哪个大国之下，但是在经济上，中国还保持了过去社会主义时代的独立自主吗？显然不是。

社会主义时代在全民所有制下，中国在经济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短短的二十年里，中国的生产力能够如此快速地发展，人民的生活可以得到如此大幅的改善，就是因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了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发展。毛主席对帝国主义有深刻的理解，知道只有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下，中国才可以阻挡帝国主义的干涉、剥削和压迫。如果放弃了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帝国主义就会乘机而入。因此，独立自主的政策是中国最重要的反帝经济政策。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对内取消了剥削，没有地主从生产中抽取地租，没有资本家从生产中抽取利润，没有金融资本从生产中抽取利息；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下，中国取消了外来的剥削，不再有利润和利息流向国外。因此，中国由生产所产生的剩余可以完全用来满足人民目前的需要和为满足人民未来需要的投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意义尚不止于取消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它在反帝上有更深的意义，这个更深的意义就是中国可以按照自己人民的需要，自主地决定发展的方向，在全民所有制下，每五年按照当时经济的客观状况，来制定经济计划，经济计划保证了人民目前的基本需要：衣、食、住、行、医疗和教育等，同时考虑为了未来需要的投资，如重工业、轻工业的投资，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国防、交通及通讯的投资等等。经济计划是根据能够利用的资源，以全国各方面的目前和未来的需要作为全盘来考虑而制定的，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下，中国完成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在人口众多、耕地不足、缺乏各种资源的限制下，这是个极为了不起的成就。在解放战争结束，新中国成立时，美国大使离开了中国，临走时他嘲笑说：看你们有没有办法喂饱中国人！这篇文章试图说明，在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但人民的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而且在工业、农业、基本建设、教育、健康各方面的投资奠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基础。中国在国防上的支出保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不再受到外国的践踏。

反过来比较今天的中国，生产是扩大了很多，可以用来投资的资源也很多，多到多余的资本无处可去，在全国各地密密麻麻地建满了公路，有些地方在四条线的公路上看不到几辆车子。剩余的资本也投到了预期可以涨价的房地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了货币保值，疯狂地购买房子，甚至有人买了几套房子，把房价吵得火热，但是一般工人没有能力买房，所以大量的空房就这样堆积了起来。一方面住房盖得太多，另一方面有人没房可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你们鼓吹的自由市场神奇的调节机制，如何能说服人呢？过分的修公路和各种建筑把大量的土地用水泥覆盖，毁掉了自然环境，根据一项报导，中国在三年里（2011-2013）的水泥消费超过了美国整个二十世纪水泥的消费。¹⁸但是剩余的资本仍然用不完，于是就往外走，沿着“一

¹⁸ 美国华盛顿邮报，2019年，四月2日，Sanson, Ana, "How China used more cement in 3 years than the U.S. did in the entire 20th century."

带一路”各地投资，但是在此同时，中国国内许多非常需要投资的地方，却被忽略，比如被忽略多年的农村基本建设：包括几十年来失修的灌溉系统，人民公社时代建立的如今已经倒塌了的学校，却得不到任何投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资本主义把生产的目的从满足人民目前和未来的需要，变为谋求最大利润的商品生产，我们所见到的就是 40 年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是改革 40 年一步步走了过来不可争议的事实。我们必须了解今天中国各处投资，它所用的、所浪费的全部都来自劳动人民在生产中的剩余，这些剩余始于劳动人民，但却不用于劳动人民，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劳动人民最大的剥削、最大的抢劫。

我们必须理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当资产阶级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发展时，中国就放弃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因此，我们不能从表面的、肤浅的意义上理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独立自主解释成如果中国的高科技生产在世界的市场上能够独树一帜，或者是中国可以生产自己品牌的汽车，超越日本和美国，那么中国就是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这种说法是资本的逻辑，是资产阶级的语言。每个国家的资本家都希望他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能够独树一帜，没有别的国家的品牌可以和他们的产品竞争，他们就可以发大财，这是所有的资本家的最高愿望，但是这和毛主席领导我们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完全扯不上关系。毛主席领导我们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是要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把国家建设起来，使得中国人可以不再受外国的欺凌和剥削，为未来建造一个有希望和有前途的国家，使未来世世代代人民都享受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财富。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要实行资本主义就必须得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毛主席从年轻时起就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因为他从来都是从中国人民的立场出发，所以他才能如此深刻地做出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只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决策。在他的《新民主主义》的论述中，毛主席说明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其它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他们很是软弱，在外不能独立于外国资本，在内不能脱离地主，所以他们无法完成土地改革，结束中国的封建制度。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要由无产阶级来完成。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完成土地革命，结束了封建制度，下一步当然就是走向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部份：解放后两条路线斗争总结

本文的第一部份和第二部份所谈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都集中在经济基础方面，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绝对不止限于经济基础方面，上层建筑方面，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同样非常重要，或者说更重要。因为所有经济基础方面的改造，都要经过思想和意识上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农业集体化和农村建设，是城市里的反贪污、反腐败，还是工厂里工人和干部的关系，甚至于从教育和文化上，到医疗卫生上都经历了两条路线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这各个领域里的斗争都是由毛主席发动、在人民群众的参与下进行的。毛主席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勇气、力量和决心，相信人民群众会为他们的前途作出最好的选择。从另一方面看，群众则是对毛主席的领导有着无比的信心。就是这样，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新中国与走资派斗争，创出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并在 1966 年达到了最高潮。

（一）文化大革命与两条路线斗争

到 1966 年时，中国共产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了 10 年之久。毛主席从与资本主义路线斗争的革命实践中，对党内的资本主义路线有了深刻的认识。毛主席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一些日子里，已经看到共产党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了不同的，实际上是相反的路线，但他还是一直把这样不同的路线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对待。到了 1966 年时，毛主席总结了党内 10 年之久的斗争，已经超出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这时他决定，到了这个时刻，只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地投入这场斗争，来决定中国未来的道路。毛主席知道只有广大的群众清楚地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和区别，社会主义路线才可能有最终胜利，也就是只有当人民群众了解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社会主义路线才能取得胜利。因此，除了发动人民群众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于是他才果断地、不犹豫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里，人民在参与阶级斗争的过程中，认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我们今天能够分辨什么是社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资本主义路线，也是我们从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中学习到的。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份子继续在各个领域中，与走资派作顽强的斗争。走资派把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说成是他们失去的十年，这是正确的。反过来说，这 10 年是无产阶级最珍贵的 10 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早在六十年代末就解散了。若果真如此，那么中国农村的农田基本建设就不可能完成；没有了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农村办工厂也同样不可能。同样地，没有文化大革命，农村的医疗和教育的普及也是不可能的；对全民所有制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工厂里的合同工在六十年代中就会逐步建立起来，哪会还有什么《鞍钢宪法》和工人管理工厂的推广？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教育上的新视野，还谈什么工、农、兵享有高等教育？统治阶级就会继续用劳动人民生产出来的剩余供他们获取知识，再反过来统治劳动人民，这是世界所有国家（除了占短的中国文革时期之外）自古至今一贯的作法；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腐朽的封建文化就会在新社会里再度“发扬光大，开花结果”，找到新的扎根的土壤。总的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谈什么两条路线斗争，也就不可能在今天和未来继续两条路线斗争。因为没有具体的阶级斗争内容，“社会主义”只能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洞理想而已。

文化大革命使走资派夺取政权推迟了 10 年，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路线和资本主义路线的根本区别，给了我们多一点时间，也让我们对真实的阶级斗争有了一些经验。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可以分析解放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这样的分析是为了以后重新出发做好准备。

我们当然要面对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所引起的负面影响。近來有很多讨论文革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我看到许多参加文革的人承认和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并且也提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做是负责任的态度。因此，指出文革中的问题，并不会使我们因为这些问题就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价值。反过来看，右派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竭尽所能，包括编造大量无稽的谎言来对文革进行毁谤和污蔑。但是，即使这样做，他们也无法抹去这一段历史的真实。但他们的确痛恨在心，因为文化大革命教育了人民，使人民有了判断力，使得资产阶级即使夺取了政权，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光明正大地推行资本主义，而要躲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块招牌的后面。除此之外，资产阶级也会经常恐惧文化大革命会在中国再次发生。

（二）资产阶级为何能夺取无产阶级政权

这里必须再次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是成功的。只有走资派才会不断地重复说社会主义是失败的。我们不能跟着重复他们的话说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不能继续走下去的原因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失败了，而是因为走资派夺取了无产阶级的政权，过去的共产党变成了今天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党，这个党假借着共产党的名，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政党虽然在口头上仍然说宣传“毛泽东思想”，但是今时今日，这样的谎言已经无法继续欺骗人民。今天，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只存在历史上，但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实践还继续存在人民的心里。人们不断地拿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的实践的经验，来比较和评价今天一切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成绩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照妖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同样可以说社会主义没有失败，社会主义虽然暂时退却，但是社会主义没有死去。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社会主义走不下去的这个事实，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分析为什么走资派可以夺取政权。资产阶级是在他们夺取了政权之后，颠覆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国际外交的所有的一切，将其改变成资本主义的。

我在这里只提出几个明显的原因，每一个原因还需要进一步作更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和革命者不断地讨论，才能作出更为清晰的分析，最终形成结论。

（1）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初期的发展中，商品生产会逐渐减少，并最后消失。在商品生产逐渐减少的过程中，价值规律也会逐渐失去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功能，商品的价值规律不再决定在这个社会里要生产什么。在商品生产消失之后，社会的产品生产不再受价值规律的限制，而是完全取决于社会的需要。

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生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上都增加了。至于到底增加多少，应该作实际的调查和分析。在集体所有制的生产中，除了农民自己消费部份和用来向国家缴税的部分外，仍然是商品生产。在国家与集体的交换中，大部份都是商品，因此，必须要考虑到商品的价值规律。毛主席特别指出，国家向集体购买猪肉时，就必须要使农民养猪有利可图，因此，国家卖给农民的饲料价格要够低，国家向农民购买的猪肉的价格要够高，这样农民养猪才合算，农民才愿意养猪。如果集体所有制卖给国家的猪，有商品生产的性质，那就不能违背价值规律。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要生产多少猪，并不靠价值规律来决定的市场供给和需求，而是靠计画。那么集体所有制卖给国家的粮食呢？国家从集体所获得的粮食中，有一部份是向集体买的，另一部份则是集体向国家缴的税。到底有多少是商品？这必须要进一步好好地探讨。

集体所有制中，除去卖给国家的部份，其余很大的部份是供给自己消费的，像粮食是经口粮直接分配给农民的，其它的肉、禽类和蔬果类也应该是供社员自己消费的，所以不是商品生产。在人民公社被强迫解体之前，公社与公社之间的交换还不多，但是如果人民公社没有解散，公社与公社之间的交换应该会多起来。如果集体和集体之间的交换频繁起来，商品生产的量（绝对量和相对量）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在社会主义时期，全民所有制内的许多生产是否也是商品生产？应该说，全民所有制内的许多生产已经有“非商品”的性质。例如住房不是商品，医疗、教育也不是商品。另外，其它的许多消费品（配给之外的衣服、家庭用品、脚踏车、缝衣机等）应该还是商品，但是这些商品的生产同样也不取决于市场供求的价值规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消费品的供给会增加，因此，是否可以说商品的生产会继续扩大？

这些发展和可以预料到的未来的发展，都说明在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生产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上都在增加。因此，商品价值规律必然会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就是在社会主义中存在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因为商品生产继续存在，而且在不断扩大，商品价值规律也就不会消失，只能通过国家加以限制。但是当商品生产不断地扩大，价值规律就会冲破这样的限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资本主义因素是在商品生产下客观存在的，在生产力发展仍然落后的社会，商品生产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因此，它就会不断干扰社会主义的前进，这也就是走资派可以夺取政权的最重要的内因。

（2）在社会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无产阶级是领导社会主义路线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直接参与了两条路线斗争。在斗争中，无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地增强，作为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在不断的斗争中成熟。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斗争都是开始于经济斗争，从经济斗争中提升到政治斗争。但是这一步提升往往会遭遇困难，例如美国的工会运动，最开始是由美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组织工人的目的是为了革命，美国的资产阶级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工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政权就把在工会中所有领导工会的共产党员都赶出了工会。工会换了一批新领袖，他们带领着工人只争取各种经济利益，刻意鼓励工人满足于“中产阶级”的生活，要工人认同美国帝国主义，赞成并且支持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相比，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从工会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成长的。解放前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开始时往往是经济斗争，但是很快就会提升到政治斗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工人运动即使是从经济斗争提升到政治斗争，他们的政治斗争也还是局限于资产阶级的政党的范畴之内，比如在美国，长期以来工人运动都是依附在民主党之下，因此，不能提升到阶级的政治斗争，至少目前还看不出这个可能。

解放之后，所有无产阶级所参与的斗争，都属于政治斗争，而且是阶级的政治斗争。解放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极为快速地成长起来，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1949年到1976仅仅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不管无产阶级成长得多快，仍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级。即使如此，在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很大一部份的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改革中，还是作了顽强的抵抗，但是他们的力量确实太过薄弱，无法抵抗资产阶级用国家机器对他们的进攻。但是今天，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在不断的斗争和锻炼中成熟起来了，当更激烈的斗争开始时，他们将很快就进入阶级的政治斗争中。

（3）本文对解放后工农联盟的发展有较多的陈述。社会主义时期，在路线的斗争上，工人和农民的紧密的联盟促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迈进。但是到了七十年代初，工农联盟遇到了困难。我认为这个困难来自在集体所有制下，农村产生的两极分化。

本文的第一部份和第二部份已经提到，在生产力发展仍然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所面对的困难。困难之一，就是不可能有一个单一的公有制，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的经验，是在工业生产的领域里，生产工具属于全民所有，在农业生产的领域里，生产工具属于集体所有。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策略，是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之间，建立互相支持的关系，这种互相支持的关系，巩固了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紧密联盟。工人和农民的紧密联盟使得社会主义路线在与资本主义路线斗争中取得胜利，把社会主义建设向前推进。

但是因为集体所有制不平衡的发展，扩大了地区之间，甚至同一地区内不同公社之间的差距。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这样的差距更因为社办工业和大队办工业的发展而拉大。特别是在江南一带，因为气候适宜和土壤肥沃，长久以来，就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大跃进”之后，这一带的公社和大队首先就开始办工业。因为这一带离上海和一些其它的工业城市比较近，它们能比较容易地得到办工业的信息和一些从全民所有制工厂退休的工人的技术，而这些都有利于它们兴办社、队工业。工业生产可以获得较高的收益，而且回收快。从一个公社和一个大队的立场来说，办工业能够快速增加收入，因此，它们会希望能把更多的钱投向工业。

我参观过一个在江苏省的社办电灯泡工厂，这个厂是在“大跃进”时期开始兴办的，但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它暂停了生产（就是下马），困难时期过去后，六十年代中，农业生产恢复，它的生产又开始了。刚开始时，只借了三间屋子，而到了1979年我去参观时，这个电灯泡工厂已经大有发展，除了普通的电灯泡之外，它还生产包括霓虹灯和汽车车灯在内的其它各种电灯泡。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这类集体所有的工厂继续扩大生产有困难，因为它的生产尚不包在国家计划之内，所以它不能取得所需要的原材料。我虽然没有机会可以调查，但是可以推想到其它集体所有的工业应该也有同样的困难（这一点我无法肯定，应该做调查研究）。当时一些左派看到这样的发展，把它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滋生，这样看虽然没有错，但是有些“左派”的作法是批评这些集体所有制的工厂，说它们在“挖国有企业的墙角”。从批评中可以看出，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这些集体工厂靠关系来从国有企业取得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我的猜想是因为当时无法解决有关集体工业要发展的问题，这些“左派”找不出适合的方法对生产力进行疏导，于是只能用“堵死”这样的发展的方法。在我去参观的时候，改革开放的政策已经开始，就在这时，从香港来了一家生意，他们要和这个电灯泡工厂订合同，由这商家给电灯泡厂提供生产材料，来生产各种圣诞节的灯泡，这个工厂当然欢迎这个机会。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到，资本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有它的支持者。集体企业要发展，需要原料是个实际的问题，这样实际的问题说明了社会主义里有资本主义的因素，这样的实际问题不能用“堵死”的方法来解决。无论如何，阻止生产力发展是错误的，但是如何疏导这样的发展呢？这是个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

我在这里提到的只是从观察一个例子里联想到的问题，因为没有机会可以调查，所以不知道集体所有制中还有多少同样的问题，但是应该可以联想到集体所有制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的发展很不平均，富有的公社、大队和贫困的公社、大队面对的问题不同，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样的发展说明了两种所有制不能长久并存。两种所有制并存所产生的矛盾，也就是国家与集体之间的矛盾，使得工农联盟在两种所

有制并存的矛盾下，难以巩固。我们看到，一旦工农联盟发生了问题，劳动人民抵抗资本的力量就会减弱，代表资本的力量就得到了机会夺取政权。我们可以看出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1985 年正式将农村集体解散，这时全民所有制下的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同盟军，不管他们拿出多大的勇气和资本作顽强的斗争，最后还是被击败了。中国的革命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的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在紧密联盟下取得的成果。当工人和农民的联盟产生了困难时，代表资本的资产阶级就趁虚而入了。

（4）上面所提的三个原因是走资派可以夺取政权的内因，除了内因之外，还有外因。外因就是在苏联走上修正主义之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像是世界资本主义中的一座孤岛，虽然世界上非常多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对中国争取独立自主的道路极为羡慕，他们也非常渴望经由革命得到解放。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进步人士，包括很多革命党，不断地来中国访问，他们想了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希望学习中国的经验。毛主席不断地给他们分析世界的大情势，并且鼓励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具体情况作了解和分析，来策划革命要走的道路和发展革命的策略。世界上许多半殖民国家对中国是很友善的，毛主席也曾说过中国是被这些国家抬进联合国的。

但是走资派的人看不到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是各大帝国（特别是美国）的强盛。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对台湾能用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很是羡慕。夺取政权后的资产阶级推出了资本主义改革，而资本主义改革就必须配合对外开放，因为资本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才能转变为利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资本的快速积累，就是通过大量的从中国工人和农民那里剥削来的剩余在国际市场上变现为利润来完成的，这大量的剥削还包括对中国自然资源（水和土地）和环境（空气、河流、湖泊和海岸）的剥削。中国如此快速地发展资本主义是一条新路，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因为在中国之前，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在 10 年 20 年的时间里发展出那么庞大的国内市场来完成资本积累，而中国的资本主义改革配合了对外开放，面对着全世界庞大的市场需求，在极短的日子里，可以大幅度地扩张消费品的生产，而不必顾虑生产过剩，东西卖不出去。另一方面，中国快速的经济成长也给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扩张了它们的商品销路。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时，正是世界各大资本主义国家面临资本积累停滞的时刻，中国的开放给了国际跨国资本极大的扩张机会。1979 年时，世界汽车产业因为滞销面临着全面危机。不止是汽车产业，几乎所有的产业都面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对资本主义来说，增加生产不是问题，二次大战在欧洲和日本所造成的大规模破坏，不到 10 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复建，而生产相对市场需求（需要+购买力）过剩，商品没处销售却永远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到了 2009 年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但是仅仅 10 年之内，中国的汽车市场就饱和了，2019 年中国汽车销售量下降了 11%。（CNN 商业报告，2019 年 11 月 26 日）。

在邓小平羡慕台湾的加工出口经济时，台湾和其它走这条用出口加工来促进经济成长的路已经接近尽头。中国走向这条路后，台湾的资本家就放弃了台湾，纷纷跑到中国大陆投资，利用他们过去跟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继续接跨国公司的订单，到大陆生产。中国政府因为可以利用这些来自台湾的资本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所以在各方面都给他们优厚的条件，比如不要求他们对工人进行任何保护，允许这些资本家随意对工人在生产上作各种苛刻的要求，不但同意这些资本家压低工人的工资，取消工人的福利，还允

许资方不断地加快生产速度，却不必负责工人因赶工而导致的身体各方面的伤害。另外，中国政府也不对这些工厂提出保护环境的要求，允许它们把生产所产生的各种废物，包括有毒有害物质，随便处理。中国政府这种作法符合新自由主义对资本的优待，为资本提供最有利的累积条件。

中国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力投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分工的行列，在此前后，全世界的落后国家也都不得不放弃独立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加入了国际跨国资本所安排的新世界分工。（请参考附录二：晚期帝国主义）。它们和中国一样，在彼此的竞争中，用牺牲自己国家的人民、牺牲自己国家的自然环境，来为跨国资本提供最优厚的生产条件。但是也只是在 20 年之后，这条靠用出口来刺激经济成长的路也已经快要走到尽头。

在中国之外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中国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是走资派夺取政权的一个外因。这个原因虽然重要，但是内因是更基本的。

（三）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使我们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中国的资本主义实践已经经历了 40 多年的时光，相当于社会主义 20 年的两倍。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亲身所受的一切，使他们有切身感受，对资本主义有了深刻的了解。中国的劳动人民了解到在资本主义下生产力快速的增长中，他们作了极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无法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果，他们的生活反而更加困难，更加没有保障；工人失去了工作的稳定和工资的保障，他们失去了免费的医疗，失去了几乎免费的住房，他们为自己的生活发愁，为子女的教育费用发愁，为子女成家发愁，为自己退休养老发愁。

资本主义改革说什么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国人民致富。前一半做到了，少数人的确是富了起来，不止是富了起来，而且是极端的富有，但大多数人不但没有富起来，而且在相对的和绝对的贫穷化，劳动人民失去了他们生活上最基本的保障。都市工人的工资太低，租房住都困难，更不要奢谈买房。没有住房就不能成家。农村的农民已经无法靠种田生活，大批的农村年轻人丢下父母和子女，到都市去当雇佣工人，这些农民工每月把工资寄回家，供他们的父母和子女勉强生活。

中国的劳动人民不得不把他们今天的处境和社会主义时代相比较，社会主义时代，劳动人民贡献出他们大量的劳动力，他们过着省吃俭用的清苦的物质生活，但是他们了解这样做是为了未来后代，而且他们看到社会上并没有人把他们辛苦工作的成果拿去挥霍，拿去享受。在社会主义时期，因为没有剥削、没有掠夺，劳动人民心甘情愿地把“公”放在前面，不为“私”争得不可开交，社会上没有偷，没有抢，没有谋财害命，凸显出人性善良的一面。这一切都在今天改革后改变了。因此，我们不能说因为人类的天性是自私的，所以社会主义不能成功。要责怪的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是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欺压人的制度改变了中国平等的社会和中国善良的人民。

（四）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得出的结论和我们今后选择

毛主席在 1940 年写了《新民主主义》一文。在这篇论文中，毛主席解释了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之间的不同。按照我的理解，毛主席所说的旧民主主义，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是铲除封建主义，为发展资本主义铺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其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到了 1940 年写这篇文章时，毛主席看到由孙中山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不可能实现。他说：“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他不为帝国主义所允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毛主席这里所指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主席把问题说得多么清楚。

在中国的解放斗争中，毛主席分析了中国半封建和半殖民的社会性质，在这样的社会革命的主要力量来自工人和农民，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地主。因此，革命的策略是在工农联盟下，与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敌人，而是站在反帝的立场上可以联合的对象，但基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他们从根本上不可能坚决反帝。同样清楚的是由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因此，民族资产阶级最终将被消灭，这一点大家都是清楚的，共产党是不做隐瞒的。因此，在反帝的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也只能是一个暂时联合的对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9 年中国革命成功，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那时许多落后国家，除了早在 19 世纪末取得独立，纷纷从殖民地独立出来，建立了独立国家，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从拉丁美洲到非洲再到亚洲，都希望不但政治上要独立，而且在经济上也要独立。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主要的领导力量来自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与中国在解放前的“民族资产阶级”相似，也都因为资本主义不发达，所以资产阶级很软弱，因为资本主义不发达和资产阶级软弱本是一回事。不过，虽然他们软弱，但是仍然认为自己的国家可以脱离帝国主义的控制，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国家中也有主张革命的，认为只有经过革命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尤其是古巴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对拉丁美洲产生了非常大、非常积极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发展落后国家，还是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想要走脱离帝国主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但是在战后 70 年的发展中，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能够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换句话说，它们无法反抗帝国主义对它们国家发展的干涉，无法反抗帝国主义对它们的剥削和掠夺。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如此，到了八十年代后，发展到今天的 40 年的新自由主义时期更是如此。本文后的附录二对帝国主义在过去 40 年的变化作了分析，分析中论述了这 40 年来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所遭遇的各种困难。这最近 40 年发展的事实，印证了在帝国主义下发展落后国家想要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在这 40 年中，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不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帝国主义全球化中，他们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他们的地位使他们累积了大量的财富。从这一点来看，虽然他们和国际垄断资本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争执，但是他们的立场是清楚的，他们是一定不会反帝的。

因此，我的结论是，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所带来的最可贵的成就，是以中国靠自己的资源和人民的努力，以人民的需要为主发展了中国的经济。中国人民不再受内在的和外来的剥削，在全民所有制之下，执行了工农联盟的计画经济，用两条腿走路，一步步朝着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大规模和快速度地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技术，并普遍地提高

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是如此成功的发展，都在无产阶级失去政权后终止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是成功的，绝对不是失败的。新资产阶级把中国带向资本主义改革，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只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有资本主义改革，就必须要有对外开放。因为资本主义改革可以使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但是他们剥削到的剩余价值，只有在商品卖出去之后才能转换成利润。因此，有“改革”就必须要有“开放”。资本主义改革和开放就是放弃了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其结果就是中国的劳动人民受尽了剥削，中国的资源受尽了掠夺，中国的土地和河川受尽了污染。我们不得不问：中国未来世代代的人民的希望在哪里？

新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政权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下得到独立自主的发展，经历了40年新自由主义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很清楚地认识到，各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下得到太多的好处，因此，资产阶级不可能反对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各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会有各种形式的斗争，但是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总是要拥护资本主义 / 帝国主义的。因此，美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反帝，欧洲的资产阶级不会反帝，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反帝，印度的、巴西的资产阶级也都不会反帝。今天世界上的反帝的力量，只能来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劳动人民，也就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同盟农民，毛主义领导中国革命和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工农联盟策略，仍旧适用于今天。40年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在这40年里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使我们认识到：对劳动人民来说，只有社会主义是我们唯一可走的道路，别无其它选择。

全文总结

从这篇文章和文章后的三个附录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未来的世界将是全世界广大的人民与世界垄断资本之间的一场决战。我们要作的选择是要站在广大人民一边，与他们一起为人类的解放和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而奋斗，还是站在少数垄断资本的一边，帮助他们继续疯狂地扩张资本积累，劳役人民、剥削人民、耗尽地球上的一切资源，毁灭一切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空气、河川和海洋。这场决战就在不久的将来，因为广大的人民不能坐视世界垄断资本继续毁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为我们的后代争取他们的生存权而奋斗。

附录一：《鞍钢宪法》划时代的意义

在《鞍钢宪法》诞生 5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讨论《鞍钢宪法》的重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50 多年前，毛主席就看出鞍山钢铁公司党委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把它命名为《鞍钢宪法》。毛主席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新法提高到宪法的高度，可见他对鞍钢的改革是极为重视的。50 年前，我们一般人无法理解《鞍钢宪法》的深刻意义；而今天，我们确实认识到《鞍钢宪法》是办好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保障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大法，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要深刻理解《鞍钢宪法》，必须先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目前一些专家学者有一种说法，认为《鞍钢宪法》是一种企业管理的方法，既可适用于社会主义企业也可适用于资本主义企业，并认为《鞍钢宪法》的精华已被一些美国和日本企业所采用，因此现在中国也应该再度重视这种“管理方法”，不要再让它“墙里开花墙外香”了，好像《鞍钢宪法》已经在墙外香了起来。事实上，日本或欧美所实行的一套工厂管理，绝对不是当年毛主席提倡的和今天所纪念的《鞍钢宪法》。我们千万不可把《鞍钢宪法》看成只是一种“管理方法”。因为《鞍钢宪法》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得到实施的。

本文首先要讨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资本与劳动者是对立的关系，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家在工厂里所用的劳工管理就是想办法缓和这种对立的关系，以便达到控制工人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下面先说明在二十世纪的大规模工业化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是如何运用泰勒的“科学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和到了七十年代这种所谓科学管理是如何失效的，之后才出现福特后的丰田管理。写这篇附录的原因就是为了说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从而认清为什么《鞍钢宪法》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才有可能得到实行。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福特制的那套管理办法已经失灵了，资本主义企业又争先恐后地向丰田汽车公司学习“瘦身管理”的办法。不管是福特制，还是丰田制，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和一些专家顾问们设计出来的对付劳工的策略，用来处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策略的最终目的，是要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来增加对劳工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以便获取企业的更高利润。本文最后一节，要进一步讨论《鞍钢宪法》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划时代意义。

一、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资本家与劳工对立关系的工厂管理

泰勒的“科学管理”是怎么回事？

泰勒出生在美国费城的一个富有家庭。他年轻时辍学，到他父亲朋友开的工厂当学徒。泰勒当过几年学徒后，就在一家钢铁厂的车床车间当技工。他说，与他一起的有二十多个人，工厂每周开工六天五夜，工资是按件计酬。按件计酬，一般对工人不利，因为工人为了

多赚点工资就越做越快，加速赶工的结果是降低了每一件工资。因此在计件工资下，工人必须团结合作，我们联合起来尽量将工作速度降低。泰勒曾经被邀请到国会作证，作证时他说：“我们每天只做我们能做的数量的三分之一。”泰勒被提升工头后，很诚实地对他的工友说：“从现在起，我不跟你们站在一边了，作为工头，我必须从工厂管理者的立场出发，我将尽一切努力来把生产速度加快。”以前跟他一起工做过的人对他说：“那你就成了一头该死的蠢猪，我们不会让你得逞。”

泰勒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他当了工头之后，就用各种办法加快生产速度，工人们也就用各种办法抵制他。开始时，泰勒训练几个新工人，教他们车床工的技术，也教他们怎样加快速度工作。可是这些新工人在结束训练开始工作后，立刻就把速度减慢下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跟那些老工人一致的，他们不想加快工作速度，为老板拚命卖力。在彼此斗争中，泰勒的工友问他：“你若还是工人的话，你会怎样做？”，泰勒诚实地说：“我会跟你们一样，尽量把工作速度减慢。”这样的斗争持续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泰勒决定在训练新工人时，要他们承诺在学会了技术之后，每小时一定得做出一定数量的产品，否则就扣工人们的工资。这样的做法，终于逼着新工人加快工作。这时，老工人也只好加快他们的工作速度。然而这场斗争并未结束。此后，新老工人联合起来破坏机器，使得几乎每天都有机器发生故障。泰勒说，他很熟悉工人这种对付工头的伎俩，工人们是用这种破坏性的办法来对付工头的。他们向老板说工头已经把生产速度增加到连机器都承受不了的地步，所以机器坏了。这样，就把责任推到工头的身上了。泰勒又想出新招：谁要是破坏机器，谁就要被罚款。在厂方全力支持下，经过3年的斗争，泰勒获得了成功。

泰勒在这场斗争中深感到，技术工人对生产有很大的控制权，资方要取得控制权，就要花太多的心血和精力与技术工人作斗争。有了这次成功经验后，泰勒就致力于研究如何把技术从工人手中夺过来。因此，所谓泰勒的“科学管理”，就是研究如何把复杂的技术分解开来，成为很多简单的步骤。这些简单的步骤，完全可以由非技术工人来完成。泰勒还进一步研究工人，怎样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一个简单的步骤。他要工人做各种不同的操作，然后用运动员那种计时器来测量每种操作需要几秒钟可以完成。在泰勒的研究中，他知道不可能所有的操作都不需要技术。但是，他可以用分工的办法把技术分割开来，不让任何工人控制一个完整的技术，这就使工人失去对生产过程的控制。

哈瑞·布雷佛曼（Harry Braverman）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泰勒的“科学管理”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在1974年出版了《劳动与垄断资本》这本书¹⁹，上面谈到的有关泰勒的生平及泰勒在国会作证的陈述，就来自这本书。布雷佛曼将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进行了三点总结。下面就对这三点作些解释：

第一，资方透过他的经理们从工人处搜集有关技术的各种资料，并藉此掌握每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将生产程序与工人的技术分开：资方经他的经理们尽量从工人

¹⁹布雷佛曼：《劳工与垄断资本》（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当中搜集各种有关技术的资料，并掌握每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这样就可以对工人进行全面控制。

第二，概念和执行的分离——将所有需要思考的工作从生产车间移出，将所有需要头脑思考的工作从生产车间移出，把这些工作集中在完全由资方控制的计划部门和设计部门，布雷佛曼说，资方为了取得全面控制，必须将原来由工人策划和思考的部分从整个工作中分离出来，只剩下需要工人动手做的部分。布雷佛曼认为这种做法是违反人性的，因为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动物就是人在动手之前，先在脑子里构思和计划该用什么步骤来完成一项工作。资方不允许工人构思和计划，就是为了控制工人。被控制的工人则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变成一个不能有意志的、任人摆布的傀儡。

第三，当由资方雇用的经理们掌握了所有有关生产的资料后，他们只需要列出一个清单，再由工人按步骤去履行。这样一来，管理阶层就可以硬性规定工人每天要做什么工作，工作中的每个细节，并且规定工人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指定的工作。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时，美国产业工人的待遇与现在相比，要好得多。可是汽车工人和其它各大工业的产业工人，对他们工作的满意度却是非常低的。他们认为，每天都在忍受着单调无聊的工作，又无法改变这种现状，工会也帮助不了他们。许多工人到汽车公司打工，就是想趁年轻时苦上几年，多挣点钱，退下来后再找别的工作。可是总是在结了婚，有了孩子后，开销越来越大，就退不下去了。我教书时，有一个学生曾在汽车公司作了10年的工人，他所做的是一种极为简单、只需几秒钟的抛光研磨的工人，每天就不断地重复这几秒钟的简单工作。由于工作时吸进了他磨出来的金属粉末，后来他得了肺部疾病。躺在医院修养期间，他开始考虑，后半辈子是不是就这么过下去？是不是只为了多挣点钱，继续干那种极为单调、无聊、又伤害身体的工作？最后他决定辞去工作，回学校读书。他说，他比跟他一起工作有利的是，他没有结婚，没有家庭负担，所以可以辞去工作。另外，所幸生了病，可以躺在医院里有时间思考，做出了这个重要的决定。否则，每天下工后都累得半死，吃了晚饭后在电视机面前发呆一阵子，就得去睡觉了，一天一天的就这样过去了，没有精神来想任何事情。

布雷佛曼书中说到，七十年代初时汽车公司工人的旷工人数持续上升。根据《财富》杂志在1970年的一篇报导，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平均旷工率达5%，周一和周五更高达10%。还有很多工人迟到，工头每天早上都得急忙地找替工。工人也常抗拒加班，并常与工头争执。还有些工人不高兴就索性不干了。福特在前一年有25%的人辞职，有的工人甚至一天工没干完就走了，或者干了几天后连工厂欠他的工资也不要就开溜了。布雷曼说，1970年克莱斯勒与汽车工会签订合同时，资方说有一半工人还没有完成他们90天的试工期就走了。同一年，福特在底特律郊区的一个工厂，每个月有8%的工人辞职，这个工厂为了维持5000个工人，每年必须新雇4800个工人。这些现象都表明，当工人稍微有些经济能力后，就越来越不愿意接受这种非人的工作环境。

工人的抗拒严重地影响到生产效率，因此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来研究美国工人对工作不满的问题。这个专案小组对工人的不满所引起的后果作了如下的报告：

“结果是工人的旷工率、辞职率和野猫式罢工不断地增加²⁰，从工人对工厂进行破坏，生产品质下降中，都显示出工人的工作意愿很低。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更加证实了工作上的问题已经连带地引起了其它的问题，包括工人身心健康、家庭的稳定性、社区的参与和社区的凝聚等，而且使人对社会和政治的态度趋向极端化，导致吸毒、酗酒、暴力与其它犯罪不断增加。”²¹

这篇报告很值得重视，它显示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和资本之间对峙的严重性，因此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福特的“科学管理”，用尽了一切手段来控制产业工人，以便扩大汽车业和其它大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资产阶级大量地并快速地增加了资本积累；而另一方面，这种违反人性的生产程序，却遭到工人的不断反抗。在资本主义大国的工厂里，经过近 70 年的实践，证明了福特的“科学管理”，不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因此，资本家必须策划对付工人的新策略。这就是：一方面用“全球化”来为资本找到新的出路；另一方面，就是采用丰田制的“瘦身管理”（Lean Production）。

什么是丰田制的“瘦身管理”？

“瘦身管理”是二战刚结束不久，由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大野耐一（Taiichi Ohno）所策划出来的一套工厂管理制度，也被称为“丰田制”。日本在战败后，一切物资都非常缺乏的情况下，必须得尽量节省资源，这就是“瘦身”这个名称的由来。²²后来丰田制的“瘦身管理”名扬在外，是 80 年代以后的事了。“丰田制”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 70 年代时，美国各大汽车公司面对着难以解决的劳资矛盾，以及与这种矛盾相关联的产品品质低劣和生产成本过高的各种问题。当时国际汽车市场上，日本的几家大汽车公司不但迎头赶上，而且超越了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1955 年时，日本的汽车产量只是美国汽车产量的 1%，而到 1980 年时，日本的汽车产量已经超过美国。

丰田制生产的座右铭，就是不断地增加效率和不断地提高品质。增加效率就是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品质就是为了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争取更多的顾客，以便增加销售量。销售量越大，每部车子的成本也就越低。因此丰田制的“瘦身管理”的目的，就是追求更高的利润。我们从名字上就可以猜出“瘦身管理”的意思，那就是要不断地除去多余的浪费（肥肉）达到瘦身的目的。“不断地”是由日文的“Kaizen”翻译过来的。在实行丰田制的工厂

²⁰ 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是指不在工会与资方签订的合同之内所允许的罢工。

²¹ 布雷佛曼：《劳工与垄断资本》第 31 页。

²² 参考：Lean Work, Empowerment and Exploitation in the global Auto Industry, edited by Steve Babson,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第一章, 7

里，到处都贴满了“Kaizen”，也就是说，不是达到一定程度的瘦身就可以满意了，而是必须不断地、无止境地继续瘦下去。瘦身的范围包括节省材料、节省空间、节省能源、节省人工等等。长期以来，通用和福特的生产都是为了使生产线不间断，因此在各方面的资源都留有余地。像在仓库里总是有富余的原材料和零件的存货，在生产线上也会有几个后备工人，可以在有人不来上工或迟到时补上。但是对“瘦身管理”来说，这些余地都是多余的浪费，都是必须减掉的肥肉。

“瘦身管理”的“零库存”，就是要将生产时所需要的材料和零件的存货降到最低，最好是能做到在开始生产需要原材料和零件时，货车刚好把它们运到，马上能上生产线。因此，在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地（丰田城）的公路上，每天早上都挤满了运零件的大型卡车，准备给丰田送货。有人说丰田把公路当成了它的免费仓库。事实上，完全没有库存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原材料和零件的供给商很难刚好准时地把货送到。但是“瘦身管理”把这个难题交给供应商去解决。供应商为了预防万一，只好留一些余地，但是这个费用只能由供应商来负担，由他们来伤脑筋。丰田保持“无库存”就省去了仓库，也省去了因保持库存所占用的资金。丰田在加拿大所设的工厂也是用公路作为它的仓库，每天早上大卡车在公路上排长队，准备送货。有一次这家工厂的工人与厂方发生纠纷，许多工人的家人就起早开了车把公路挡住，使大卡车无法准时把货送到，这时丰田才尝到零库存带给他的苦头。

“瘦身管理”在生产程序上把工人分成好多个小组，并且将每个小组工人的人数降到最低，一般小组内有4个到6个工人，并规定每个小组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的指标，不留任何余地。所以如果有人旷工或是迟到，小组里其他人必须负责加快工作，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工。这样就使得工人不敢旷工或迟到，因为他们怕会给组里其他人增加负担。资方这样做，就把工人旷工和迟到的棘手问题转嫁给工人。工人怕给组里其他人带来麻烦而受到一起工作的工友责备，因此，即使生了病也常常勉强带病上工。

“瘦身管理”剔除了任何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员，用“瘦身管理”的话来说，就是剔除任何与直接增加价值无关的工人，比如机器的维修工人或是清扫工人。在福特或通用汽车这些工作都专门有人负责，但是“瘦身管理”把这些工作都交给工人的小组负责。每个小组有个小组长，小组长的事也很多。他（她）要安排工人的工作时间，如果有工人不来上工，小组长要自己来替补，他（她）还得负责纪录工人的工作时间和安排工人加班，就连工人上厕所也得小组长认可；小组长还得负责品质管制，安排机器维修和解决生产上的任何故障。

渡边勉（Ben Watanabe）是一个在日本从事工运的积极份子，他在底特律见习时，我邀请他来我的课堂上演讲，他给学生介绍了丰田制的工厂情况。他说，工厂里各处都设有显示灯来反应生产进行的状况。如果生产运转顺利不发生故障，会有绿色显示灯出现。这时负责管理的人就要注意了，因为如果老是出现绿灯，那就可能是资源的安排过多了，这时必须再抽走一些资源，譬如说，再减少工人人数，或将流水线的速度再加快。但是如果工人人数太少，生产线的速度调得太快，因此引起了生产上的故障，显示灯会出现红色，那也不

理想，因为生产故障会耽搁时间。“瘦身管理”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不理想。最理想的是把生产的速度尽量调快，但又不至于发生故障的程度，在这个最理想的速度下显示灯出现黄色。

“瘦身管理”就是要把生产线维持在显示黄灯的速度。这样工人就得在生产即将发生中断的威胁下，紧张地工作。在日本汽车生产大量增加后，生产管理不断地瘦身的结果，不但因工作引起的伤害增加，而且更多的工人的精神和体力再也支持不下去。渡边勉说，因为工作劳累过度而猝死的人不断地增加，日本的社会福利部门还特别设了一个电话热线。由此可见，因过度劳累而猝死的人已经不是个案。从另一个统计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工人在“瘦身管理”下工作，比福特制下还要紧张得多，在福特制工厂中，平均每一分钟内，工人完全不停的工作有 45 秒，而在丰田制的工厂中，每一分钟工人不停地工作达 57 秒。对实行丰田制的工厂来说，无止境地瘦身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但是它们把这样做的恶果转嫁到工人身上。

日本的工厂能实行“瘦身管理”，有它一定的社会基础。日本在二次大战战败后，统治阶级要日本公民加倍努力，用生产上的优势来征服世界，以便清洗国耻。日本政府还用国家资源有计划地来支持各种工业的发展。到了 50 年代，虽然日本企业已经是现代大型企业的组织，但是这些现代企业也继承了不少战前日本家族企业的传统。只是企业主替代了家族的家长，他们向工人灌输企业与工人本是一家人的思想，企业主用终身雇用换取工人对企业的忠心。从战后到 80 年代的 40 年间，日本的工业生产从纺织业、到汽车业，再到电子业，不断地超越欧美，产品征服了世界市场。在出口不断扩张的情况下，日本的企业主可以实现他们的承诺。所以，战后日本第一代工人享有终身职，不怕被公司辞退；但是也只有大工厂的正式工人才享有终身职，在其它小的做包工的工厂，工人多半不做全工，而且可以随时被解雇。大工厂的工人为了表示对公司的感激，也为了自己工作的保障，就忠心耿耿地为资方效劳。日本能在短短的 20 年间就一跃而成工业强国，一大半都应该归功于日本工人的勤奋。

到了 80 年代，日本的各大工业就存在着大量过剩的产能，这时日本的资本就大量转移到东南亚投资，多余的资本就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到了 80 年代末，日本股票市场和房地产的泡沫破灭，从此日本的经济陷入不能自拔的长期危机，直到今天危机尚未終了，日本的资本家也进一步将生产移向国外。在本世纪初，次级房贷危机引起的全世界经济萧条后，日本的各大公司再也无法维持工人的终身职，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在这些年中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动，企业与工人本是一家人的神话从此破灭。当日本公司移到北美生产，就更难维持这样企业和工人本是一家人的神话了。

资本主义的任何工厂管理都不可能解决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在网上看到崔之元的一篇旧文《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在这篇文章中，崔之元是为《鞍钢宪法》辩护的。他反驳汪丁丁的看法，汪丁丁认为中国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再搞“后福特主义”生产。崔之元在文章中说明，福特式的生产太过于僵化，并且以垂直命令来实现厂内分工的办法已经过时了，已经被“后福特主义”的“丰田生产方式”取代了，他还说，“丰田生产方式”不再是用从上到下的垂直命令，而是注重“团队合作”。他认为“团队合作”

里有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因此就是《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于是经过这位教授的几次等同之后，《鞍钢宪法》就变成了“后福特主义”中的丰田制的生产方式。

上面已经说明了丰田制的生产管理，并不是与福特式完全不同的管理。近年来，“丰田式生产方式”之所以得到资本主义管理学者的赞赏，主要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在降低成本方面，除了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之外，就是使用零库存的方法，来降低了资金的占用。另外，这种生产方式对多样的产品和不稳定的市场销售量有较灵活应变的能力。许多西方的管理学认为，从成本和质量上的考虑，这种生产方式与福特制相比有它的优越性，也是日本汽车公司能够战胜美国汽车公司的主要原因。

崔之元所犯的错误在于他认为，《鞍钢宪法》仅仅是一种工厂管理制度，而这种工厂管理制度既可以适合于社会主义也可以适合于资本主义，他不去分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的企业中，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要获得更高利润就只有增加企业的收入和减少企业的成本这两条路。在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的今天，增加收入不容易，所以减少成本就更加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比起福特制来，丰田制里是分秒必争。崔教授的文章中还提到瑞典的 Volvo 汽车公司的创新，这家公司的两个工厂在劳动程序上作了相当根本的改革，特别考虑到如何便利工人工作，来减少工人的压力，他们取消了流水线式的生产，并给工人很大的自主权，工人对这样的改革非常满意。这是唯一的一家汽车公司在它的两个工厂内能做到的，但是这家公司的两厂已经相继在 1989 年和 1994 年关闭了。

在资本主义的企业内，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可能做到工人把工厂当成是自己的。资本家为了谋求利润而生产，向劳动者购买劳动力，工人在工厂中给资本家工作 8 小时或是 10 小时，就是把这 8 小时或 10 小时卖给资本家了。资本家从工人的手、脑、腿、脚中所要的，是最大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要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创造最大的价值，但要工人领取最小的报酬（工资加福利）。不管是福特制还是丰田制，代表资本的管理阶级都必须用各种办法，从工人体力和脑子上挤出最大的剩余价值。如果做不到这点，就不可能被资本主义管理学所称赞。这就是丰田制的“瘦身管理”在资本主义国家会红得发紫的根本原因，崔之元教授这位管理学专家应该了解到这一点。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是劳资对立的国家，有代表资本利益的赞美也必然就有代表劳工利益的批评。本文就是从工人立场上对福特制和福特后丰田制的批判。

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要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还得从所有制谈起。目前有不少对体制改革的批评是不正确的，一般是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角度出发，有些人用“国退民进”来说明社会上许多矛盾的起因。当然，我们理解从这个角度来批评体制改革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在体制改革进程中，工人们所遭受的苦难大部份是由于私有化造成的。人们都看到了，当企业属于老板私人所有时，企业主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就不惜一切手段来压榨工人。但是

国有制并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只用国有还是私有来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正确的，因为国有制也可能是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个别企业不是一个单独的核算单位。个别企业生产所需的材料、能源、厂房、机器设备等都在国家的经济计划中统筹办理。国家根据当时和将来在经济发展上的需要来决定要优先生产什么、各种产品的数量、品种来制定五年计划。在实行经济计划的五年中，有时要作一些调整。经济计划可以将有限的资金、生产材料以及所需劳动力等作合理的安排。

在资本主义改革之前，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生产资料的价格和产品的价格都不由价值决定，也就是说价格不反映价值。企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and 需要支付的工人工资（包括各种福利）全部由国家提供。全国各地企业的工人都一律享有八级工资，和应得的健康保险、住房、子女教育、食物补贴等各种福利。少许工资上的差异只是根据各地生活费用差异所作的调整，工人的工资基金由国家直接拨发。

因为价格并不反映价值，所以个别企业账目上的利润多少和有无亏损并不反映企业经营得好或是不好，也不决定一个企业应该扩张还是缩减，甚至关闭。企业的扩张或缩减是根据计划，不是根据一个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举例来说，当时国家为了促进农业机械化，就在计划中将农机的价格定得很低，这样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才能买得起农机，因此生产农机的企业在帐面上是亏损的；另外，当时因为物资缺乏，在社会主义计划下，有限的物资必须优先用来保证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不鼓励人们在基本生活之上的消费。所以一些不是完全必要的消费品的价格就定得较高，比如一只手表可能要卖一百元人民币，以当时的工资来说，这个价格是很高的。把手表价格定得高，是因为在当年国家物质条件下，不鼓励每个人都要有手表，不像今天手表价格低到有些人有好几只手表。因为手表价格高，生产手表的企业在账目上会呈现出很高的利润。但是，生产农机的企业不会因为“亏损”而减产或倒闭，生产手表的企业也不会因为“利润”高而扩张。亏损由国家补上，赚钱则将利润上缴国家。

一国企业经营的好坏，有效率或无效率是不能以企业是否赚钱来衡量的。评估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是否有效率，是以多、快、好、省为标准的。而且每个企业都用它过去的纪录作基础，再进一步努力，继续创历史新高。虽然不能说每一个社会主义企业都经营得非常有效率，但是至少大多数企业的效率是很高的，一些落后的企业也在努力追赶先进的企业。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因此，工人生活上的各种需要，包括吃饭、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都是作为生产目的而得到保障，工资和福利都由国家直接拨发，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保障，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中的重要一项。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富有，也无法保障充分就业，因此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得到工作保障和免于失业的安全感。在本世纪初（2008 年）的经济危机中，美国有许多工作了几十年的工人、工程师，甚至许多管理阶层的人都被解雇。按照官方统计，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 3 年中，美国失业的人数增加了 800 多万人，并且在失业人中，有 40% 的人已经失业了 6 个月以上。事实上，实际的失业人口要比官方的统计高出很多。从 80 年代初美国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来，劳动生产效率不断地提高，资本的利润猛升，但是工人的实际工资停留在原地不动，甚至下降。与此同时，许多大公司除了将生产移向国外，还开始用大量的临时合同工来取代以前的正规工人，许多大公司将工作大量外包，以求降低成本。承包商也多半雇用不必付福利的临时工。临时工在工作忙时拚命加班，公司的生意淡下来时，就几个月失业。这些年来，工人阶级只好用加班、做两份工和借债来维持生活水平不下降。其实，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的绝对贫困化”的贫穷化。在这次经济危机的 3 年间，大批的失业工人到了不能维持生活的地步，他们曾在大量广告的宣传下，靠借钱来消费，失业后无法应付大笔的债务，连房屋贷款都无法支付，房子被银行收走拍卖，一家大小无家可归，许多人每天只能靠一顿救济午餐来维持，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面对着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基本矛盾。资本要增值，就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取得利润，因此资本家必须购买劳动力。利润是靠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获取的，就是劳动者所创造的总价值减去要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那部分（即此时劳动者必需的生活资料），这就是资本家要付出的工资和福利。要增加剩余价值，一方面必须增加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像进一步自动化、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等；另一方面就是要降低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工厂管理者的做法必然和工人的利益相反。所以，虽然资本主义有一大堆企业管理的理论，资本主义大学里的商学院有专门设立的管理学系，每年都要制造出许多管理学的硕士来，但是这些管理论述总是不出如何从工人身上压榨出更多剩余价值的范畴。企业老板和他们雇的经理还请了心理学家来协助他们，心理学家们也有不少企业管理的论述，他们的主要贡献就是利用他们对人心理的研究，想出一套办法可以使工人高高兴兴地接受剥削，而不起反抗。但是要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更少的福利、更长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工作强度，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可能达到这些目标，那就是工人不得不依靠这份工作才行。因此，必须有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只有在失业率高，工人找工作难时，工人才会忍气吞声地按照资本家的要求去劳动。即使这样，也无法保证他们不反抗。

要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不能只靠个别的资本家和经理，它需要一个适合于资本积累的经济和社会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就是要靠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来创造和维持。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一方面企图调和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还要调和资产阶级内部彼此之间的矛盾。为了便利资本的积累，国家的任务也包括修桥梁、建公路和铁路、建海港和机场，改进交通和通讯系统。资产阶级国家更需要设计一个金融和信用管理体系，还需要一种适合资本主义运转的教育制度。要维持一个适合资本积累的大环境，就必须有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器来镇压工人的反抗、维护资本

主义的秩序，还要一套适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制度，即保证能再生产出具有知识、技能而又驯服顺从的劳动力的机制。所以，要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就需要建立一套庞大的国家机器体系。

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工业快速发展，美国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允许产业工人组织工会（除了由技术工人的小型行会组织外）。当时许多产业工人开始组织起来进行非法罢工。特别是到了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产业工人组织工会已经达到空前的热潮，发展到资产阶级国家无法镇压的地步。资产阶级逐渐认识到，如果允许工人组织工会，反而有可能比较容易控制工人的行动。工会可以将工人的行动正规化，可以明文规定只有在与资本家谈判达不到协议时才准许罢工，这样将不会彻底搅乱、破坏生产，反而有助于资本家维持生产的秩序，有利于资本积累。因此美国等资产阶级国家就通过法律将组织工会合法化。社会上很多的改变都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先斗争，斗争胜利了，原本不合法的行动就变成合法了。但是在美国的产业工人工会成立后，政府就千方百计地控制工会，把领导组织工会的积极分子，像美国共产党党员赶出工会，使工会一步步失去了左派的领导，工会头子代表工人与资本家妥协，争取经济利益，这些工会头子依附在民主党下，享有各种权力和利益。工人阶级可以过得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失去了斗争的能力。

二战后的五十年代，经济发展得很快，失业率低，就在各工会为会员争取到较高的工资增长，和在福利方面的改善时，美国国会就赶紧通过了对工会不利的法律。各大公司像福特、通用汽车公司、各大钢铁公司等都加紧进一步自动化来取代工人，使得工会会员不断减少。到了七十年代，一方面大企业用提高产品售价的方法把高工资的负担转嫁给消费者，另一方面因为美国侵略越南战争带来的政府预算和国际收支的赤字，使得美国的物价上涨失控。这样的发展无利于资本积累，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初，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带头重新整顿世界资本主义的秩序，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由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来为美欧垄断资本打头阵，利用由它们所控制的世界金融、贸易组织，来迫使全世界国家放松或取消对资本的管制，使资本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按照它的意愿自由流动。美国的资本家便可以加速把生产迁移到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从墨西哥、南韩、台湾到中国大陆。这时美国的各大公司都不再去理会工会的要求了，他们随时以把工厂迁移到别的国家作为要挟，来迫使工会让步。在资本帝国主义全球化下，全世界没有工作的人都成了美、欧、日资本的产业后备军。与此同时，美国的工人阶级逐渐进入了绝对贫穷的困境。

三、1960年毛主席宣布《鞍钢宪法》诞生的划时代意义

正如许多在社会主义工厂中工作过的工人和干部认识到的，《鞍钢宪法》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当是由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国家。而工人阶级要真正当家作主，他们不但要在企业、工厂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还必须能够管理国家大事，包括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在内政方面，工人阶级应当管理经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通讯、金融、贸易、国家及地方的预算等等）、军事、社会各项事宜，以及文化、教育等等。在外交

上，工人阶级也应当拥有独立自主权和主动管理权。工人阶级要管理那么多、那么复杂的事，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做到。因此，在短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事，很大部分只能由工人阶级的代理人来运作，那就是共产党。我们说，短期内无法完全做到，并不是说永远都不能做到。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后，必须立即开始朝着工人阶级全面当家作主的方向进行努力。工人阶级可以首先在他们的工作所在地，即工人们所在的工厂里当家作主，开始处理各种重要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合理的。《鞍钢宪法》就是给工人首先在厂内当家作主提供了若干关键性的具体步骤。

为什么“两参”那么重要？“两参”是干部参加劳动和工人参加工厂管理。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工厂能够更有效率地运转，更重要的是为了逐步取消干部与工人之间的界限。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管理阶层与工人之间始终有一道鸿沟。其根本原因是：管理阶层是代表资方的利益，而资方的利益是与工人的利益相对立的。就像前面讲的泰勒经验，当泰勒一旦升为工头，他就对他的工友说，从此他必须站在资方的立场来管制工友。在更现代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管理阶级分成好多层次，有关厂里的各种事情的决定权在哪个阶层手里，都有很明确的规定。而且不同的管理阶层的职位，都要求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和一定的学历。因此管理阶级一般都是有权的，他们所掌握的权力的大小，决定于他们的阶层的高低。管理者意味着他们有学问、有知识。虽然在工厂的实际工作中，他们不见得比工人懂得多，可是普通工人是被看成无权、无学问和无知识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管理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永远都存在着不可打破的界限。从最初开始，任何一个美国的工业城市，都必然存在着工人住的社区与经理们住的社区之分别（高层管理者与低层管理者，又有居住社区上的分别）。尽管在“瘦身管理”的小组运作中，用了各种方法要淡化管理阶级与工人之间的区别，并加重“团队精神”，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管理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那道鸿沟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有着这道鸿沟又如何“团队”得起来？因为这道鸿沟正代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工厂中的干部对待工人已经不再像解放前工厂内工头对付工人那样，可以说已有天壤之别。但是干部与工人在职位上的分工还是继续存在的。干部（管理者）与工人（被管理者）之间的区别仍然是存在的，如果不去改变它，这种区别就会固定下来。而且，如果工人阶级在他们的工作所在地都不能当家作主，不能管理工厂的各项事务，那他们怎么能够掌管国家事务呢？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掌管国家事务，那他们怎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呢？因此，《鞍钢宪法》中的“两参”确实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与“两参”连在一起来看“一改”，就不难理解“一改”的重要意义了。“一改”就是改革工厂内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任何大型工厂的运转都需要有规章制度，但是在资本主义工厂里的一套严厉的规章制度，主要是用来对付工人的。在早期福特的工厂中，工头对工人可以随意指使，工头的话就是制度。到了工会成立后，工人的处境改善了不少，工厂与工会所订的合同中，将工厂内的规章制度一条一条地列出来，并且明文规定：如果工人违反这些规章制度，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如果工头错待了工人，工人有权向工会提出诉冤，

工会和厂方代表再想办法解决这些诉冤。因此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套严厉的、主要是针对工人的规章制度，资本主义工厂如何可以运转起来。

当然，为了确保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工厂、员工的安全，在社会主义的工厂企业里也必须要有规章制度，只是必须改革或取消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尤其是必须改革只针对工人的、束缚工人们当家作主的监管制度。资本主义企业的那套规章制度，是用来强迫工人顺从私人老板、为私人老板卖命的苛刻法规。这样严格的法规在中国资本主义改革后的新工厂中充份地在执行中。在社会主义企业里纪律不应该是由于外部强加于工人的，而是工人自觉地遵守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须的规章制度。《鞍钢宪法》的实质，就是要工人们当家作主，使工人们意识到，所有社会主义工厂企业，都不再是资本家用来牟取利润的手段，而是成为给所有的工人们提供生活和福利的基础。《鞍钢宪法》从而激发工人内在的生产、革新的主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自觉地遵守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们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像孟泰、王崇伦、王进喜、郝建秀等劳动英模一样地发挥出来，从而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是《鞍钢宪法》的本质，而是《鞍钢宪法》得到实行后所必然产生的结果。

“三结合”是在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上，由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一起合作来推进。这一点与前两点同样是对工业企业的社会主义创新。在较早的资本主义工厂中，生产必须依靠技术工人。在产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工人们在技术研发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他们还组织自己的数学研究协会，可以说那时还没有工程师与工人之间的分工。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之后，在福特制的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下，资方刻意把工人手中的生产技术夺走。因此，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大企业里，工人不参与任何有关技术的改革。任何的技术改革都完全操纵在企业主及其管理阶层的手里，比如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设立的技术研发中心都在远离工厂的地方。泰勒主义就是故意把生产分隔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部分，由资方完全控制脑力劳动部分。泰勒认为，这样工人就会像一个木偶一样，完全听从资方的支配。但是作为人，就是不要被当作木偶，决不甘心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泰勒主义从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是要逐步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废除由脑力劳动者来指挥、控制体力劳动者的压迫制度。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截然分开的社会，就会变成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黑暗社会。

“三结合”的技术研发，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以促进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从表面看，好像所有的科学技术都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从本质上看却正好相反，所有的技术都打下了阶级的烙印，如福特研究的流水线操作技术就是专门为了对付工人的。要求工人参与技术的研究，就是要剔除那种专门对付工人的技术。此外，“三结合”还有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要逐步消除工厂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在工厂内如此，在社会中也是如此。一个理想的社会，必然是要求能够促使人全面发展的、具有最大潜力的社会，必然要求使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一个理想的社会，决不容许一批专门用脑力的人来策划、指使、压迫被他们认为没有脑子的、愚蠢的人。

很显然，《鞍钢宪法》的实施，必然会遭受持有资产阶级偏见的人们的强烈抵制和反抗。因此，《鞍钢宪法》首先要求社会主义企业的工人和干部，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坚持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鞍钢宪法》才有可能得到推行；也只有遵照《鞍钢宪法》的要求，不断改革企业里的不合理规章制度，逐渐取消生产指挥者与生产劳动者之间的区分，《鞍钢宪法》才能够得到切实的推行。《鞍钢宪法》是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毛主席领导的所有社会主义改革都是创新的，都是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尝试过的，《鞍钢宪法》也不例外，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任何国家的工厂做过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尝试。因此，《鞍钢宪法》和其它社会主义革命一样，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目前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严重的、并且将会持续很久的危机。这次危机不仅是经济上的，在美、欧、日国家内也正在经历着政治的和社会的危机。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大国借“全球化”之名，加强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将它们的危机加速地转嫁给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这 40 年中，落后国家的人民受尽了一次次危机的袭击和历次危机带来的苦难。落后国家的广大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他们的苦难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统治阶级的压迫。他们看到中国革命成功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世界将会经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决战，在这个决战过程中，落后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主要力量。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包括《鞍钢宪法》在内，都是革命者珍贵的宝藏，都将再度大放光辉。

附录二：晚期帝国主义

1917年，列宁所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出版，至今已经103年之久。在这100年中，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二次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在多年的战斗后，脱离了殖民统治，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独立之后，这些国家却又发现它们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治上，或是经济上的独立。老式的殖民主义在历史上消失，但是却摇身一变，出现了新式的殖民主义。直到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在旧殖民时代人民所受到的各种痛苦和剥削，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

列宁在俄罗斯十月革命前夕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分析了，帝国主义是从垄断金融资本取得统治地位时开始，发生了质的改变。因此，列宁是继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开创性的著作后，为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理解，作出了重大贡献。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证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国家，受奴役的人民，确实能够解放自己，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从而获得经济和政治的独立及社会的发展。这两个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证明了革命理论以及由革命理论衍生出正确的革命策略的重要。

当列宁在103年前，写到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说明了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它的最高的、最成熟阶段，也就是帝国主义。虽然，在100年前，资本主义就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但是世界上的事物总是会不停的改变，我们是否可以说，在过去这100年中，已经达到成熟的资本主义仍然不断地在发展？发展到更成熟，甚至达到了衰败？因此，虽然今天的帝国主义跟列宁时代相比在本质上没有改变，但是却更成熟了、更衰败了。这样来看，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之后，是否可以分成不同的“期”，像前期、中期和晚期？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说今天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的晚期？这个晚期应该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今天已经有40年的时光，也就是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40年。是否能够这样分，我们可以仔细研究，但是我们应该可以同意在不同的“期”里，资本主义的本质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帝国主义有了新的形式和新的策略，原因是帝国主义在长期的发展中，资本积累不断地发生困难，在困难中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不断地策划出新的资本积累的策略。把帝国主义分成不同的“期”来讨论，完全没有意思要否定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只是要说明列宁之后的这100年中，帝国主义仍然不断地继续发展，不断地更成熟和进一步走向衰败。帝国主义在不断地成熟和衰败的过程中，垄断资本不断增添征服世界的新策略，所以虽然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帝国主义与过去相比较，有了新的内容。我认为了解这些新的内容，会帮助我们反对晚期帝国主义找出新的对策。

七十年代的后半，资本主义陷入了自三十年代经济大恐慌之后最严重的危机，这时世界性的资本积累发生问题。可以说七十年代时，晚期资本主义开始，到了八十年代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它们国家垄断资本扩张的政策，其

中包括我们熟悉的“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一套政策的背后策略是由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协助它们的垄断资本在世界各地扩张。40年来新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证明了这一套策略对垄断资本极为有利，但是同时却给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自八十年代以来，从短期来看，暂时延缓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但是到了21世纪初的2008年，大规模触及全世界的危机发生了。那次的危机几乎搞垮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我认为过去的40年直到现在应该是属于帝国主义的晚期。那么在这40年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有些什么变化？有些什么新的特征？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出版后，许多前殖民地争取并赢得独立，独立之后，它们才发现事实上，并没有获得政治或经济的自主权，来发展可以满足人民需要的经济。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不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交战，二战结束后，所有的战争，从韩战、越战还有美国一系列或公开的，或隐蔽的，对其它国家的军事侵略和政治与经济的干涉，以及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武力入侵后持续将近20年的统治，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暴行。更过分的是，二战后许多取得独立的国家，依然内战不断，原因多半是在过去的殖民时代所造成的许多阶级和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当前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根据本身的利益，对它们不断地干涉所导致。战乱与灾荒使得世界各地大量的人口无法过安定的生活，他们远离家乡，创造了近代史上最巨大的难民危机。

1976年，我们目睹了中国转向资本主义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一步步被整合进世界资本主义的体制内。1991年，苏联在35年的修正主义之后，全盘瓦解，东欧国家经济相继破产。其它发展中国家，即使老的殖民结构逐渐消逝，但是人民遭受的痛苦和剥削，仍旧持续不断，甚至更为强烈。过去一百年，资本主义不断经历了更大规模和更深刻的危机。

当我们研究晚期帝国主义，焦点应该置于何处？怎样的探讨可以有助于我们了解晚期帝国主义与世界各国人民在过去40年的处境，和今后世界人民策划反抗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吗？中国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的对抗，会如何展现呢？我们是否应该将主要的关切放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的对抗关系中？

即便中国与其它帝国主义间的关系是个重要的论题，我却不认为是今天我们讨论帝国主义的重心，也不是本文的焦点，本文主要关心的是要了解晚期帝国主义的发展，因为正确理解目前的帝国主义，才能使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分析出对抗帝国主义的策略。设定正确的反帝途径和策略，才能将帝国主义消灭。

争取世界人民的自由和解放是研究帝国主义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有关帝国主义的分析一定不能限于帝国与帝国之间的关系，或者只限于帝国和发展落后国家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推翻帝国主义使得世界人民得到解放，可以过着免受剥削、免受压迫的生活，那么，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每个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时，就主张要对中国的阶级作出清晰的分析，得出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最主要的力量来自哪里，也要分析出在这场反帝的斗争中，谁是人民的朋友？谁是人民的敌人？

进一步了解晚期帝国主义，我们需要了解晚期帝国主义跟前期或中期的帝国主义有哪些显著的不同，这篇附录就是要将晚期帝国主义这些显著的特点，分成几点来说明：

晚期帝国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垄断跨国资本扩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七十年代中期后，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率下降，资本积累停滞，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变得更为明显。1980年，美国总统雷根和英国首相柴契尔为了挽救资本，合力促成各大帝国之间的合作，以便使资本可以顺利向全世界扩张，藉此来缓解资本积累的危机，这就是现今恶名昭彰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国家执行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全球化、自由化（liberalization，或取消管制 de-regulation）和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政治政策，这一系列政策就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协助世界垄断资本对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施加压力来迫使这些国家消除一切对资本的限制。战后初年，许多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因为寄望于发展更为独立的经济，抗拒外来资本和其它经济势力的侵入，实行了一些抵制外来的经济压力的政策，其中包括，限制外来投资、外来贷款，和另外一些保护它们自己国家资本的政策，其中包括将本国的一些重要产业（像交通运输、通讯、能源等企业）国有化，以便抵制外资收买。到了帝国主义晚期，国际垄断资本在帝国的保护下，来势凶猛（到了八十年代初，这些国家受了它们所欠的外债压力，下面会加以说明）它们无法继续抗拒国际垄断资本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晚期帝国主义时代，取消管制给跨国垄断资本更多的自由，像取消对资本跨国界投资的管制，取消要求跨国资本保护劳工的条例，放宽对资本要求保护环境的措施等等，因此，到了帝国主义的晚期，垄断资本可以随意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垄断资本扩张和渗透的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今天世界的垄断资本不但有权决定什么东西在哪里生产，而且这些跨国公司策划了一个复杂的彼此互相关联的系统来将生产细分成很多步骤，把每一个步骤设置在生产成本最低的产地，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国家。这样的分工就把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落后国家。

为了争取跨国的投资，落后国家之间彼此竞争，给投资者提供最优惠的条件。这些国家的政府尽量提高工人的教育和技能训练以便增加工人的生产效率，它们也尽量作基础建设的投资以便降低运输成本，互相竞争以便给外来资本提供税收上的优待和放宽环境污染的管制。除此之外，这些政府还严格限制工人组织工会，以便能够压低工资。所有这些政策都为了争取更多的外来投资。

二次大战后，五十年代开始的“绿色革命”最初只是在墨西哥和印度作初步的实验，但此后由帝国主义国家所主导的“绿色革命”导致人类几千年来食物的生产与交换传统的最后终结。“绿色革命”就是将农业生产工业化。到了八十年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型农业企

业的垄断资本，把新的农业生产方式，一步步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扩张到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国家。在这个扩张的过程中，世界的大型农业企业公司（Agri-businesses）一步步控制了全世界农业的生产，这些大型农业企业公司，一方面控制了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资料（包括种子，化肥，杀虫剂，除莠剂，饲养动物的饲料，农耕机器等），另一方面，它们控制了世界重要谷类的交易，把食物的生产大规模商品化。更有甚者，大型食品饮料垄断公司（包括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雀巢食品公司等等）改变了长久以来，人类的饮食习惯，这些公司在全世界强力推销它们的各种加工食品（processed food）和饮料，这些食品中有各种对人健康有害的成份，像过多的糖、盐、脂肪、防腐剂及人工染色剂等等，引起人的各种新疾病，像过份肥胖症、高血脂和糖尿病等，在一些发展中的贫穷国家，像墨西哥，连许多未成年的儿童都患上了糖尿病。这里介绍并且非常推荐一部纽约时报推出的短片，这影片说明雀巢这个大型食品公司如何深入巴西的穷乡僻壤来推销它的加工食品。²³

二次大战结束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总合起来是谷类的净进口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国家是谷类的净出口国。但是到了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粮食上已经无法自给自足，必须依靠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用“美援”的方法来解决它自己的农业生产过剩问题。美国用它“剩余”的小麦作为对贫穷国家的“援助”，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56年到1979年韩国接受了8亿美元的“美援”，其中以小麦为主，这样的“美援”导致韩国的小麦种植面积从四十年代的58万英亩，下降到1968年的不到4万英亩。韩国农民本来生产足够自己人民吃的小麦，但是今天韩国的小麦生产可以说全军覆没。另外，有许多从来不吃面粉的国家的人民，因为“美援”的小麦，都从吃米和吃杂粮改变成吃面粉，“美援”停止后，这些国家就变成了美国小麦出口的最好顾客。²⁴而今天世界小麦的价格与一些其它粮食相比，超过一倍。美国除了用“美援”来解决它的粮食生产过剩问题之外，八十年代之后，美国更为解决它的粮食过剩问题，用各种压力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和各种的“自由贸易协定”来强迫别的国家进口它的粮食，特别是对与美国贸易在制造业上出超的国家（或地区，像韩国、台湾和今天的大陆）施加压力，强力迫使它们进口美国的小麦和其它粮食。

在帝国主义晚期的今天，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农业生产经历了质的改变，导致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进一步依赖农业生产资料的进口。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的农民即使拥有一小块土地，也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让家人吃饱肚子。因为农业生产的改变，农民如果没有足够的现金，就无法购买他们种植所需的种子和肥料。另外，因为贸易的自由化，落后国家被强迫降低粮食进口关税，并且被迫降低或取消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补贴，落后国家的

²³ 美国纽约时报影片：How Big Business Got Brazil hooked on Junk Food,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7/09/16/health/brazil-obesity-nestle.html>

²⁴ 二战后美国对落后国家的“援助”是用它为了支持小麦的价格而收买和囤积起来的小麦，运到“受援”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市场廉价销售，把销售所收到的当地货币作为“美援”给当地政府。这样一步步使得本来不吃面粉国家的人民改变了他们的消费习惯。之后，这些国家就成了向美国进口小麦的顾客。见：Harriet Friedman, “Distance and Durability: Shaky Foundations of the World Food Economy”, *The Global Restructuring of Agro-Food System*, Philip McMichael, editor, Chapter 11, 259-262,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小农不但无法与廉价的进口粮食在市场上竞争，就连种点粮食给自己吃都不可能。几千年来，墨西哥生产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玉米，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就被美国透过政府补贴的进口玉米顶替而绝种了。²⁵很多小农不得不离开土地，到城市的贫民区勉强挣一口饭吃，也有很多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的农民不得不为了生存，冒着生命危险，移民到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以最低的价格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他们忍受着各种欺辱，以便能够靠出卖劳力，挣一点钱回去养活他们的亲人。落后国家农业的破产给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就跟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廉价进口劳动密集的产品一样，为垄断资本进一步压低工资，增加资本积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些年来，韩国农民的艰苦在 2003 年世界贸易组织在坎昆（Cancun）开会时，暴露于世，开会时韩国代表 Lee Kyung Hae 当众刺胸自杀。Lee 是一个农民，也曾经是韩国国会的议员。他在自杀前发给大家一份报告，报告中说，“在不受管制的大型跨国企业和少数《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的主导下，《世界贸易组织》执行一套对人非常不利的全球化政策。这套政策缺少人性，摧残自然环境，而且没有民主。”²⁶ 韩国的反帝运动和菲律宾一样，他们的反帝运动是和反官僚、反腐败和反专制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很有力量。2005 年，《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香港开会时，各个国家都有反《世界贸易组织》的人参加游行，韩国的抗议游行队伍，每走几步，就跪下来，然后站起来继续向前走，他们所表示的诚心很是感人。

晚期帝国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垄断资本与知识产权的保护

到了晚期帝国主义，有一件极不公平的事，那就是一方面国际垄断资本要求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取消一切对（外来和本地）资本的管制，但同时，同样的国家机器却必须允许国际垄断资本加紧它对所有财产权的保护，其中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资本大幅加强了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虽然早在 19 世纪，资本就设立了对它所发明的技术的专利权，1883 年，11 个国家在巴黎签订了有关设立专利权保护程序的协议，这个协定规定，每个国家有权设定它授予专利的条件，但是任何国家都不能要求别的国家遵守它的专利权。如果两个国家同意，它们可以达成协议来彼此保护对方的专利权。因此这样的协定并不强制别的国家遵守另外一国的专利权。²⁷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对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定发生很大的变化。1967 年，国际知识产权组织（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成立，到 2013 年时，有 175 个国家参加。但是美国一直不认为这个机构对保护知识产权有足够的强制执行能力，美国主张将知识产权的保护移到国际贸易组织内，这样美国就可以通过贸易的制裁，强迫别的国家尊重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在此之后，其它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同意，1989 年时，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与贸易相关的

²⁵ NAFTA +US Farm Subsidies Devastated Mexican Agricultu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4KRd7Qjyys>。也请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_XHbnqQ0

²⁶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3099568.stm>

²⁷ 经济学人，2002 年 9 月 14 日，75-76

知识产权”被移到《关税贸易总协定》中，当《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就变成《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部份。从此，世界垄断资本靠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协助，用它作为征服世界的武器。

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在美国经过了非常大的变化。1980年，通用电力公司（General Electric, GE）的一个研究员发现了一种可以吃石油的微生物，这个微生物给了GE带来未来赚钱的潜力，因为如果有一天载运石油的船发生意外，把石油流散到海洋中，这种吃石油的微生物就可帮助清理。因此，GE就去美国授予专利权的机构（US Patent Office）申请专利，但是GE的申请被否决了，原因是到那时为止，美国的专利只能授予“发明”（invention），但是这个微生物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发现”（discovery）。GE被否决之后，它就把授予专利权的机构告到法院，这场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后GE获胜。GE的例子对美国授予专利权产生了极大的改变，一个是GE获得专利权不是因为发明了什么东西，而是发现了这个微生物，另一个改变是活的、有生命的东西也可以申请到专利，成为私有财产。继GE的微生物获得专利后，哈佛大学肿瘤研究者发现了一种特别的老鼠，这种老鼠有特别的基因，使得它对治疗肿瘤的药物与其它的老鼠有不同的反应。有GE获得微生物专利权的前例，哈佛也就获取到这种老鼠的专利权，此后，任何使用“哈佛老鼠”作治疗肿瘤的研究实验的人或是机构，都得付专利费给哈佛大学。从此之后，不但是有生命的动物或植物可以经由获得专利变为私有财产，而且，跨国垄断公司使用高科技，将有生命的植物和动物作基因改造，也可以把改造基因后的植物和动物用专利权变为私人财产。这样有关专利权的发展，就成了《世界贸易组织》制定“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的基础。

垄断资本利用写在“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的条列来窃取属于公众所有的东西变为私有，用来作为牟利的商品。一个例子就是大型食品公司把几千年来世界各地农民培育出来的种子稍加基因改造，就变成属于它们私有的基改种子。也就是说垄断资本窃取劳动人民长久所积累下来的耕耘知识，把他们培育出来的优良种子据为己有。譬如，上世纪末，孟山都把玉米的种子基因改造成可以抵抗它自己制造的除莠剂（商业名为 Roundup），Roundup的主要化学成份是对人身体极为有害的草甘膦。孟山都把转基因的种子从玉米，扩展到大豆、棉花、油菜籽油、洋芋、木瓜等。孟山都先把改造过基因的种子在美国推广，再销售到其它农业生产的大国，包括巴西、阿根廷、中国和印度。²⁸ 孟山都最早是个生产化学药品的公司，越南战争时，美国政府向它购买了销毁树林和其它植物的橙剂（Agent Orange），美国用飞机把橙剂撒满在战地上，将植物杀死使得解放士兵没有可以躲避的地方。直到今天越南的许多土地还是极度的污染，无法种植任何谷物。在越南为美国打仗的许多士兵也因中了橙剂中的二恶英或称戴欧辛（dioxins）的毒引生疾病。这些退役军人联合起来向七家生产橙剂的化学药品公司起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孟山都。1984年这七家些公司总共赔

²⁸孟山都几乎控制了所有的转基因种子。世界上转基因种子的播种面积从1996年的1.7百万公顷增加到2015年的179.7百万公顷。2015年时，世界上有28个国家使用转基因种子，占全世界耕种面积的10%。以农作物用转基因种子的作物来说，土地面积来说，世界的83%的大豆，29%的玉米，75%的棉花都已经是用转基因的种子。资料来源：Royalsociety.org。也请见食物安全报告：

款 1 亿 8 千万美元。孟山都这些年来在法庭上不停的对农民兴讼，它控告农民保留了转基因种子种出来下一代的种子。孟山都也被许多因使用 Roundup 除莠剂中毒的人控告。2008 年德国公司贝尔（Bayer）收买了孟山都，贝尔是个名誉不错的有 156 年历史的老公司，在和孟山都合并后，概括承受了孟山都极多的被告案件。²⁹

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中最有名的就是将原来的玉米和大豆的种子经过基因改造后，种植出来的玉米和大豆不怕孟山都的除莠剂（Round Up），因此在种植的过程中可以大量使用 Round Up 杀死杂草，省去清除杂草的很多人工。这样虽然孟山都一方面可以出售转基因种子，但是长期用大量的除莠剂后，杂草产生抵抗力，变得又粗又大，更难处理。另一方面 Round Up 的毒性很厉害，对耕种的农民造成身体上的伤害，近年来因 Round Up 中毒向孟山都提告的案子非常多。另外，还有一种棉花的转基因种子叫 Bt 棉花，这种棉花种子可以杀死一种吃棉花叶子的肉虫，因此，可以减少用除莠剂。最初在印度使用这个转基因的种子，后来在中国也用，根据 2006 年的一个报告，中国棉花农民在用了这个种子 7 年之后，发现它虽然对防止肉虫有用但是对其它害虫却没有用，因此还是得喷洒杀虫剂增加了农民的成本。³⁰

大型跨国农业企业除了靠《知识产权》来保护它们的转基因种子外，一些出售农业机械的企业，也靠《知识产权》来控制它们的农业机械。现今农民花很多钱买一部农机，但是这些大公司却控制着操纵农机的软体，过去如果农机发生故障，农民可以自己修理，或是找会修理农机的人帮忙，但是今天这些农民却失去修理农机的权，农机坏了，出售农机的公司不给农民软体，农民就不能自己修理，得又花很多钱找专门代理公司来修理。美国的农民争取他们有修理他们的农机权已经有 10 年的历史，原因就是垄断农机公司，不给买农机的农人修理农机必须要用的软件。就像今天的修理汽车一样，没有软件就无法修理。今年三月就有一位农民向农机公司约翰迪尔（John Deere）提告的事件，这位农民花了 80 万元买了一部 John Deere 的农机，但是农机坏了 John Deere 却不给他修理所需要的软件，如果要修理就得请 John Deere 的代理公司，修理起来又是一大笔开支。看来这一类的官司以后会是没完没了。³¹

孟山都积极地向世界各地推销改基因的种子，很可能导致有一天世界上的农业生产从多种种子的种植，变成单一种子的种植，而这唯一的种子就控制在孟山都的手中。如果真的到那天，世界上的种植只靠孟山都所控制的单一的种子，那时孟山都的权力有多大？而且，当农业种植发生问题时（像发生病虫害），灾害将无法限制在某些地区，而是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农业生产。除了将种子做基因改造，大型药品跨国公司派人到许多国家去收集古传的药材，经过同样程序，变成它们的私有财产。大型跨国公司聘请了知识产权的专家利用它来保护它们的利润，创造出一大批靠“保护”知识产权的高薪律师。事实上，《世

<https://www.centerforfoodsafety.org/files/cfsmonsantovsfarmerreport11305.pdf>

³⁰ 这是 Cornell Chronicle 根据中国科学院研究，2006 年 7 月 25 日所作的报告：Seven-years Glitch : Cornell Warns Chinese Cotton. 这个报告很不清楚，国内的关心认识，应该，取得科学院的材料作进一步调查。

³¹ 请见：Bloomberg Businessweek, 2020 年 3 月 5 日

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条例就是由这些律师写成的。1997年，我参加了在温哥华举行的反帝斗争大会，那次反帝的目标就是针对《世界贸易组织》。我们这个团体在《世界贸易组织》开会前早到两天，反帝活动的组织者告诉我们，一个专门服务于大型企业的律师团正在撰写和修改当时在《世界贸易组织》内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条例，以备在世界贸易组织开会时，把修改过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条例由他们的政府写进《世界贸易组织》中。在这个时代，大型跨国公司非常依赖这些专门研究知识产权法的律师，垄断资本靠他们来撰写、解释和辩护知识产权的各个条例，靠他们代表公司来起诉，来保护公司的超额利润。知识产权的保护，除了农业生产的种子和制药公司的药的发明或改进，更包括高科技电子计算机的运作程序，甚至包括外科手术上一些程序的专有权。

到了晚期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起了质的改变。19世纪时，甚至到了二次世纪大战结束时，美国农业技术的研究主要是由美国政府主导的，那时每个州都有州立大学专门致力于农业技术的研究，它们研究的成果对美国农业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除了农业之外，美国联邦政府也大力支持有关医疗技术的发展，包括疾病的预防和新药品的发明，因为新的医疗技术和药品在研究阶段要花大量的经费，但是研发成功，药品的生产只要用极少的成本就可以大量生产，廉价供给大众。但是所有这些，到了晚期帝国主义都改变了，今天所有的技术，像农业技术、医疗技术、高科技电子技术都完全控制在垄断企业的手中。这些大型企业用颁发研究经费的方法收买了有名大学的研究室，私立或公立的大学都靠着这些经费来买器材和雇请研究人员，那么研究出来的成果就属于某大制药公司、食品公司或其它高科技公司。这些公司就可以通过知识产权来控制它的新技术。目前各大药材公司在竞争两种药的发明，那就是医治癌症的药，和医治老年痴呆症的药，这时哪个公司对这两种病有任何小小的研究成果，它的股票价格就会大涨，如果在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任何挫折，升上去的股票又会大跌。于是就有知道内幕消息的人从中获利，但是这些人又会被控告。大家告来告去，给律师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了取得暴利，各大药厂之间激烈地竞争，一个药厂的研究员绝对不可能把他研究的一点成果，或者失败的经验与别的公司的研究员分享，以便大家一起把技术向前推进。有一本书：“谁控制了我们的未来？”

（英文是 *Owning the Future*），作者是斯德舒曼（Seth Shulman）。³² 根据书中的资料，用货币数额来计算，今天知识产权所控制的财产额已经超过了真实的财产额（像生产工具、土地、矿山等等），而且少数公司对知识产权的垄断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

一方面，跨国垄断资本将原本属于公有的东西据为私家占有，并且用法律进一步加紧控制它所占有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在“取消管制”的政策下，人民失去了保护他们生活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的权力。资本把在生产中所造成的污染物丢到属于大众所有的空气、土地、河川和海洋中，结果是因此所产生的严重污染，造成全球气候的变化，使得世界上很多本来人居住的地方，和他们从事生产的地方变成了荒地、死河和死海。资本为了谋求利润，剥夺了人生活的空间和人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料。

³² *Owning the Future, Inside Battles to Control the New Assets – genes, Software, Databases, and Technological Know-How- that make up the lifeblood of the New Econom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9

晚期帝国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新国际分工

国际垄断资本在对它最有利的条件下，将世界的生产重新分工，也将世界商品的销售重新安排。以谋取最高利润为准则，来决定生产什么和在哪里生产，在哪里销售。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制造业的分工，跨国公司把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像纺织、成衣、制鞋等，以及能源消耗最高和最污染的生产，像粗钢、电子等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移到资本主义发展尚落后的国家。除了制造业的分工，垄断资本也将农业生产按照对它最有利的情况加以分工。虽然在殖民时代，处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殖民地就生产大量的农作物，像蔗糖、咖啡、热带水果（凤梨、芒果、香蕉等）供给殖民者国家中收入较高的家庭消费，但是今天在农业生产上的分工有了质的改变。这样的分工更进一步把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国家的农业产品商品化，剥夺了这些国家的人民用他们的劳动力、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来生产供自己消费的产品的权利。

新的农业生分工开始于七十年代，应该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时美国的农业工人运动。1965年美国农民组织成农业工人工会（United Farm Workers），开始提高了农业工人的工资，于是美国许多需要较多人工的农产品就移到墨西哥生产，结果许多墨西哥生产的蔬菜和水果，墨西哥人自己却吃不到，蔬果的价格因为出口到美国而提高，只有中等收入以上的人才买得起。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和协助下，1973年时，智利的大独裁者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用军事政变夺取了智利民主普选选出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总统的政权。在“全球化”中，皮诺切特赶在最前面，积极参与了农业生产的世界分工，大规模种植专门为出口的水果，在水果种植园中，农业工人因为承受了大量的杀虫剂而生病。另外，智利有很长的海岸线，长久以来，智利人很多都以捕鱼维生，海产也曾经是当地人民食物中蛋白质最主要的来源，有名的猫粮公司普瑞纳（Purina Cat Food Company）在智利设立了分公司，用智利的鱼生产专门为了出口的猫食。另有一家世界知名的法国皇家（Royal Canin）宠物食品公司，这家公司70%的生产都在法国之外，2000年，它在印度设了新厂。在印度这个满布饥饿、营养不良人群的国家，除了拿粮食和肉类制造宠物食品之外，也不断输出黄豆给欧洲国家作动物饲料。另外，巴西的贫穷人家的儿童普遍营养不良，但巴西却是世界最大的黄豆出口国。巴西出口的大豆都是被用作喂牲口的饲料。

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变得愈来愈依赖从更大的粮食生产国进口粮食，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将它们自己的土地、水和其它的自然资源，以及更多的劳动力去生产蜂蜜、鸡、鱼、虾、动物饲料、宠物食品、水果、蔬菜、花生以供出口。全球垄断资本把曾经自给自足的农民、渔夫，变成出口商品的生产者。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结果迫使曾经是积极生产者的数千万，甚至上亿的人民放弃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被迫接受各种出口工作的微薄工资，凭这点工资，他们无法购买自己生产的食物，更不用说其它的生活必需品。贫穷国家丰富的资源，原本是用来生产粮食和人民生活所需的物品，如今却大规模地被转向生产在世界市场上出售的商品。我们可以想象今天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大的食物市场，市场里有

最上等的牛排、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各种精致的甜点、奶酪、坚果等美食，甚至家里摆设的鲜花（哥伦比亚除了出口咖啡外，也出口大量的鲜花），其次就是各种粮食，其中包括饲养鸡、羊、猪、牛的饲料，和喂家里宠物的猫食和狗食。在这个供给极为丰富的食物市场，人可以随便将各种食物放进自己的菜筐子里。但是要能拿着东西出去，必须在门口用现金或信用卡付账。没钱付账的人只可以在市场里转，但是什么也拿不走。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为了生存所需要的基本食物，要和富裕国家的猫、狗、猪、牛竞争。

帝国主义利用经济发展落后国家之间的互相竞争，给垄断资本提供最优厚的条件，这些国家压低了它们国家工人的工资、取消了工人的福利、阻止工人组织工会、政府颁布对环境最宽松的保护条例，以便吸引外来投资和增加出口。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的统治阶级在与国际垄断资本的合作中，获取到优厚的报偿。这一点跟前期的或中期的帝国主义有很大的差别。之前，半殖民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往往被称为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外来强大资本的挤压，得不到发展，因此，他们会对帝国主义有所不满，因此有反帝的可能，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他们可以成为联合统一战线的一部份。但是他们知道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要消灭他们，因此，他们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盟友。在今天晚期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垄断资本给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发展空间和充裕的资本积累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可以成为国际排行榜上的大富豪。这些富豪只会尽他们的所能来维护帝国主义，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可能要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

通过新的世界分工，垄断资本改变了帝国主义国内的阶级关系。垄断资本用它随时可以将生产移到国外作为要挟，迫使发达国家的工人作各种退让。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人面对着随时可能被解雇的威胁，放弃了二次大战后，几十年中，通过工会所争取到的工资增长和福利的增加。因此，从 1980 年开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工人的（实质）工资停止增加，工人曾享有的福利如果不是不断地下降，就是被完全取消。可以说，在二次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经过不断地与资本抗争而得到的“和平相处”的契约，在帝国主义的晚期，资方通过生产外移，把它撕毁了。在资方的压力下，工会同意将工人分成几个梯层，像在汽车厂里，资方不断地压低新雇的工人的工资和减少他们的福利。另外，在一些零售、饮食等服务业工作的人，仅仅能挣到最低工资，而且没有任何福利，就连生病请假也会被扣除工资。这些工人即使每周工作 40 小时，甚至在 40 小时之上再加班，或者同时作两份工作，也难以维生，更不要说养家。特别是在住房紧张的许多大城市里，每个月必需的生活费用不断地增加，生活越来越难维持，如果再遇到生病或是失业，就只能靠借债。近些年来，美国家庭的信用卡债和买车借的债都不断地增加，再加上很多人读书时，为了付学费所欠下的学贷；最近两年来人们因为生病而欠下的医药债也不停的上升。

除此之外，在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下，垄断资本更进一步渗透到原属于政府管辖的一些一般称为公共事业的领域，像交通，运输、水电、教育、公共卫生等等都被私有化，把原来由国家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变成可以贩卖的商品。上面已经提过跨国农业企业公司藉助新的强化了的知识产权法，透过它们的基因工程，垄断了好多全世界重要的植物种籽。

除了制造业和农业生产，服务业的生产（在可能的范围内）也已经全球化。《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最终在 1995 年 1 月 1 日生效。虽然，这个协定在理论上承认每一个国家有权决定要开放哪一个服务业部门，但实际上，每一个国家，在 WTO 和区域贸易协定以及各种双边多、边贸易协定的压力下，被迫将服务业部门不断开放。一个国家，一旦开放了某一个服务业的部门，就必须采用国民待遇的规则对待所有外国企业。这意味着，它对本国企业的协助不可以凌驾外国公司之上。所谓服务业的项目非常广，包括：商业服务（像法律、会计、税务、工程、计算机、房地产、广告、销售、保安、保险、包装、摄影等等），通讯，建筑，批发与零售，教育（从小学到大学），环境保护，金融（银行和证券），医疗，旅游，娱乐，和交通（飞机、铁路、和公路）。这些项目中间有很多都已经全球化了。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教育、娱乐、通讯和物流。³³ 服务业的全球化意味着跨国垄断资本将一步步占据这些大大小小的服务业。

在“全球化”时代的帝国，必须为它们的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创造最有利的条件。跨国公司利用各国工人之间彼此的竞争，以最低工资雇用有最适当教育和技艺的劳工。跨国公司并且享有低的公司所得税，和现代基础设施，宽松的劳动法规，以及无限制地将利润汇回国的种种优惠。同时，跨国公司还可以无限制地将它们制造的垃圾弃置在生产地。现阶段帝国主义的贸易与投资制度加上美元霸权，对国际化的生产和积累极为方便。发展中国家为了经济的成长，必须维持出口不断上升，因此，当他们从贸易的剩余，收到愈来愈多的美元时，为了避免自己的货币升值，只好不用美元来换取本国货币。而被迫将美元（或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存入本国的中央银行。这些国家持有美国政府债券所得的利息很低，偿还外国的投资报酬率却极高，这就是另加一层的剥削。在全球垄断资本控制下，几乎将所有世界上生产活动都国际化，是这跨国资本积累新策略的基础。而这个全世界生产活动的整并过程，如果没有美元的霸权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崩溃，再加上中国投身与全球垄断资本的合作，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资本积累的新策略已经证明对全球垄断资本极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和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在内的全世界工人、农民却极端有害。

晚期帝国主义的第四个特点：国际金融组织和贸易协定在晚期帝国主义的功能有了质的改变

1944 年时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美国就带头重新整顿战后新的经济次序。在其它帝国的合作下，成立了两个国际金融组织和达成一个贸易协定。这里所说的金融组织就是：1944 年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国际重建与发展银行》，简称世界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World Bank）。1947 年，经各帝国的同意，又在它们之间签订了《关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这两个金融组织和一个国际的贸易协定是为了避免再次发生二战前经济大恐慌时，各大帝国之间的恶性竞争。国际货币基金稳定了

³³世界服务业出口从 1995 年的 1.2 兆到 2005 年的 2.5 兆美元，2014 年达到 4.9 兆美元。

各国的货币，世界银行为战后经济发展贷款，关税贸易总协定则大幅降低了各国的进口税率。1929 年的经济大恐慌是世界资本主义到那时为止最严重的危机，每个资本主义大国都无法解决自己国家与生产相比较需求不足的严重矛盾。像美国粮食生产大量过剩，一方面粮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另一方面人民却吃不饱饭，只能在街上讨一碗稀汤。³⁴ 生产猪肉的农人把猪仔养大卖不出去，干脆就先把猪仔给杀了埋起来。牛奶卖不出去就倒在水沟里。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每个资本主义大国都想用出口来解决自己的生产过剩，和因生产过剩引起的失业问题。于是，由美国领先，一方面提高进口关税，另一方面，将自己的货币贬值。1930 年胡佛当政时，通过 Smoot-Hawley Act 来提高进口关税，随后，二十五个国家也都提高了它们的进口关税。各国竞相提高进口税和将货币贬值导致汇率不稳定，因此，国际贸易在 1929 年至 1934 年间，下降 66%，贸易大幅下降，把已经衰退的经济带入更严峻的危机。二战结束后，国际货币基金和关税贸易协定，降低了各国的关税，稳定了各国之间的汇率，促进了国际贸易，世界的商品流通顺畅，对战后经济复苏有很大贡献。

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成立时，隶属在联合国的社会和经济委员会（Social and Econom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之下。1944 年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的目的就是将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固定下来，作法是将美元与黄金维持一定的比例，每一英两黄金订价为 35 美元，然后每个国家的货币都与黄金挂钩，这样就定下了各国货币间的汇率，汇率一旦固定下来，除了有特殊情况不得更改。大战结束后，美国储存了全世界 70% 的黄金，美国承诺所有持有美元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可以用 35 美元换取一英两黄金，从那时起美元就取代了长久以来黄金（或其它稀有金属）作为国与国之间的交易媒介。到了六十年代底，美国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它每年的进口，加上它对外（欧洲、日本和世界各地）的投资，再加上它庞大的军事开支，超过了它出口所赚取的外汇。美国经济入超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它战后所存有的黄金陆陆续续被在国外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到六十年代底，美国已经无法继续它的美元换黄金的承诺。1971 年 8 月。美国尼克森总统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从此之后，美元就成了没有黄金支持的纸币。到了今天，联合国对《国际货币基金》完全没有权过问。参加基金的每个国家根据它们国家的经济实力被分配一定的投票权，美国的投票权约占总投票权的 17% 左右，每件重要事情的决定，需要有 85% 的票数才能通过，因此，在《国际货币基金》决定事情时只有美国掌有否决权。

到今天，美元不但继续是国与国之间交易的媒介，而且继续作为所有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贮存，同时美元也作为所有国际商品的价格单位。即美元是所有国与国之间交换的每种商品的定价的单位。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成立到 1971 年，再到 1971 年之后，一方面是美国联邦储蓄银行印刷出来的纸钞，另一方面，却被所有国家当成它们在国际交易上所用的媒介，和每个国家中央银行的外汇贮备。美元虽然只是美国的纸钞，但却变成了国际通用的世界货币，这样的发展有极为重大的和深远的意义。因此，美元在晚期帝国主义发挥了非常独特的功能，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对这一点，下面会作进一步的说明。

³⁴ 经济大恐慌时，美国挨饿的人在街上排队为了讨一碗稀汤。美国的左派特别作了一首讽刺穷人讨碗稀汤喝的歌。

在美国帝国之前，殖民时代的帝国，像大英帝国、西班牙帝国，在极盛的时期都握有大量的贵重金属（像黄金和白银等）。这些贵重金属一部份是靠贸易交易上换取来的，另外的则是靠抢劫来的，如 18 世纪和 19 世纪西班牙等国到南美洲抢劫来的黄金和白银。

现在先要说明的是：在八十年代，帝国主义进入晚期后，这两个国际金融组织和一个贸易协定承担起了协助国际垄断资本在全世界扩张的作用。³⁵

《国际货币基金》成立后，它维持了世界各国货币交换的汇率，汇率一旦订了下来，除非一个国家在国际收支上长期不得平衡，就固定不变。在一个国家发生结构性的外汇收支不平衡时，基金允许它将自己的货币贬值。在一个国家外汇短缺时，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申请贷款，但是在向基金贷款时，就必须接受基金的贷款条件。除了需要付利息之外，接受贷款的国家还要接受基金提出的其它条件，条件之一就是要这个国家缩紧财政支出，另一个条件是必须一方面增加出口，另一方面降低进口来减少在外汇上的需要。这样的条件就使得《国际货币基金》可以用贷款来干涉欠债国家的内政。在七十年代之后，更多的落后国家靠向基金借债来补外汇的不足，这也就使《国际货币基金》可以债权者的身份来操纵借债国的内政。到了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开始，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外债开始累积后，基金对这些欠债国更是掌有生杀大权。

1980 年初，拉美国家经历了危及它们生存的外债危机，外债的起源是因为 1970 年石油出口国家联合将石油减产来提高石油的价格。它们控制了市场供给而导致国际石油价格上升，大量的美元流入石油出口国家。这些国家把它们收入的美元存进美国和日本及德国的跨国银行。此时世界经济萧条，大型公司并不踊跃向这些银行借款。石油输出国家存在这些银行快满溢出来的钱，急迫需要贷出去。³⁶ 这帝国主义国家借着这些国家欠债为理由，利用《国际货币基金》为工具，用结构性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SAP）来迫使他们的经济自由化，私有化，以便将这些国家的一切资源、财富压榨出来，来偿还外债。SAPs 强迫这些政府缩紧开支，这时一些发展落后的国家一方面需要进口高价的石油，另一方面需要进口高价的小麦（这时国际小麦价格因苏联减产而上升）。它们就成了向跨国银行借款的顾客，帝大幅削减医疗教育的支出，取消对穷人食物与交通费用等各方面的补贴。SAPs 也逼迫这些国家取消对外国资本的限制，让资本摆脱管制。亚洲国家 1970 年代底以及随后的危机期间，也遭受了同样的恶运，经过了几个回合的经济重整，饱受通货膨胀和失业之苦，不再有任何选择或能力来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别无选择地和刚开始资本主义改革的中国连在一起，被完全整合到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之内，并且积极参与由全球垄断资本设计的国际化生产和新的国际分工。

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石油危机中，向帝国主义国家的跨国大银行借钱，实际上是帮助了整个帝国主义的经济。在石油出口国家将石油加价后，大量的美元就停留在跨国大银行中，上面提过这时经济萧条，各大国际企业都没有借钱的意愿，所以这些大银行才想尽

³⁵ 这里因为避免将这个附录拖得过长，对世界银行对帝国主义发展的贡献没有作叙述和分析。

³⁶ 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石油美元再循环。

办法借钱给一些发展落后的国家。把钱贷给拉丁美洲国家后，这些国家就用借来的钱去买进口石油、粮食和一些工业品，于是，钱就从新恢复流动，活了起来，解决了银行资金不流动的问题。到了八十年代初，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因为前一时期经济萎缩时的放松银根而引起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时美国的联邦准备银行就锁紧银根，将基本利率（prime rate）提高到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18%。此时，跨国银行给落后国家的贷款也跟着提高了。这才发生这些国家无法偿债的问题，导致外债危机的爆发。根据美国联邦银行的行长吴克（Paul A. Volker）的报导，八十年代初，世界中心的最大的银行给拉丁美洲的贷款总额，高达这些银行的资本的两倍半。也就是说，如果欠债国家还不了债，世界上各个最大的银行都会破产，连带着整个资本主义银行系统都将破产，后果很不堪设想。这时 G-7 国家与《国际货币基金》进行抢救，美国带头以援助欠债国家为理由，用纳税人的钱贷给欠债国家，并规定由这些“受援助国家”保证，把收到的钱最先用来偿还借钱给它们的跨国银行。名义上用来援助欠债国，实际上是援助了世界最大的跨国银行。

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一些数字计算出，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在外债危机中遭遇到多大到损失。苏珊乔治（Susan George）的一本书：《债务飞旋镖》（Debt Boomerang）中说：从 1982 年到 1990 年的 8 年中，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付给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本金加利息，一共是 1 兆 3450 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从发展落后国家流到先进国家的利润、股票分红、专利权使用费等项）。从这个 1 兆多的资本流出减去 9270 亿美元的资本流入（包括外来投资、援助、新的贷款等），从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流向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净额是 4180 亿美元。以 1948 年的币值来计算，是当年美国援助欧洲国家的马歇尔计划的六倍。到了 1990 年，发展落后的国家欠先进国家的外债比起 1982 年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61%。³⁷ 这代表了晚期帝国主义时代，富有的帝国向贫穷国家吸走的人民的血汗。

八十年代中，东南亚国家开始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推行了国际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改革。为国际垄断资本铲除了进入亚洲这些国家的各种障碍。它们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维持固定的汇率，因此外资进入不必承担当地货币贬值的风险。并且提高本国的利率，这时美国的各种互惠基金在东南亚新兴起的股票市场投资的收益率高达 30%到 35%。很容易看出这样高的收益率不是从投入生产中获得的，而是由投机获得的。房地产的投机、股票的投机导致这个气泡越吹越大，气泡爆炸是必然的，只是时间上的问题。1997 年 8 月时，气泡果然爆炸，先从泰国的泰铢不能兑换美元开始，这次的危机蔓延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韩、香港和台湾。

九十年代亚洲国家的危机尚未终了，危机就又回到拉丁美洲，美帝国再一次将新自由主义推向墨西哥，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来打开墨西哥的投资市场，迫使墨西哥减少进口税。给墨西哥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1993 年 1 月年 NAFTA 签订，次年 1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去庆贺

³⁷ Susan George, *Debt Boomerang*, Pluto Press, 1991, XV-XVI

周年，就在克林顿发表祝贺演讲时，墨西哥的〈扎帕蒂斯塔革命军〉（Zapatista）发动了反墨西哥政府的武装叛变。

晚期帝国主义的第五个特点：金融资本的扩张与金融危机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已经说明到了二十世纪初，金融资本已经在资本中占主导地位，但是在 1980 年之前，金融资本尚没有过去 40 年来如此的神通广大。二次战后，资本金融化更进一步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晚期，金融资本通过了新的传播技术，更进一步操纵了全世界经济，金融资本到世界各地投机，导致金融市场的泡沫，当气泡越吹越大时，金融资本找到适当的时机，把气泡刺破，在这一吹一破的过程中，金融资本获取到巨额的利润。垄断金融资本掌握了将危机从世界的某一部份转嫁到另一部份的能力。从最近几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金融资本可以将大量的财富，从贫穷的国家转移到富有的国家，特别是转移到帝国之首，握有金融资本霸权的美国。在一个国家内，通过金融资本的操纵，一般市民一生积存的少量储蓄化为乌有，他们在危机中失去仅有的最重要财产，像他们居住了多年的房屋，在危机中因为付不起房屋贷款，房子被银行收回，原来的屋主被警察赶出家门，就这样把财富从一般人的手中，转移到少数大型金融机构和控制这些机构的亿万富豪的手中。

从 1980 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开始，金融机构和金融交易的自由化、取消管制，使得金融资本从政府的管制中解放出来。藉助新通信技术的操作和帝国主义国家机器的力量，金融资本获得从来没有的自由。近年来，垄断金融资本的力量成几何级数增长，为了争取更大的收益，金融资本扩大了资产的流动性，使各种金融资产可以随时买卖。高流动性的资产涌进世界金融市场，一方面，膨胀了资产的价格，另一方面，扩大了债务，因为资产的价格和债务是同样事情的两面。从而制造了越来越大的金融泡沫和潜在的危机。从 1980 年到 2020 的 40 年中，我们亲眼目睹到的危机，不仅不断地重复发生，并且日益深化。

1980 年之后，拉丁美洲的危机连续不断，一直延续到今天。1990 年初，日本因金融泡沫破裂，引起房地产的破产，把经济从极端的繁荣打到谷底，经济萧条延长了 10 年之后，直到今天尚未完全复原。九十年代，亚洲经济一连串的危机直到 2008 年全世界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开始，在危机尚未结束时，接着就是南欧一些国家，特别是希腊、西班牙，面临了国家主权债的危机，在这期间，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被逼债的过程中，屡次紧缩财政开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的支出，人民的生活陷入极端的困境。金融危机的另一面就是在金融资本迅速扩张中，点燃了住房和商业建筑的投机。休闲度假区、高尔夫球场、高档旅馆，还有各种的旅游设施，在全世界以疯狂的速度大规模展开。这些建设侵占了农地、森林、草原和海滩，摧毁了农民、渔夫、牧人还有其它自产自足者的生计。金融泡沫的扩大及随后的破裂，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伤害之大，不下于全面的战争。当金融资本沉溺在上下起伏的波动时，资本家获得难以形容的巨大财富，一般百姓承受着如同战争一样的苦难。

很难想象的是在这 40 年整连续不断的危机中，不但没有搞垮金融霸权国家的货币（美元），反而巩固了美元在帝国主义中的地位——至少短期上如此。美国透过印制更多的钞票、短期国债等，进一步扩大了美元在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美国对外贸易持续的入超，使它能够持续挥霍其它国家为了自身发展而节省下来的储蓄，这是对其它国家最大剥削。全球各个国家的美元外汇储备从 1980 年的 1 兆，增加到 2017 年的 10 兆。所有这些美元，都是美国欠下的外债。³⁸ 在晚期帝国主义期间美国所享受的特权，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方面，美国利用美元的特权把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国家生产的剩余吸干，另一方面，因为美元的特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也不得不对美国退让三分。从另一方面来看，今天帝国主义能够继续维持也可以算做美元所作出的贡献，这一点在后面晚期帝国主义的第七特点（也是最后的特点）中还将再作分析。

晚期帝国主义的第六个特点：各大帝国之间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我认为今天许多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中，可能过份侧重了各大帝国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而不够重视各大帝国资本之间的合作关系。前两年，中国的一些左派对中国是否已经是帝国主义产生很大的争议。认为中国已经是帝国主义的一些人，也同时认为如果各大帝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化，可能再度发生帝国与帝国之间的战争，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样的情况。当然，没有人可以保证帝国之间的竞争不会再度引起世界大战，但是今天帝国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应该和上世纪 1914 年和 1941 年时不同。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我认为在 40 年前开始的帝国主义全球化中，各个帝国的资本之间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各国的垄断资本看到除了竞争之外，彼此之间的合作也会为它们争取到非常大的利益。现今我们如何决定某家公司是属于哪个国家的？是否一家公司在哪里上市就决定了这家公司是那国的公司？或者一个公司的大股东或者总经理是那国人，这家公司就是那个国家的公司？

譬如，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股票市场上市，马云是中国人，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网上购物公司，那么阿里巴巴是中国公司还是美国公司？几年前，美国制药公司 Pfizer 要收买英国制药公司 Astra Zeneca，因为这家英国公司有很大的研发新药的潜力，在谈判中，有计画将未来的新公司总部设在英国，因为英国的公司所得税比较低，后来这两家公司合并的谈判没有成功。今日在国际上，大型跨国企业的收购和合并每日每时都在发生，除了收买和并吞之外，各国的企业还有各种办法用合资、技术合作的种种办法取得合作来征服市场，因此，今天要分辨一个企业是属于哪个国家还不那么容易。以前有个说法，说要知道一个企业是哪一国的，就看保护它的是哪个国家军舰，今天如果还是这样说，就有点荒谬了。

³⁸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1th-17th, 2017 .65 .

也就是因此，资本家没有祖国这样的说法也越来越接近现实了，这一点转变在美国看得很清楚，在早年美国工业化时，国内修建各种基础建设，包括铁路、公路、大小桥梁，即使到二次世界大战后，五十年代时，美国还建了畅通全国各州的公路网（Interstate Highway）。到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不但不再造新的公路、铁路，即使桥梁也是年久失修，大半以上的桥梁有倒塌的危险。一个城镇上最常见的工程就是建新的监狱。五十年代时，二战退役的军人享有各种福利，包括上大学的奖学金，和国家低利购屋的贷款，到了今天，征兵制度已经被废除，从阿富汗和伊拉克退役下来的军人，不但找工作困难，甚至会有不少退役军人因为失业或者健康有问题（包括心理失常）而变得无家可归。美国政府就连国民教育也都放弃了，教育变成可以牟利的私有企业。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国民教育是为了训练一个有知识的产业军，到了工人进入工厂做工时，不用从 ABC 学起，今天美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依靠本国的工人赚钱，又何必在乎这些工人的教育？

我们也应该回头来看看资本主义发展仍然落后的国家的资产阶级。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为中国作了阶级分析，毛主席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个力量薄弱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力量薄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无法领导革命，但是因为在帝国主义下，他们无法发展，革命者应该把他们和买办阶级分开，作不同的对待，无产阶级可以将他们作为可以争取的统一战线的对象。但是到今天呢？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是否还存在这样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全球化的今天，在世界生产的新分工下，这些资产阶级是否在世界垄断资本控制的新分工下有一些新的发展机会？因此，他们还会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吗？这是各国革命者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晚期帝国主义的第七个特点：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享有霸权的地位。美元的霸权一方面延续了帝国主义的寿命，但另一方面也注定帝国主义必然走向灭亡。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看出帝国主义日益深化的矛盾。帝国主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内在的不可协调的矛盾。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生产设备，但是反而给资本主义带来几十年战后的繁荣。资本主义不怕战争带来的破坏，战争造成的大规模破坏却给资本创造了新投资的大好机会。当战后欧洲和亚洲国家都急待重建就给资本提供了世界各地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好机会。仅仅在 10 年内，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就修建完毕，而且新建的生产设备比之前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到了七十年代中，世界生产商品的能力再度超过了市场的需求（需要+购买力），生产过剩，多余的商品无法在市场中销售，因此，在生产中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无法实现成利润，资本积累无法持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再度面临战争的危机。

二战结束之初，在欧洲和日本重建中，美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唯一享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它在贸易上的顺差超过了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美国政府在全世界军事基地的费用。因此，在国际收支上保持平衡，也就没有很多美元回到美国换取黄金。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底，美国商家的对外投资和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支出已经超出它贸易上的顺差，此时流出去的美元，开始回到美国兑换黄金，美国的黄金储备因此一天天减少。甘乃迪总统当政

时，为了美国的黄金储备持续流失而非常忧心，曾经短期限制美元出境。到了詹森总统当政期间，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扩大，更因此造成大量的贸易赤字。引起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的不满，因为美国不用去管它在与欧洲国家在贸易上的逆差，因此，欧洲国家通过贸易上的顺差承担了美国在越南战争的费用的一部份。到了尼克森总统时，经过了几次美元贬值之后，终于在 1971 年 8 月时，美国政府宣布单方面废除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美国赖账了，所有世界上持有美元的国家只好拿着美元这个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

在 1971 年之前，美国对国际收支上赤字的大小还有所顾虑，因为如果美国境外的美元过多了，就会回到美国兑换黄金。为了不再损失黄金储备，贸易上的赤字对它还有一点约束能力。等到 1971 年美国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后，美国就不需要在乎它的国际收支赤字有多大。八十年代初，美国贸易上每年的赤字就高达 500 亿美元，主要来自美国与日本贸易上的逆差。美国贸易上的赤字从那时一直持续到今天，从对日本在贸易上的逆差，转变成对中国贸易上的逆差。

为什么美国欠债越来越多，但是美元却越来越享有别的国家货币所没有的特权？这一点需要加以说明。六十年代，美国政府为了防止美元外流，曾暂时进行资本管制，限制美元的流出量。当时已经有大量的美国跨国公司在欧洲做生意，这些公司需要用美元投资或进行日常交易；由于资本管制，把美元从美国转账到欧洲并不那么方便，于是这些公司就决定把它们在欧洲赚到的利润直接用美元存入欧洲（大多在伦敦）的美国银行。1970 年后，美国公司存在欧洲银行的美元（所谓的欧洲美元 Euro-Dollar），每年成长率超过 25%。欧洲美元从 1971 年的 850 亿到 1984 年的 22000 亿，随后在 1988 年时更高达 4 兆美元。这些美国境外的巨额美元，是建立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开始。³⁹ 当美元大量涌进其它国家，美元就变成了这些国家的交换媒介，尤其是在有一些国家中，自己的货币币值不稳定，就用美元来支持本国的货币。更重要的是美国利用它的霸权要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像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出售石油时只接受用美元付款，美国用继续出售军事武器给这些国家的条件。除了国际上石油用美元作为交换媒介外，另一项国际上的交易就是美国出售武器的交易时当然会只接受美元付款。此后的十年中，欧盟（EU）与日本也希望能够扩展张它们国家的货币影响，以便能在国际金融领域和美国竞争。但是却因为欧元和日币在境外的流通量不够大而失败。这就是美国如何利用它的特权将美元变成世界货币的手段，因为几乎所有国家都需要进口石油和美国制造的武器。

在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不断地升高，美国境外的美元数量也大幅增加。除了 1960 年后期美国曾对资本作短期的管控外，它一直维持了一个开放的资本市场，因此，资金可以很轻易地在国内国外之间自由流动。除此之外，美国更有一个庞大的证券市场，供给其它国家的政府、企业、私人在任何时刻将它们美元股份存入或取出，美元就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流动的金融资产。因为金融市场变动无常，对很多人来说，保存这种流动性大的资产比较放心。美元也同时构成全世界外汇市场的大半交易，2014 年，一天的平

³⁹这些额外的欧洲美元可以扩张的原因是，这些被称作无国家银行的银行（stateless banks）并不像一般银行那样对欧洲美元的储备有任何的限制，但是这些银行的储备和贷款却被美国和英国政府承认为合法。

均交易额 5.3 兆美元。这些每日巨额交易的美元，大多并非为了贸易，而是为了使美元成为流动性极大的资产，持有美元的个人或生意可以在任何时候将它转换成其它货币或别种资财。1971 年之后的 10 年，起初被视为弱点的美国赤字与债务，竟变成美国强大的武器，美元获得了目前没有任何货币可以相比的霸权的地位，以及其它国家货币从未享有过的特权。美国境外所有的美元都是美国的债务，但是美国却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还债义务的国家。

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当美国的赤字持续升高，美元却不弱反强。美元的霸权意味着，美国身为债务国仍然能够不去管它在国际收支上的赤字。目前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是中国和日本，其他债权国包括德国、南韩，还有像墨西哥、阿根廷、印度、泰国和中东石油出口国家。他们因为要维持贸易上的顺差，被迫继续借更多的钱给美国。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必须依靠贸易的出超才能维持成长。它们在贸易上的出超，是用不断地借钱给美国来完成的。所以虽然美国的债务堆积如山，却能充当世界货币。如果说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的部份费用是靠欧洲国家借钱给美国来支付的，那么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战争的部份费用，包括美国政府每年的赤字开支则是靠日本、中国和其它借给美国钱的国家来支付的。美元在七十年代时不断地贬值，成为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持有的货币，到今天却变成所有国家的央行、企业、私人紧握的货币。

资本主义永远面对的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许多本来制造业发展落后的国家，工资也被压得很低，以便利用出口来增加就业。于是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大量的出口商品堆积了起来，这时靠了美国这只狮子大张口，把这些多余的商品都吞了下去。美国用欠账的方法（美元钞票）进口了大量商品，解决一部份世界生产过剩的问题，使生产过剩的危机暂时得到舒缓，居然在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恢复后又拖了一阵。

今天帝国主义的经济是靠由美元欠债所“制造”出来的总需求维持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今天帝国主义的“繁荣”是靠一个虚拟出来的假象，这个假象的背后是空的。还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个假象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我们要认识到在这帝国主义败落的时期，一方面太多的多余的商品堆积起来无处可去，太多的汽车、太多的名牌手表、皮包、化妆品、运动器材、iPad、iPhone 等等；另一方面，无可数计的人被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连最低的生活必需品，像饮水、食物、住房、医疗卫生和教育都被剥夺了。这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人民之间无法解决而且日益加深的矛盾。

在这帝国主义败落的日子，垄断资本还在分秒必争地急速扩张，与它对照的是在美国败落的工业城市里和在世界各地为出口建起来的厂房和机器，都变成了废墟。在这帝国主义存在的 100 年中，它对世界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摧毁超过了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帝国主义的不可持续性。但是我们不能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走向灭亡，因为我们必须要尽力为人类的后代保存尚存的资源，和自然环境，为此，人类不能等待着帝国主义将资源耗尽与它同归于尽，我们必须尽所有的力量来加速消灭它。

附录三：

沃勒斯坦与《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

刚刚过世不久的沃勒斯坦是美国一个非常有名的社会学家，他在美国、欧洲和其它很多国家的学术界有相当可观的影响力。他在美国有名的学府任教和做研究工作已经有半世纪以上的历史，他的大批学生和追随者也都在学界有一定的声望。在以欧美为主的社会学的学界中，沃勒斯坦的影响不是一般学者可以超越的。这里对沃勒斯坦提出批评，是因为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在中国一些左派中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引起左派之间的争论。另外，想要对沃勒斯坦所赞许的《世界社会论坛》提出批评，因为这个组织对近些年来的反体制运动有负面的影响。

沃勒斯坦所谈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

沃勒斯坦认为今天所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征是它的是为了营利，而非为了生产有用的东西。沃勒斯坦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同，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开始于生产者与他们在生产时所用的生产工具分离，生产者失去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生产者赖以生活的资料）；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生产工具与厂房、运输工具等必要的物质条件）与劳动对象（原料、土地），所以劳动者只能靠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为生，他们是劳动力的卖方，掌有资本（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资本家必须要购买劳动力才能生产，因此是劳动力的买方，劳动力的买方和卖方相遇，达成劳动力买卖的交易是资本主义的开始。同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经济形态不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是：资本家购买劳动力这项商品（即雇用工人）后，劳动者在生产商品的劳动过程中，新创造出的价值在抵补了他们的劳动力价值后，还有剩余，即剩余价值，也就是资本家的利润；而他们的工资（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则是决定于维持他们和他们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因此，虽然自古以来在原始公社之后的私有制，所有的社会都生产出为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剩余产品，但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则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生的，资本是通过在生产过程中取得剩余价值来剥削工人的。在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商品生产（目的是为了将产品出卖的）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劳动力本身就是可以买卖的商品。

沃勒斯坦所讲的资本主义跟马克思不同，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体系包括所有为营利而生产的方式，在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从事生产劳动者可以是奴隶，也可以是其他被殖民的人，这些人在生产中也是被剥削，但是他们不一定是马克思所指的以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雇佣工人，这是沃勒斯坦世界体系中所指的资本主义体系和马克思所定义的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沃勒斯坦所指的资本主义体系是资本必须不停地积累。因此，马克

思所说的资本主义之后的世界是商品生产消灭后的世界，商品生产消灭之后，剥削就将终止。而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应该是资本停止积累后的社会，但是除此之外，他并没有其它明确的说明，他最多也不过是说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应该是“比较公平的”和“比较民主的”社会。

沃勒斯坦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国家依照它们的发展程度分为“中心国家”（就是一般说的帝国主义国家），“外围国家”（就是一般所说的“殖民地国家”），和“半外围国家”（介乎两者之间的国家）。“中心国家”从“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吸取剩余。“半外围国家”的剩余一方面被“中心国家”抽走，另一方面却抽取“外围国家”的剩余。“中心国家”从“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抽取剩余，所以能够发展它们的经济。“外围国家”的剩余被“中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抽取所以不能发展。“半外围国家”处在两者之间。沃勒斯坦用剩余的分配而决定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或不发展，也就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会改变的，中心国家可能丧失支配地位，外围与半外围国家地位也可能跃升。

沃勒斯坦是反对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他看到这个为营利而生产的体系对人的剥削，也看到在这个体系内一些国家的剩余被其他国家抽走，使得这些国家无法用自己的剩余来发展经济。但是沃勒斯坦对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评价基本上不是正面的。这里所指的革命就是苏联 1917 年的革命和中国 1949 年的革命，当然也包括古巴的革命和朝鲜、越南一些国家的革命。沃勒斯坦对这些国家革命的评价的背后有一个主要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在他所指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可能同时有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只有在整个的世界体系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之后，才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沃勒斯坦对社会主义的定义是生产的目的是不再是为谋利，而是为使用，世界不再有分工，而且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一个政府。但是沃勒斯坦并没有具体说明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如何能转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如果不是经过一个一个国家的革命来完成，很难想象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如何可以转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

即使如此，沃勒斯坦也必须要对这些革命后具体存在的国家和社会给予评价。我从一篇由高任（Zeev Gorin）所写的文章中获得初步的理解。高任写了《评判性的调查》，文章中首先说明了沃勒斯坦不认为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可以有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335 页）。在同一页中，高任解释说沃勒斯坦认为当今的世界体系内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就跟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体系内不存在着封建社会一样，因为现今的这个世界体系内只能有资本主义。

之后，高任将沃勒斯坦对由马列政党领导革命成功后的社会分为三种不同的评价，在这三种评价中的一个极端是沃勒斯坦认为：这些由马列党领导成功的革命不但不会挑战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且对维持这个体系是有帮助的，高任解释了沃勒斯坦对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否定的原因，是他认为在这些革命后的社会做了一些调整，这些调整会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稳定的作用。

沃勒斯坦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二种看法是比较正面的，他认为这些革命成功的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可能会有反体制的功能，这种反体制的功能，对未来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向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转变时可能会有帮助。我找到沃勒斯坦一篇对社会主义革命正面评价的文章，沃勒斯坦对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给了这样的评语：“当一些国家消除了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一定的程度内它对世界上消费起了再分配的作用。”另一个影响是在意识形态上，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不可动摇性，并且证实不是只有私人企业才能够提升生产效率的这种谬见。他更进一步说这些革命的成功使得半外围国家可以享受到世界剩余中较大的一份，因此对世界分配有反两极分化的作用。这是我看到的沃勒斯坦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国家最高的赞扬。

沃勒斯坦对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第三种评价介乎第一种和第二种之间，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因此是模糊不清的。上面已经指出，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和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是不同的，这里还要提出沃勒斯坦反对列宁组织政党的方式来进行革命的。他说：“一个自己宣称为先锋队的政党，之后又建立起政权只可能是一个专制的政权。”沃勒斯坦主张反体制的运动要采取横的组织而不是列宁式的政党。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今天在西方国家的左派运动中，如何看待列宁式的共产党组织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分歧，几乎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在北美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主要的一些反体制的运动是反对列宁式的政党组织的，而且这种看法从西方国家影响到世界各地。沃勒斯坦反对列宁式政党的组织，他主张反体制的运动要采取横的组织而不是列宁式的政党。沃勒斯坦支持二十一世纪发展起来的《世界社会论坛》这样的横的组织。

上面提到，这篇文章对沃勒斯坦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出批评，是因为它对当今中国的左派产生一定的影响。这几年左派间发生了对今天中国是否是帝国主义的争论。作者寒流急认为中国已经是帝国主义，而远航一号则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这样的争论应该是健康的，但是我认为不幸的是，远航一号在否定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同时，把当前的中国定位为一个“半外围”国家。“半外围”国家在沃勒斯坦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有一定的定义，因此，如果要用“半外围”给中国定位，那么就必然要接受了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

我认为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跟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理论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如果接受沃勒斯坦的理论，就不可能同时是马、列、毛主义者。中国的马列毛革命者肯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他们肯定在解放之后，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他们也肯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绩，不仅如此，他们对未来的革命抱有乐观和积极的态度，这一切都是跟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分析截然不同的。这一点使我感到很困惑，因为远航一号完全可以认为中国虽然已经不是像第三世界国家一样的未发展国家，但是中国还不能算另一个帝国主义。这样的看法有助于如何

将中国在世界上定位的讨论，但是远航一号采用了沃勒斯坦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语言，而且不仅如此，远航一号也接受了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可能同时有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存在，这个看法使远航一号认为中国在 1949 年到 1976 年间虽然发展了生产力，但是中国这一段的发展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的一部份，而不是社会主义。

列宁主义与无政府主义

苏联解体之后的几十年间，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反体制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s）占很重要的地位。无政府主义者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无论是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曾反叛墨西哥政府的扎帕蒂斯塔（Zapatista）都属于无政府主义的范畴。无政府主义者非常适合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个人主义，对个人主义至上的人来说，他们抗拒一个组织对他们个人加以任何限制，而无政府主义者同时认为只要有组织，就会有人当权，人在有了权之后，就一定腐败，因此防止腐败的唯一办法就是没有人可以有权。但是任何运动都必须要有组织，都需要有人领导。无政府主义蔓延的结果，就发展出所谓横的组织，横的组织就是一个组织内不应该有人领导，参与者之间完全平等，组织内的任何决定也都要得到所有参与者的同意，在不同的组织之间也都是完全平等的，不允许一个组织在其它组织之上，或对其它组织产生什么影响。在 2011 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就充份地表现出这样组织的弱点，虽然参与运动的人每天都开会，但是开会时，很多时间都花在讨论一般生活上的问题，却商讨不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基本目的和运动所应采取的策略，以及这个运动和其他运动之间有什么关联，结果这场好像会产生一些影响的运动，最后就草率收场了。

美国和一些其它国家的反体制的运动者对沃勒斯坦是很拥护的。这些反体制运动家绝大部分属于民间非政府组织。这些运动者在反对帝国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从 1999 年，西雅图反世界贸易组织的游行，到 2000 年初，美国华盛顿的反对世界金融贸易组织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都显示出美国群众对“全球化”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的不满。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力量来自美国工会和美国环境保护团体的合作，而不只是一般的非政府组织。我也参加了这次游行，游行经过的马路的两旁站了很多办公室工作的人，他们利用午饭的时间出来站在街旁向游行的人表示欢迎。但是有几个无政府主义者穿他们招牌的黑衣在西雅图的商业区出现，这几个人砸破一些店面门窗，他们的作法不是为争取群众的支持，而是为吸引一般人的注意，这样没有目的的破坏，招来的是一些市民的反感。

有一位加拿大的毛派 J. Moufawad-Paul（JMP）对这些横的组织的人提出很好的批评。他写了一本 *The Communist Necessity*，从哲学的观点来了解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和实践。这本书很严肃地批评了这些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运动者，JMP 把这种横的组织的

运动取了个很合适的名字，叫运动主义（Movementism）。运动主义可以解读成“为运动而运动。”

在这一连串的反帝国主义全球化的示威游行之后，2001 年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由拉美国家的运动者和法国的 ATTAC（Association for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nd for Citizens）即主张将金融的交易像股票和债券的交易一样加以课税的组织。由他们的合作成立了《世界社会论坛》。《世界社会论坛》给反对“全球化”（也就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人提供了一个进行讨论的平台和空间。《世界社会论坛》受巴西政府的支持，当时巴西的总统就是卢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简称 Lula）。《世界社会论坛》提出的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说明这另一个世界将是什么样的世界。《世界社会论坛》开始时每年开一次会，2013 年后，改为每两年开一次会。每个非政府组织经申请都可以加入《世界社会论坛》，但是这个论坛不允许革命组织参加。

2004 年初《世界社会论坛》第四次会议在印度的孟买举行，我正好去孟买参加印度毛派组织办的《抗拒帝国主义侵略大会》（Mumbai Resistance），两个会隔了一条很宽的马路，我就来回跨过马路去参加两边的会。《世界社会论坛》的确执行了所有参与的人都可以不受限制的发言，所以每一个议题（譬如，像环境污染）就有好几个讨论会同时进行，另外，因为要讨论的议题很多，所以总共大约有一千个小讨论会（workshop）。每个参加的组织自己决定参加哪一个讨论会。每个会的讨论主持人都给参与的人发言的机会，但是不试着从讨论中达成任何协议，当然也没有作任何总结，因此，也就更谈不上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孟买的《世界社会论坛》在一个设备齐全的大场地（16 公顷）上举行。大会中演讲的，有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Shivan Ebadi（伊朗人），和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Joseph Stiglitz。在这个相当大的场地上，有很多间像教室一样的房间，各种民间组织分别在不同的教室内进行议题的讨论。另外，有一个大的房间，里面放了好多张桌子，桌子上陈列了各种书、杂志和宣传资料。我看了一下，书刊杂志中，以印度甘地非暴力和平运动为主。除了教室和大厅外，场地上有很大的露天空间，在那里每个时刻都有好多人（有很多印度的原住民）又唱歌又跳舞，好像是个热闹的庙会，却不知他们到底在庆祝什么？碰见一个我认识的人，她大声说，“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啊！”当地的英文报纸对《世界社会论坛》每天都有详细的报导，从报导中看到原来参加会议的有好多名人，除了上面提到得过诺贝尔奖金的名人外，还有来自南非的曼德拉夫人，他们都住在好几个星星的旅馆里。《世界社会论坛》没有给我很好的印象。

我在印度同时参加了《抗拒帝国主义侵略大会》，这个大会和《世界社会论坛》有很鲜明的对比。它是由印度毛派组织主办的，参加的人大多数是印度的农民，这些农民从各地步行而来，除了农民之外，还有少数进步的知识份子，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农民和工人反帝组织的代表。这个大会在一小块空地（占地仅 1.6 公顷）上举行，没有任何建筑物。会议的组织者在这块空地上搭起一个可以容纳一千个人的大帐篷，会议就在这

个大帐篷里举行。我们每个人都脱了鞋进入帐篷，因为晚上远地来的农民就睡在帐篷里的地上。开会时，有不同的领导人上台讲话，演讲的人分析了印度在帝国主义全球化中的处境，和印度革命的大形势，台下的人全神贯注地听着。之后，有个打着赤膊的表演者，他用引人入胜的笑话来讥笑印度的政治人物和宗教人物，引起全场大笑与喝采。我听不懂，靠旁边的人给我翻译。在帐篷外面，组织开会的人搭起了临时支架来展览人民的绘画和诗词，这些人民的艺术充份表现出他们的创造力，和毛主席提倡的艺术为革命服务的精神。我记得有一幅漫画，画出一个瘦小的贫穷人坐在电视前面，看着一顿美味的大餐。漫画下面写着：“可惜没办法将这些美食下载。” 第一天的大会结束，第二天参加开会的人分成好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不同的专题讨论，来自不同地方的小组讨论主持人彼此都认识，而且有过一起工作的经验。在小组开会中，主持人报告他们目前工作进行的状况，再商讨未来的工作计画。只有两天的时间，我就感受到这两个会完全不同的目的，和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未来。会议结束后，本来开会的人要一起集合去孟买的美国领事馆前抗议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侵略战争，后来因为没有得到许可，这个反对美国武力侵略的会只好在一个公园里举行。

2010 年《美国社会论坛》（US Social Forum）在我住的底特律城里开了个会，我为了对社会论坛增加了解，也去参加了。这个会给我的印象和印度《世界社会论坛》的会相同。它也是有一千多个小会（workshop），也是大家各说各话，同样的是每个人畅所欲言，同样是不去作结论，也同样是没有任何工作计画。这样形式的会议和工作方式，不得不使人怀疑他们真的能够产生任何影响吗？真的能创造出一个他们所说的美好的“另一个世界”吗？

我之所以将我所知道的《世界社会论坛》提出来谈，并且用革命组织所办的《抗拒帝国主义侵略大会》来作比较，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它来进一步了解沃勒斯坦。因为沃勒斯坦不但对《世界社会论坛》有高度的赞扬，并且对它抱有极大的希望。沃勒斯坦认为《世界社会论坛》是今天唯一可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组织，也是世界上唯一有希望的组织。他自从 2002 年《世界社会论坛》第二次开会起，到 2016 年他写有关《世界社会论坛》这篇文章时，每年都参加，而且都公开对这个论坛给予支持。《世界社会论坛》从 2001 年成立之后，到 2004 年在印度孟买开会时达到顶峰，在那之后，还继续维持了好几年，到了 2013 年，《世界社会论坛》已经无法每年开会。2019 年时，罗波·斯维欧（Robert Savio）发表了一篇文章“与《世界社会论坛》告别？”的文章，斯维欧是《世界社会论坛》国际委员会的一名委员，他对这个组织在 2001 年成立后 18 年的历史作了陈述和分析。斯维欧在这篇文章中，很诚恳地检讨了《世界社会论坛》的一些重要问题。他指出因为组织论坛的人的中心思想是惧怕“权力”，所以用横的组织形式来对抗垂直的组织形式，但是坚持用横的组织的结果，导致《论坛》缺乏行动的能力。这种横的组织甚至造成没有人可以代表《论坛》发言，因此，连媒体都对它失去兴趣。斯维欧的另一项批评是《世界世界论坛》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议题，这些过于分散的议题，无法集中成一个总的中心议题作为团结人的基础。因此，在《世界社会论坛》成

立后的十几年中，参加的民间组织不能发挥出力量，斯维欧指出这是今日从欧洲、到亚洲，再到拉丁美洲，以及最反动的美国右派猖獗的原因之一。斯维欧这样的批评和反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时至今日，这个最被沃勒斯坦推崇的反体制的组织已经不攻自灭。

沃勒斯坦是反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的，他也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的剥削和压迫，因此，他被认为是左派。近些年来，沃勒斯坦认识到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危机越来越深，这个体系的解体也指日可待，他的估计大概是 40 年到 50 年的时光，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会解体。但是他对当今的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崩溃后，将会由什么样的社会来取代却没有明确的说法。他只是说这个资本主义体系后的世界应该会比较平等的、比较民主的。但是问到在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终结后，人类所面对的将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他说他也不知道，大概有一半的机会是更好的社会，另外有一半的机会可能是更坏的社会。这样对未来不可知的展望，如何能够给追随着沃勒斯坦的人希望？又如何使人能致力于这个旧社会的解体和新社会的诞生？

我认为中国受沃勒斯坦影响的一些左派必须要整理他的思想，加以批判。最重要的是清楚的指出沃勒斯坦的理论和分析与马、列、毛的理论和分析，是完全不相同的。因此，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赞同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又同时是马、列、毛的信仰者。

作者简历

- 1936 生于北平（今日北京）。
- 1950 随父母迁居台北，同年考入北一女初中。
- 1956 考入东海大学生物系，后转学至经济系。
- 1961 赴美就读于 Bryn Mawr 大学经济系研究所，接触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1979 年获 Bryn Mawr 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学位。
- 1965 在纽约，参加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生的读书会，学习中国历史，读《毛泽东选集》。
- 1968 先后移居巴尔提摩和田纳西，两个女儿相继出生。
- 1976 移居底特律。
- 1977 在底特律城 Marygrove 大学任教。
- 1979 初次到大陆各地参观访问。
- 1981 参与在美国发行的《台湾思潮》杂志。
- 1994 于东海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 1997 于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
- 2003 以 Marygrove 大学荣誉教授头衔退休，参与台湾左翼发行的《批判与再造》杂志。
- 2013 移居加州湾区至今。

自 1993 起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左翼运动，先后于德国、菲律宾、加拿大、马来西亚、印度、香港、巴西、阿根廷、荷兰等地参与反帝国主义以及反全球化集会游行并发表演说。

金宝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论述、美国宰制下的帝国主义经济批判，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探讨，她的主要著作包括：

1. 《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台北：巨流出版社，2005。
2.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hina's Continuing Class Struggle since Liberation》《革命与反革命—中国自解放后继续的阶级斗争》菲律宾：IBON 出版社，2012。
3. 《Rethinking Socialism》：Paris,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18，与已过世许登源合着。法文版，Soleil Rouge, 2018
4. 《From Victory to Defeat: China's Socialist Road and Capitalist Reversal》Paris: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19。土耳其文版（Onurcan Ulker 翻译）：Patika Kitap, 2019。